

K
827.6
1265
1265

我的回忆

张 国 焘

第 一 册

(供内部参考)

我的回忆

张 国 焘

第 一 册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印刷

工本费 1.25 元

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

《我的回忆》是其中的一种。作者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死于加拿大。该书主要记述了他叛党以前的政治经历，对建党前后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事件均有所述评。全书九十余万字，分三册出版。

一九八〇年三月

出版者的话

张国焘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及组织者之一，曾任中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中共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中共要职，后因与中共中央意见不合，脱离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以后在香港隐居，近年移居于加拿大。

张国焘先生的自传都一百万言，详述中共创建历程、发展经过及作者和中共诸政要的交往。书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等人的言行个性，跃然纸上，可说是关于中共最详尽生动的第一手史料，而历年来中共和苏联党要之间的斗争冲突过程，书中更一一说明来龙去脉。有不少历史事实，从未为人公开透露，但与中国近代政治有极大关系者，例如西安事变的“解决”，竟非当时中共或张少帅等始料所及，亦不决之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由于斯大林根据当时国际关系所发出之指示，便是例子之一。

《我的回忆》在《明报月刊》连载以来，受到中外读者的重视，各方面的读者纷纷促请我们印行单行本。现在出版第一册，内容从第一篇到第八篇，由五四运动时期到孙中

山先生的逝世。以后的篇章将陆续成书出版，敬请海内外读者垂注。

《明报月刊》编辑部

张国焘先生的略历

杨子烈

张国焘先生所著《我的回忆》一书，刻划出“五四运动”时一位急进青年的发展，也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真实历史。他在中共党内所经历的事，不仅局外人无由知其底蕴，即他的同辈，如毛泽东、董必武、刘少奇、李立三、周恩来诸人，也因各人经历不尽相同，所以对组党的最初策划和早期中共中枢的动态等等，不一定确知其来龙去脉。更难得的是张先生能客观冷静，所述力求其真。读者从苦难的中国，看这位急进人物，再从这位急进的代表人物，去看中国的种种，也许能获得若干启发，去领会今日中国之由来。

我觉得我是张国焘先生这一巨著的最好见证人，因为我也中共的最初党员。一九二一年秋，中共湖北区组织成立不久，我即加入为正式党员。一九二二年我与国焘先生在北京相识，因常在一块共同奋斗，一九二四年春我们结婚，从此相依为命，历尽艰险，直到现在。不待说他的经历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每次阅读《我的回忆》，往事如昨，活生生的史实，活跃于我的脑际，常常使我感慨万端，有时为之流泪不已。我常想到中共的老同志们以及现

在千万数的后进们，能够读读这本书，当可体会中共当年缔造的艰难，或会大有益处。即海内外中国人士，不论反共亲共，如能平心静气阅读此书，也许对国事能有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关怀中国的人们，参阅一番，也可以鉴往知来，促进世人彼此间的互相了解。

我在这里不拟对张先生著作的内容加以评介，也许我会有机会出版我亲身经历的记载，准备对同一史实有所补充。目前仅应《明报月刊》编辑的要求，说说张先生的略历。

张国焘先生生于一八九七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自始即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现在息影香江，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他只想留下这本自传，题名《我的回忆》，供世人参考。

首先，张国焘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当年这位不满二十二岁的北大学生，是人所公认的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由于他的爱国狂热，曾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发动，成为学生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又由于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因而与当时任北大教授的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来往密切，而且热心到群众中去，隐然成为当时左倾青年的重镇。

一九二〇年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等与张先生策划并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一九二一年夏，张先生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三位中央委员之

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先生开创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现在在中共任要职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先生主持职工运动时的战友。一九二一年末到一九二二年初，张先生被任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先生因反对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政策，曾被开除中央委员，但他仍担任重要的职工运动工作。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张先生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前往出席，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张先生之当选，主要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

一九二五年初，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又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他参与中共的决策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会议”。当时由于中共许多活动的失败，尤其南昌暴动的失败，张先生被指为右派机会主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再次被开除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停留两年半之久。

一九三一年春，张先生回国，对挽救当时中共的严重危机有过很大的贡献。那时中共的工作转移到苏维埃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被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三二年，

由他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北地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即他所到之地，中共党政军各地组织均归他领导。

一九三五年，张先生所统率的第四方面军，与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合后，因政见不同，引起分裂。一九三六年，张先生又与毛泽东在陕北会合。那时张先生虽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因受到排斥，意态消极。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张先生凛于共赴国难的大义，勉强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职务。但他终因形势日非，在无可奈何之中，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表示与国人一致抗日之至诚。此后张先生对国内外政争，日益置身事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忱，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张国焘先生饱经沧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于香港

第一册目录

出版者的话	1
张国焘先生的略历	3—6
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1—88
第一章 洪江会造反	2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17
第三章 民国成立以后	27
第四章 与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	33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	37
第六章 “救国第一”	43
第七章 五四运动	49
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60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66
第十章 在北大图书馆中	79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89—147
第一章 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90
第二章 北京小组的组成	104
第三章 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110

第四章	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117
第五章	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	122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31
第三篇	万事起头难	149—169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	150
第二章	被捕、谅解和团结	162
第四篇	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171—209
第一章	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	172
第二章	在伊尔库次克	182
第三章	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194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205
第五篇	国共合作的开端	211—257
第一章	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	212
第二章	在广州的会议	217
第三章	从联合战线到加入国民党	231
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251
第六篇	国共合作的发展	259—332
第一章	二七罢工的失败	260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282
第三章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303
第四章	国共初期的纠纷	321

第七篇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333—361

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334

第二章 受军法审判343

第三章 狱中的见闻与苦思352

第八篇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363—386

第一章 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364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373

第 一 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第一章

洪江会造反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原是很安静的上栗市（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突然惊慌起来。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播了开来。从四乡来赶集的农民们忙着收拾了买卖，急步离开这个热闹的市场。住在镇上的妇女和小孩们特别慌乱，纷纷向外逃避。店铺的人们陆续关上门，收藏起货物。约摸下午五时，各街道入口处的木栅门（可以说是轻便的城门）都关上了，市镇和四乡的交通就这样断绝了。更夫忙着通告各商店住户谨防火灾。

我那时才九岁，在这市内一所私塾里读书，自然对这乡村社会里层所发生的事故是茫无所知的。这间私塾是我父亲的朋友廖石溪先生所主办，共有十几名学生，包括廖先生自己的儿子和他的一些亲朋的子弟，其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都寄住在这私塾里。那天恐慌到来的时候，恰恰廖先生因事下乡去了；我们正在依照他的吩咐，自行温习功课。在这当儿，几个年长的同学好奇的跑到外面去看热闹；多数同学先后由他们的亲属赶来领走了。只有我和几个家居较远的同学仍滞留在塾里，不知如何是好。

镇上木栅门关闭以后，我那年轻的四叔，他是这私塾

里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匆匆从街上跑回塾里；引着我和两个姓文的小学生，沿街走到一个豆腐店里；把我们从豆腐店后面窗口吊下去，指点我们越过小河，循着隔河的大路走向文家。他并且叮嘱我们说：“快走吧！千万莫在路上耽搁，天快黑了！”他瞧着我们涉水渡过这条宽而浅的小河后，他的影子也就消失在那窗户的后面了。

我们三个小孩子一路走去，并未遇着阻拦，沿途也有些来往的行人，空着手和挑着东西的都有，静悄悄的匆忙走过。我们走到约五里路的地方，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这里离文家尚有一里多路，那店铺里的管店先生认为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而他又因店铺无人看守，无法抽身护送我们；因此留我们在店里吃饭过夜，我们也就答应了。

大约是半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喝醉了酒的大汉，把我们从床上抱起来放在店铺的柜台上。我们从梦中惊醒，看见他们抽出刀来，吓唬我们。有的说：“杀掉这三个小孩祭旗吧！”有的说：“试试刀也好呀！”那位管店先生却急于为我们解脱，请求他们让小孩们好好去睡觉；并邀请他们喝酒吃东西，原来那管店先生和那些大汉竟是同党，他的话因而发生了效力。那些大汉闹了一阵，后来也就离此他往了。我们三个小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回到卧室去，惊慌减少下来，重入睡乡。

次日清晨我们醒来，看见店门大开，管店先生已不见了，店内的布匹、食物、草鞋等货物都没有了。我们三人再走出店外一看，大队农民队伍，穿着形形色色的短衫裤，正

由大路上成单行的稀稀疏疏的走过。他们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大刀、马刀、木棍、锅盖等等武器，却看不见旗帜，也没有什么叫喊。在这种肃静气氛中，并没有显现出造反的热情。我们三个小孩站在路旁观看，也没有人理睬我们，不一会我们看厌了，才循着一条去文家的岔路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们到达文家大屋，发觉屋内已空无一人。我们到处搜寻，直到我们跑到屋后的山边，高声叫喊，才看见一个人从山上树林里踱了过来，把我们带往山林深处，我们就在那里与文家的大人们会见。文家父兄都急于问我们怎么这个时候跑回家来，市镇上和大路上发生了甚么事情。我们把经过情形都一一告诉他们。他们则说由于得到消息太迟，来不及去接小学生回家，又说了一些他们忙于逃避的情形。文家和我家虽是世交，但我还是惦念着家里。他们对我备加安慰，说到我家远在二十里外，不能回去，就近在这里安身，那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我在文家住了约十天光景，头几天曾有小股“会匪”光临过他家，虽没有发生严重的抢劫，但是文家的人已如惊弓之鸟；带着我一齐躲避在山上，蜗居在山窝里临时支起的帐篷里面。后来风声缓和下来，我和文家的老少妇女们又悄悄的回到他们的家里住了三四晚。在这段期间，文家大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这件造反的事情上，也有一些乡邻戚族们来回报告有关的消息。他们所谈论的无非是那些人参加了“会匪”，造反队伍如何集结行进以及怎样遭受失败等类故事。

文家的大人们获得消息，确知他们曾经信托过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更显得惶惶然，这大概是怕牵连到他家的原故。他们曾有过这样的猜测：“管店先生也许是为了避免地方上歹徒们的罗唆，才加入帮会，以期获得庇荫。”当他们听见邻近的乡人们有些随着造反队伍出发，往往会提出某一个名字说为什么这个安份守己的人也造起反来了。文家这个乡绅人家，不用说对于造反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竟有这许多乡人都卷了进去，实在使他们大惑不解。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在文家躲藏了十天以后，乱事似乎是平静了，交通恢复了，我家派了人来接我回家去。我安然回到桔木山家里，曾为我耽心的母亲和家里的大人们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他们对于造反的事，心有余悸。谈到下列的一些要点：我家大人们在阴历十月十九日（即公历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六日）傍晚已听到风声了，忙着把家里贵重的什物搬到山上去，人也躲藏在山林里。当晚，有一个洪江会的千总就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集合了从各村来的党徒上千人，杀猪造饭，吃饱后再行进。屋前屋后都是火把，他们在广场上升旗，叫喊，叫做“誓师前进”。

广布在湘赣一带的洪江会原系洪门圈子里一个后起的较小支派。洪门起于明末清初，为明朝遗老所参与的一个秘密结社，在太平天国时起过重大作用的天地会、哥老会、

三点会、三合会等等均系洪门内著名的组织或支派。在清代的各种秘密结社中，洪门是较为进步而又是最有势力的团体。它一直标榜“反清复明”，但为了避免镇压，这一政治目的是埋藏得很严密的，只在必要时，拿出来一用（如洪江会造反时），平时却显得是一个神话和迷信交织而成的江湖义气团体，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这团体的政治性被冲淡了，而且逐渐包容了不少为非作歹的分子，常做些包庇营私的勾当。人们统称之为“洪帮”，官厅称之为“帮匪”或“会匪”。

我的家乡成为洪江会的一个重要据点，也不是偶然的。上栗市是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的中心市镇，离萍乡县城八十里，离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的边境都不过二十里左右，水路能通长沙汉口，那一带正是横亘湘赣交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山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和麻布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贾负贩往来湘赣鄂等省的也素称频繁。沿着罗霄山脉更有许多土式的小煤矿。各小煤矿之间和矿工之间常有械斗事件发生。小股土匪也常出没于这一带的山林间。这种两省交界、当局统治力薄弱、而又土产丰富、商业发达、械斗成风、地方不靖的地区，正是江湖团体滋生的温床。

几年以前，洪江会的党徒们即在湘赣边境上开设了一些赌场，这种赌博的性质类似上海的花会，当地名之为“开标”。开标办法是分三十六门下注，如果押中了，赌场就一钱赔三十钱。每天开标一次，上午赌场派人到各乡村去找下注的人，下午四五时开标。洪江会的头目们就利用赌场

的“交通”人吸收各地乡民入会。如果湖南的官厅加以取缔，他们就往江西跑；江西官厅取缔，他们就往湖南跑；而湘赣两省的官厅又难于一致行动，所以他们能自由发展。三五年下去，赌场的势力愈形膨胀，加入洪江会的乡民也就多起来了。

洪江会专在下层社会中发展组织，入会的最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和负贩挑夫之类，自然也包括不少地痞流氓。地主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这个秘密帮会以江湖义气相号召，加入者觉得可以得着一种保障，无论做甚么事都不会受人欺侮。何况加入的人既未受到甚么严格的约束，那时这帮会也没有昭彰的恶名；因此，下层社会多乐于参加。

成为洪江会指挥中心的那一带的赌场，组织算是不坏的。它们很能赚钱而又颇有信用，从没听见赌场有明目张胆欺负乡下人的事发生；所以乡村富户参加这种赌博的也不少。而且赌场和洪江会的活动展开以后，这一带就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小股外路土匪就不敢在这里出没，抢劫的事倒反稀少了。因此，一般人最初预料不到洪江会会有甚么惊人的举动，也不觉得它们的活动对地方上是十分有害的。

一九〇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首脑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政治企图，四乡的风声便渐渐紧起来。最初是一些反满的故事和神话在传播着，接着又在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即明朝的明字），以为标记。那

家大门上没有“明”字标记，就是败类。后来洪江会更标榜出两个主要目标：“反清复明”和“铲富济贫”。“反清复明”是洪门的老口号，那时已无“明”可复，其主要含意还是发泄排满的民族意识。“铲富济贫”这口号比“反清复明”的口号渊源还要早些，中国历史上的叛乱都有这种类似的口号。可是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明确。一般说来，只是将富户的钱粮没收过来，发散给那些嗷嗷待哺的贫民罢了。

洪江会起事逼近了，纪律也宣扬出来了。所谓“三刀六眼”，原是洪江会圈子里一种早已订下的严重处罚，那是说，谁要背叛了洪江会，或者违犯了它的重要会规和纪律，就要被刺上三刀，并且要现出六个眼来；即每一刀要有一个进的眼和一个出的眼。这种帮会的制裁办法虽然从未听见真正实行过，但其残酷性足以吓唬乡下人，也能藉之维系其本身团结，作用是很大的。

洪江会更将它的党徒按照部队的形式编组起来，依据乡村地域的区划，每十个壮丁编成一个最小的单位；由洪江会的大头目就十人中指定一人做什长来统率。十个什长之上指派一个百总；十个百总之上指派一个千总；千总之上还有统领等名称。起事前这个区域里洪江会的大头目觉得党徒众多，一切似以准备就绪，又因秘密泄露，乃决定突然发难。发难的日期是非常秘密的，一般人事先毫无所知，官厅方面当然更不知道。那天上栗市惊慌到来的时候，即是洪江会的头目们正在下达集合的命令。这个命令的要点，大致是指示各什长、百总和千总召集部属，配带各人已有的武器，按时向指定地点集合，并向指定地点行进等

等。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个小孩在文家店铺门口所看见的农民队伍，也就是依据命令集合起来的一支。

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用的是甚么名称，其领导人物又用的是甚么头衔，这是一件传说纷歧的事。只知龚春台确是这次起事的首脑，乡间称之为洪江会大头目或大统领，据说他曾出过一些布告，但这一点我已找不出可靠的根据来。

龚春台不过是洪江会萍浏区域的大头目，并不是整个洪江会的最高首领。洪江会的大首领是哥老会的马福益。龚春台的造反计划是将各处集合起来的会众，一起集结在浏阳南部的某个地点，由他统率着浩浩荡荡的杀到浏阳县城去。他心目中大概以为占领浏阳县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设想只要占领了浏阳县城，将造反的旗帜高高树立起来，散布在各地的洪江会就会闻风响应。

一九〇六年夏秋之间，湘赣交界一带地区发生旱灾，十月间这一带的人民已感觉米珠薪桂，人心颇有浮动。龚春台就利用这种饥荒情况，号召党徒，说打下浏阳县城，没收富户的钱粮，大家才有饭吃。据说他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同行进，准备打下浏阳县城可以分得粮食，这一点也是他能够号召大家起事的一个主要因素。

龚春台和其他洪江会头目们发展党徒和办理赌场，表现得很能干；但对于作战一事，却缺乏应有的准备。据说龚春台确曾集结了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声势不为不大。可是他并没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那些大小头目们又都是临时集结起来的新手，显得有些盲人瞎马。因

此，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两天的行动中，不能按时合理进餐，有些分不到房屋休息，居住行动又无规律，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等折磨。而且这支莫名其妙的农民队伍，在造反心理上是没有得着充分鼓舞的。这群人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逃亡回家的想头，也不曾充分警觉到造反失败后的严重后果。

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即公历十二月八日），这支造反队伍进到离浏阳县城很近的地方，就遭遇到少数洋枪队的抵抗。原来城内官方得到消息后，在十分恐慌之中从事戒备，紧闭城门；并派出几十个人的队伍，携带仅有二十六支步枪，出城作无可奈何的堵截。可是这支造反队伍却在洋枪队隔河稀稀疏疏的射击之下，密集在大路两旁乱作一团而动摇起来了，只支持了不久的时间，队伍就因失去了控制开始大批逃亡。据说当时这种逃亡情景有如堤防溃塌、大水奔流一样。头目们在队伍溃退下来之后，曾采取过整饬部队、分股活动等步骤，但大部分党徒已经逃亡了，无法再行集合，剩下来的各小股也觉得形单势孤，士气低落。在官军进剿的风声日益紧急的威胁之下，继续活动了几天，头目们认为大势已去，终于采取了解散队伍、分途躲藏的步骤。事后官方曾大事宣扬说：“十万洪江会被二十六支洋枪打垮了。”

洪江会进攻浏阳之役是这幕造反剧中最主要的表演。龚春台所统率的那一支队伍是其中的主力军。邻近萍北浏南一带的其他地区的洪江会，虽曾有过一些响应和零星的行动；但他们听见浏阳县并没有被打下，主力军业已溃散

的消息，也就看风转舵，消声匿迹，不敢再有所活动了。广布在各地的洪江会不能同时发难，显然是这个组织一向缺乏统一领导的原故。这样，一九〇六年洪江会的造反，就和历史上若干次未成熟的“会匪”、“教匪”的起事经历相似，宣告流产了。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家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去陈设在大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百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

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间正等也跟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

座庙里。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阎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小孩们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到我家，表示谢意。我

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颞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富的能干人才；也没

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

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是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

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会第二号首领黄兴，在一九〇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一九〇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们注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

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〇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卤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卤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

的、划船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的观念，而对于像黄先生这样的议论更是日益倾倒。

反对旧的、腐败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必须富强起来，以及中国人不再做东亚病夫等观念，大为新进者所向往。小脚、鸦片、迷信、官厅，是当时最受攻击的四大对象。妇女缠足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恶习，当学生们看见他们自己和别人家里强逼女孩子包脚时往往会跑去大吵大闹一番。声言这是虐待女子，其祸足以弱种亡国。吸食鸦片烟的人在萍乡虽不算多，但学生们偷着去毁坏亲友们吸鸦片用具的举动，也是发生过的。打庙宇、毁神像、反对向泥菩萨求药方、问吉凶等类的事，更是轰轰烈烈的排演着。学生们常常因此与一般善男信女发生龃龉。衙门官吏差役的那种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样子，是青年人看不顺眼的，常借故去嘲弄官吏，故意损害衙门的威信。这一切的一切，可说是一种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不过还没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往往只是一哄而起的闹上一阵而已。

反对蓄辫子，是反对满清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们特别起劲的事。一九〇八年十一月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我在辫子上戴着一条白布的孝带，从

家里回到学堂，曾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带立刻除下来。那时同学们不仅反对为帝王戴孝，而且根本讨厌辫子。他们起初说辫子会弄脏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后来就简直咒骂为猪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满清奴仆人的标记。

一九〇九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准备了几把利剪，首先剪去他们自己的辫子，预备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预备乘学监（即校长）和所有教职员睡觉的时候，也偷偷的把他们的辫子剪掉。在他们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四百余拖着辫子的师生忽然没有“尾巴”了的奇景。结果他们只剪了二十九个同学的辫子（连他们自己在内），就被发觉禁止了。当时学监舍监们对于这件事忧伤得如丧考妣，认为这是反叛的行动。他们更觉得自己是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惧着他们的脑袋有些靠不住了。

我们学堂是属于萍乡教育会管辖的，所以教育会的会长对这件剪辫子的事要负最高的责任。这个会长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过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员，那时丁忧在家，致力本县教育事业。这位老先生听到这个坏消息，连忙从乡间赶到学堂里来，非常沉痛而严厉的向学生们训话：“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这位会长与我家有亲戚关系，还特别向我和其他几个也是他亲友的子弟们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好在这位满清官僚和官厅来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经过他的多方疏通，这宗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了。剪了辫子的二十九个学生各记大小

过各二次，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学籍，而且限制他们在学堂内蓄起头发，恢复辫子后才准出外。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是更加严格了，学堂当局想尽种种方法，不让“异端邪说”再行侵入，不许学生谈论时事，只是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中，得到一点有关变法维新和革命排满的消息。一般说来，外间的新书刊是不容易进到这个区域和我们学堂来的，但同学中也有人偶然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片断的违禁书刊。偶然得着了，那我们就如获至宝，暗中传阅，交头接耳的传说开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维新，甲午一战，中国屈膝，继之乙巳又败强俄，这种维新强国的例子，确给予了当时积弱的中国的青年们以莫大刺激。他们痛恨满清政府的顽固守旧，腐败不堪，将酿成亡国灭种之祸。如此痛心国事的感触，已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设想之下，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当时维新论者认为效法日本的维新立宪，就可以自强；而革命排满反足引起长期混乱，招致瓜分亡国之祸。革命论者则认为保皇变法，无异痴人说梦；非根本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无法得救。这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念和康梁的维新主张在青年们中传播着，并且引起争论。

因变法维新而被幽禁的光绪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

几乎无人不相信这是后党的恶毒阴谋。这一宫廷可耻悲剧的演出，使维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据。溥仪以三岁稚龄登基。载灃摄政，亲贵权势反更增加。所谓预备立宪，显然是虚伪的粉饰。清庭以铁路作抵押大借外债，乃公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不特使已缴铁路股款的人民权利为之丧失，且有路亡国亡之痛，终于激起了川湘鄂粤等省的保路风潮。这些演变，表示出满清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学堂里的青年们也就在这种演变中，日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

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以新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青年运动。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学堂成为革命的温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并进而鼓励革命青年参加满清政府所创立的新军，以便接受军事训练，并掌握军队。于是革命活动的范围由联络会党而扩大到了运动军队。

一九一〇——一一年间，许许多多同学居然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进而抱着“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趣，以参加新军为荣。他们瞒着家长和学堂当局，秘密填写志愿书、履历表（有的还伪造保证人的签证）纷纷前往投考新军。甚至有些年龄不合格的幼年同学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学还兴高彩烈的宣称：“参加新军，拿起枪来，才能实行革命。”

学堂当局目击许多思想激烈的同学忽然失踪了，既恐慌又惊奇，他们为了避免将来闹出事来有所牵连，进行严查密访，设法阻止。我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在同学中年龄较小，没有资格去投考新军，而且也被学堂当局视为是一

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其实我对于那些投考新军的同学却同样兴高彩烈的在暗中予以赞助，对于为他们凑旅费、填写报名单等事，是特别热心的。填写证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灯就寝之后，在床上把帐被严密遮着，点上一枝小蜡烛，秘密进行。寝室内外还要有些同学担任传递暗号的工作，以防舍监们的查究。

事态这样演变下去，震动全国的武昌双十起义终于爆发了。

武昌起义以后，萍乡也大为震动。我父亲特地到县城来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长沙宣告独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继独立了。各地都在纷纷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十一月三日发生，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逃走了。革命派推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标为都督，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有些混乱，但革命作为也算是有声有色。

我家庭对革命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青年子弟出外，并且要我们留着辫子，等到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一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另一方面根据传说，认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即江湖医生——能否主宰中国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们和兄弟们常常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对于家长们的措施深为不满。结果我家里二十几个青年就在大厅里公然全体将辫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对于家长是一个重大的示威。家长们对这

一幕大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心中也许想着子弟们的动作是对的，不过做得早一点罢了。我们这群青年觉得占着了上风，有的进而要去参加革命军，有的要为革命宣扬和奔走。这种对满清灭亡的称快和对中华民国诞生的兴奋，充分的流露出来，而再也无法加以抑制了。

革命的浪潮“就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撞击着我那古老的_的家庭，我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所说的一段话，最足以形容出这些年代中这个家庭所经历的种种变故。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个月夜里，在桂林的六塘镇上，也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时候，我的老母缅怀家园，向我叙起家常来了。她说：“儿呀，你还记得你的外祖母家么？那是你八岁时去过的地方。”我回答说：“妈，还记得一些。”母亲接着说：你还记得外祖母的花园么？那里面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也称得起雅致的，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几块横匾。那是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善良的念书的人家。家里的人口并不算少，忠厚持家，不愁衣食，经过这三十年的变乱，眼看着这个刘家完全败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你的年青老表，在外面做工营生。

母亲又接着说：我家比起外祖母家来，光景也好不了多少。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祖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搬到这两省交界的山区里居住，虽然是客籍，倒也相安无事的住了下来。中经长毛等变乱，听老人们说，我家倒没有遭受到很大的骚扰。这个超过一百人的六房人家，勤俭耕读，从没有人抽鸦片、赌钱，也不过问地方上的是非，倒在本乡做了不少的善事，乡邻戚族，熙来攘往，互相敬

爱，安居乐土，一切倒也顺遂。

她接着说，那年洪江会造反，兵勇会众都闹到我们家里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接着革命排满、军阀战争、北伐、闹农民协会、闹共产，一次比一次激烈，我家所受的磨折也就一言难尽了。到了国共对拼的时候，家乡一带更常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今天什么红军游击队来了，我们家里老是驻扎着什么司令部，还有什么政治保卫局，关犯人、杀反动。明天剿匪军来了，也驻扎在我们家里，同样的在那里关呀！杀呀！这样来来往往，不知有过多少次，我们的老家简直变成了一所凶宅！家里的古老家俚和文物等等已是荡然无存。他们为了搜寻我家窖藏的金银钱财，有的住房的地下被挖穿过三尺，周围的山林都荒芜了，茶油树等等都被他们砍下当柴烧了。

老母亲还说到我那活到八十九岁的老祖父，如何被农民协会公审，以及他晚年逃难时伤感的情景，他特别为他的第二个女儿被游击队绑票勒索的事，大为愤慨。她也说到我那在八年前去世的父亲为我受了许多磨折，晚年郁郁不乐，但仍疼爱我这个做共产党的儿子，不加责备，也无怨言。她说到我这个著名的共产党人的家庭，由于我的牵连，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官吏的多次蹂躏。她提到她自己的六个儿女中，有两男一女在这些变乱中夭折了，和她自己在逃避战火中几乎丧失了生命等等遭遇。

老母亲说到这些往事时，已是大为伤感，但仍强自镇定，又絮絮绵绵的说道：这一大家人就在这些动乱中逃亡在外，有的还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再也不回老家了。只

有他自己虽然也常在外面逃难，总是依依不舍，守着这个老家。现在尚在人间的子弟们有抽鸦片的、赌钱的、干帮会的、干国民党的、干共产党的，其中有些境况不坏，也有破落不堪的，可以说是远走四方，各奔前程去了。只有每年她在家过生日的时候，还有二十个上下的子弟们从各处来给她拜寿，还看得出一点旧时风光，但情景究竟今非昔比了。

我当时极力安慰我那七十二岁高龄的老母亲。伤感的事真是太多了，我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也是其中之一，我说：“如果我能返回童年的话，我愿从新经历这半生，也许遗憾要少得多。”母亲听了我的话，反而向我劝解，说她平素极不愿提起那些令人伤感的事情，只因我二十六年没有回过老家，已往又音讯不通，家乡种种我不会完全知道，因此，她略略告诉我一些。她常听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处境太坏，时代变迁得太快，和新旧斗争得太激烈的缘故。生在这个时代，苦难惊险是难免的。果真抗日战争胜利了，也许日子将要过得好一些。老母亲于伤感叹惜之余，就这样希望着。

第三章

民国成立以后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宣告诞生了。这件废除数千年专制政体、创建共和的大业，曾使举国有志之士欢欣若狂，认为是国脉民运的一大转机。可是这中华民国自呱呱堕地的日子起，一直在苦难中挣扎着。

中国换了一块招牌，究竟也有些改革。讨厌的辫子是公然剪掉了；专制的礼仪，大部分废除了；言论比较自由了；县知事在名义上已不再是父母官而改称为人民公仆。

辛亥革命虽没有引起重大的破坏，但社会不安，人民疾苦，都没有实质的改善。北京政府除借债渡日外，还辟新税、增税率来从事罗掘。各省又多各自为政，任意发行纸币，就地筹款。因此，民间所遭受的是形形色色的钞票的贬值，过去苛政未除而税捐反更加重，这些切身的痛苦，开始冲淡了初期的美丽憧憬。

一九一二年三四月间，我又回到萍乡县立中学校（这时萍乡小学堂已改称为萍乡县立中学校，并改由所谓新派人物主持）继续我的学业，那时萍乡县的都督衙门已经裁撤；县治仍归江西省都督管辖。城里秩序是恢复了，但还充满革命的特殊气氛。不少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都摇身一

变而成为满口新名词的时髦人物。

不久革命伟人黄兴光临我们的县城。他认为丙午萍浏之役与他本人有密切关系，因此乘着回到湖南家乡之便，特地来凭吊这个首先发难的革命圣地。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曾开会欢迎他，县城里许多时髦人物都挤来参加，要一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采和亲聆他的革命说论。他仪表堂堂，缺了两个手指，那是他从事革命的光荣标志。但他的那篇演词，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这也许是他的湖南腔不容易听懂吧！

一般说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局势暂时安定了。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在北京开始集会，陆续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都经北京政府于八月十日公布；这些算是中华民国奠基的工作。一般革命人物多以为破坏业已告终，建设正在开始，应该转而注重于国会的选举运动。这种情势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的是：师生们对于国家前途多抱乐观，开始安静下来渡教学生活。只有一次我的同学们捣毁了县城里最大的一所庙宇——城隍庙。可算得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最大的一次“革命行动”。这件事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感，学校主持人也觉得在民国成立以后，不应该继续做这类破坏的事，纷纷劝诫学生，不可再行如此。

袁世凯一直是抑制国民党的。到了国会选举揭晓以后，可以由国民党操纵的国会，因此成为他的眼中钉；宋教仁更是他的最大政敌。于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宋教仁在上海北站被刺身死的事件。这件事发生之

后，袁世凯和他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主使谋杀的种种迹象，喧腾中外，革命派更为之大哗。

宋案是国民党与袁世凯公开破裂的起点。袁世凯原是满脑子的帝王思想，与近代民主政治是格格不相入的。不过他那时还不敢为所欲为，有时还采取一些粉饰门面的手段。到了宋案发生以后，就进而执行公开打击国民党的强硬政策。始则不经国会同意，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并即布署军事，撤换赣皖粤三省国民党人的都督。孙中山先生乃奋起号召抵抗，因而发生了第一次讨袁战争的赣宁之役。这年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首先发难，安徽、江苏、广东、湖南和福建等省相继响应；但旋即先后为袁的武力所敕平。

在袁世凯权势炙手可热的形势中，我们县城和学校里一些假冒革命的时髦人物，多转而向袁世凯歌功颂德；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一部分教员却因此更不齿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尤其我们同学在革命前后参加军队的，这时多是李烈钧的部属。他们在湖口之战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下落不明；这件事曾使我和许多同学感到深深的怀念和同情。

萍乡原是革命势力有基础的地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也从没有停止过。我虽没有参加国民党，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幕详情；但确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当时有一位年龄较长姓陈的同学，混名叫“陈矮子”，在国民党反袁的斗争中担任秘密交通的任务。他住在城内陈家祠堂里，有两间自用的房间，常利用来接待秘密来往的革命党人。因为我和他

的见解相同，他也以密友相待，所以这一切都不瞒我；并且常要我帮助他做些送往迎来以及搬运违禁物品的任务。这些事在当时穿着学生制服去做，似乎危险要少些。这样，我开始学着做革命的实际工作。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

萍乡中学校的学风，在动乱的局势中并不算好；学生们胡闹顽皮赌博等事，常常发生。一九一四年二月间阴历新年，几个小学生作新年赌博游戏被发觉而将受到严重惩罚，我挺身而出辩护，与舍监发生争执。那位颜舍监认为我言语嚣张，侮辱师长，要开除我的学籍。有些师友们劝我向校长表示悔过，以期减轻处罚，我拒绝了，决定到省城我所向往的一所较好的中学去。这样，我就离开了萍乡中学，抵达南昌，插入了心远中学继续学习。

心远中学是熊育锡先生所创办的。这个学校在初创的时候，以培植少数熊家的子弟为主。后来负笈者众，成为江西省城一间颇负盛名的中学校。它的特点是注重科学和英文，奖励学生投考清华或其他新式大学，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等等。熊先生貌似猴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与严复先生相友善。

我这个初由萍乡中学转来的学生，最初是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受了学校风气的影响，兴趣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就是我当时所用心读过的第一本翻译书籍。从这时候开始，我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

门。

这年七月间欧洲大战爆发，学校里宁静的学习生活，也被搅乱了。日本于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九月二日出兵。在我国山东登陆，十月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不顾我外交部的抗议，强行管理原系德资经营的胶济铁路，十一月七日又占领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这些事曾引起同学们的愤慨，认为是日本别具野心，乘机侵犯中国的权益。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面递二十一条的书面要求。全国各地报纸每天都用大字揭露这一新闻，认为这是日本乘着列强无力东顾的机会，企图灭亡中国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学校里从校长到全体同学，都为这件新闻大大激动起来，一致认为二十一条关系中国生死存亡，非奋起抗争不可。

就在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这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竟向我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日本要求作满意的答复。北京政府不得已如期屈服了。这件事举国一致认为是莫大的国耻。我和许多同学都十分悲愤，那时还没有学生团体的组织，但大家结伴到街上去，按照报上的记载向市民宣传反日，抵制日货。我开始注意中国的近代史和印度、朝鲜等国亡国经历的记载，常与师友们纵谈当前救国大业，有时想借助于基督精神，有时又想从注重体育入手，一心

一意思寻求出一个救国的大道理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袁世凯公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宣告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十月八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由所谓国民代表在各该省分别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十月二十八日起各省就排演起来，伪造了“一九九三票完全赞成君宪”的结果。

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些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我们的校长熊育锡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们看到这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于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致颂扬，往往竖起大拇指说：“熊猴子毕竟要得！”

当袁世凯兴高采烈的筹备登基大典，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预定于二月九日君临天下的时候，各省反袁的革命行动也就纷纷爆发了。各种打击纷至沓来；他终于在当年的六月五日抱恨而去世。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军事独裁者的下场。中国的局势似乎又是绝处逢生有些转机了。我们一般同学们，又都怀抱着国家前途和个人学业或能步入佳境的期待。

第四章

与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

一九一六年七月间，暑假开始，我到浙江象山县去省视父亲（他原任法官多年，那时任象山县知事）转回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那时袁世凯已死，北京情形有些好转，我所仰慕的蔡元培先生于数星期前被任为北大校长，我想像北大可能有一番新气象，因而决定去投考，父亲也积极支持。由于我二叔的介绍，在上海与革命党人叶伯衡先生同住。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在一起生活。

叶先生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那杂乱拥挤的首善里内一幢住宅的前楼。屋内陈设简陋，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棕棚床上只有一张破席；桌上乱七八糟的堆着书籍报纸。他穿着破旧，道貌岸然。他看了我叔父给他的介绍信以后，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在高兴之中又有点为难的样子。他亲切的告诉我，他是在过着革命党人穷苦而危险的生涯，对于我这个准备投考学校的学生是颇为不便的。他要我另找地方居住，以便安心温习功课。我说我喜欢革命党人，也乐于尝试这种生活的味道。他高兴得笑起来了，于是张罗来一张床，殷勤的招待我这不速之客。

一九一三年赣宁讨袁之役以后，袁世凯对革命派一直

大肆压迫；国民党确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不少意志不坚的党人，脱离了革命阵线而消极起来了；有些甚至投靠袁世凯。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先生为了重整革命阵容，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加入者均须按手模宣誓服从孙先生。知名人士多因此不愿参加，革命阵容颇有混乱。那时虽是在云南起义之后，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们荟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仍是不少。袁世凯虽死，他的党羽还是继续在上海压迫革命党人。

那位叶先生看来也是中华革命党的一分子。他首先告诉我，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爪牙在上海仍然是很猖獗的。他要我立即将英法两租界交界的路径弄清楚，因为陆建章（袁世凯的特务头子）那杀人魔王派来的许多下属都住在英租界，他们不敢在法租界闹事，往往将党人骗到英租界去，再用绑票的方式加以逮捕；如果被逮捕去了，那就有杀头的危险。他特别警告我不要常和革命党人一同在马路上行走；尤其不要和他们一同到英租界去，以免意外。

他向我描述他在上海生活的情形。他困处在法租界，衣物都典尽当光了；有时甚至没有饭吃；向朋友借贷更是常有。他告诉我，亡命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有的穷得连长裤子都没有了；往往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穿出去。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他笑着说，他也快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我听了这些话，对于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禁油然而起同情敬佩之心。

到叶先生住所来聊天的革命党人是常有的，我也常随同他去拜访他的革命朋友。那些人大半是江西、湖南、湖

北等省人，几乎个个都是十分穷困。其中有些后来在国民政府中位居显要。我那时和他们晚上赤着脚在法租界马路上纳凉散步，有时买些便宜的酒食，回来享乐一番。几杯下肚之后，他们便大发牢骚，畅谈时事，他们痛恨袁世凯及其党羽，毫不厌倦的叙述袁世凯及其家庭的一切丑史秘闻。

对他们的议论听得多了之后，我也曾发出一些问题。我曾问：袁世凯和他那一群军阀既然这样可恶，革命党有甚么办法对付呢？回答往往是：我们有孙先生领导革命。我又问：如何革命呢？回答往往是：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用手枪炸弹对付。当我问到革命成功之后又如何？他们的回答总是不一致的。特别当我问到对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事，革命党持何态度时，他们总是侧重指责袁世凯的卖国。这一点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的侵略似无足够的重视。

我和叶先生同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在那里准备功课，应付考试。叶先生这个人有点崖岸自高，落落寡合，对革命也不免有些不得意的牢骚。不久，他得到书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的赞助，到印尼椰加达一间华侨学校去教书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

这时候，我一位奔走革命、担任过革命军团长、经年未见的表兄杜君来到了上海。他和另外七个青年同住在一间旅社的一个小房间里，大家睡在地板上，真像沙丁鱼一样。我们异地相逢，特别亲热。表兄要我等叶先生走后，搬去和他同住。我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那个小房间里又多了一条沙丁鱼。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军人是从武汉、长沙、萍乡一带来的。袁世凯死了，讨袁战争结束，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总部派他们暂到日本去学习，待机活动。他们每领到一些旅费，就大玩一阵。他们热情充沛，天真活泼，最爱高谈自己的英勇往事，显然有点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们特别起劲的事。我虽和他们同住，但在兴趣上并不与他们同调，我喜欢逛书店、浏览搜购爱读的书刊。我有时向他们打趣似的说：“你们这些英雄好汉，为甚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往往这样表示：“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他们的行期并不确定，只要船票到手，说走也就立时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从书店归来的时候，他们已全体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因赶着上船，不能候我回来，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以学识和远见，将无事不可为了。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

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我经上海第一次到达北京。

作为首都的北京，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天安门、紫禁城、中南海、天坛，和许多巍巍的宫殿大庙、王公府邸、红墙绿瓦、雕龙绘凤，不愧为旧式建筑艺术的结晶，却也标志出帝王时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坐着轿车、戴着大红顶子的过气王公大臣，依旧待漏神武门，向逊清皇帝溥仪朝拜。旗人男女们相见时打千问安；洋车夫满街叫喊着“老爷、太太”。大商店对顾客恭敬迎送，气派十足；这一切都是封建积习的残存。

东交民巷俨然是北京城内的一个特别区；其中使馆、银行、洋行等等大厦林立，四周筑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象征着列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门大街，不免使人触目惊心，回忆起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惨痛往事。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

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①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量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大半是新旧同学夹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

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

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报刊也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动亦较为显著。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

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〇六年同盟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动，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许是很合适

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颜色中表示不以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 ①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任第一任的管学大臣，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了衙门的气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筹办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成立，改称为北京大学，由严复、胡仁源先后任校长。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继任校长。这是中国一间最早由官办的正式大学。
- ②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一九一三年陆续刊登于《不忍杂志》，主要主张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消私有财产，以进入人类于大同的世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最急进了。中华书局有单印本。

第六章

“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化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日元，借款条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

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曾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

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分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言人，我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分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

“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从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并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的胜

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际联盟和无赔偿、无割地的和平理想，并于一月八日向国会演说，提出有名的十四点主张，强调民族自决。当时中国一般青年对于威尔逊总统这种主张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国又赞成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自然更为中国人所乐闻。

可是消息传来，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和会根本不加考虑；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议程；山东问题更因日本与英法早有秘密协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条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表示过反对，但为势所迫，抛弃了他对中国的诺言，也公开妥协了。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它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俩，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企图使北京当局接受和会关于断送山东权益的条件。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那里有甚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

第七章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醜颜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时间愈快愈好。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回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我这提议立即得到全体到会者的热烈赞成，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说北京学生尚无学生会的组织，发动一次共同行动甚为不易，应当乘势组织各校学生会；有的认为向曹汝霖问罪，应该是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才能具体的表示国民的公愤。

为了实现这些意见，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的步骤。推定易克嶷同学任大会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中发表演说。我们商定了具体进行办法，决定向各学校同学展开沟通意见的活动。根据这个决定，措词激昂慷慨的布告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群起响应，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时，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北大同学一千多人几乎是全体出席，其他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在易克嶷主席宣告开会，说明宗旨之后，我即登台发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张。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说，情绪不免有些紧张。我的萍乡土音又很重，例如“群众运动”这个重要名词的发音，就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不容易为人所听懂；但还是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后来一些同学由于这次演说，常亲切的笑我“群众运动”这四个字的发音，“群众运动”四字，几乎成为我的浑名。继我上台演说的是有名的“大炮”许德珩，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还有同学谢绍敏的当场啮破中指，在一块白手巾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更激起全场的愤慨。大会于是一致决定联络各校同学，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各校到会的同学们也当场表示热烈赞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

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诤诤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踊的向天安门出发了。

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达到天安门的。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队伍都如约先行到达了；总共有三千多人。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以后，队伍即浩浩荡荡的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口号和旗帜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预定计划转赴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大队同学即一踊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

顿。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大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积在宅院中已经捣毁了的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他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势迅即扑灭了，并开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三十二个同学被陆续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这日北大同学们游行归来已近黄昏，虽已饥疲交加，但精神仍极抖擞，纷纷议论此后的对策。我们对赵家楼一幕的表演精采引以为快，但对于三十二个同学的被捕和即将到来的压迫，深感危惧；几乎都一致认为大事临头，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无退缩的余地。我们决定五日上午十时再举行学生大会，进行组织北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学生的实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的军法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大。虞是一个旧官僚，虽然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开始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严刑。同学段锡朋挺身与之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再接再厉的干下去；如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已。这个官僚竟为学生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等语，就离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时左右，北大学生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情绪中决定：立即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共同组织，要求各校一致参加；推举段锡朋、方豪为北大学生会参加这个共同组织的代表；并推举狄君武、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陈剑修、鲁士毅、钟巍和我等分别担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文书、总务、讲演等各部门的工作。

当天下午又在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二十个学校的代表参加，通过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清华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以及女高师等女子学校也纷纷组织学生会，并先后加入学生联合会。这样，这个共同组织就名符其实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这次会议还决定：学生联合会以“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为主旨，提出“收回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具体要求；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响应。这个代表会议后来根据学生联合会章程改名为评议会，负责决定政策方针。评议会由每校推派两位代表组成，其议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处事的敏捷果断，确表现出它是指导爱国运动的重心；所以当时舆论誉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最优良的“雏型国会”。

这次会议为了迅赴事机起见又决定：以北大学生干事会代行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职权；因此，北大就成了这次运动的总枢纽。我这个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讲演的人，也就成为学生联合会第一任的讲演部长；所有学生联合会

的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体、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工作，都由我所领导的这个单位来执行，事实上此后学生会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也以这一单位为骨干。

五月四日北京所发生的这件大事，像风暴似的震动着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各大城市的学生们纷纷起来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讲演，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个同学终于释放了。当时段祺瑞这亲日巨头并未直接执政，虽不愿轻轻放过这些学生，但究不能为所欲为。全国舆论都站在学生方面，亲日派显得孤立了，曹、陆、章三人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里多数官僚政客，一时为爱国心所支配，也或多或少的同情学生。这一切使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的摆布。这样，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残学校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以平民愤。

然而拥有实力和日本支援的亲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们痛恨北大，集中目标攻击蔡元培校长，非迫令去职不可。蔡氏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

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

城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②的组织。这个新兴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

就停顿几天，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

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扬。“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压迫学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惊慌和不满，一部分商店并关闭店门，停止营业，以表示

对学生的同情。各女学校的女学生也都跑到街头游行讲演起来了，城外兵营里一部分士兵也有响应学生的风声。军警当局不得不关闭城门，防止更大混乱。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舆情鼎沸，举国骚然。

颓弱的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午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鼓励了同学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徵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团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的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末我们将更能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

- ① 蔡元培于五月九日留书北大教职员学生，其文曰：“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十一日北大学生又接其自途中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 ②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

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作反抗的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四

个是出席代表大会具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问我：“你这位社会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吗？”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妨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外，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

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决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出来。他们顾虑这样作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孙中山先生莅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合会的

主席，于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

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师说出一段极有份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

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因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治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究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擦了擦头部，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

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定门，乘着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里的小站上搭上火车，悄然南下。

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那时中国内部政局是复杂极了；大体说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直皖两系之争日益加剧。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控制着北京的政权；总统徐世昌则与直系军人暗中结纳以示对抗；关外的张作霖因不满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开始与直系携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国务总理靳云鹏与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的权力之争。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有闲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与七总裁^③之一的岑春煊间的争执；此外广州还有甚么桂系、粤系、滇系等等的明争暗斗。上海是南北和会会场的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军阀进行各式各样政治买卖的中心。这里又是全国舆论的枢纽，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设在这里。因此，各地民众团体的代表和学生代表也都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

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

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一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我们到达上海。我和罗家伦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席上陈述北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致向北京政府抗争。这主张受到国民党人的反对。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和其他国民党的代表们表示：我们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我们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无异于变相的承认它了。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主张，获

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〇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一九二〇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幻想^④，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傖、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胡汉

民和汪精卫这两位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简出，我们只有重要事件商谈时，前往访晤畅谈一番。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与我们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戴季陶爱谈社会主义，有些学者味。朱执信爱谈时事，显得满腹经纶似的。廖仲恺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着欣赏别人的高见。叶楚傖、邵力子代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共事似的。任民国日报总经理的邵力子，为了克服报馆遭遇的各种困难，和筹措经费，老是东奔西跑，忙过不停。任总编辑的叶楚傖，经常过着夜生活，在他那间很小的编辑室里，伏案工作，为文改稿之外，还爱饮酒做诗。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通过全国工商界抗纳捐税的决议，即是叶邵二人的杰作，我们曾予积极支持。

一九二〇年一月的一个中午，我和许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刘清扬同在法租界一间饭馆里便餐，饭后，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许德珩接着说：“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就顺道去看他。”我附和着说：“好呀！我和罗家伦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几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却不在这里。”他们三人同声说，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先去随便谈谈，下次再约罗家伦一道去正式请教。于是，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孙先生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他告诉我们，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许德珩似乎有点生气，高声抗

议：“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候，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步跑出来，将我们欢迎到客厅里，并即上楼去通知孙先生。

不一会，孙先生步到客厅里来了，互相问好之后，许德珩首先少年气盛的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孙先生若无其事的不置答复，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乃说明：“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拜访求教。”孙先生反问我们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这样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四个人一个接一个的说起来了。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批评国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恰当；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要问孙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甚至表示孙先生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于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等等。

孙先生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说出他的意见。他大意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

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们四个人听了这一番话，当然更不服气；同声抗议的表示：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我更进而指出：“今天的问题是为甚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他们三个人又接着以责难式的口吻表示：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我们中甚至有人这样说：“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我也说道：“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我们这样长篇大论连续的说着，似乎使孙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时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时而也点头赞赏，在那里若有所思的静听；仿佛要让我们说个够。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中有人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一直站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

是孙先生以安祥的态度、缓慢的声调回答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仿佛政府负责人在议会中遭受质问，从事答辩。

他的那篇颇长的谈话，大意是指出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孙先生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转变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我于是轻松的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孙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下次再来进一步的请教罢！”孙先生也喜形于色的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于是我们告辞而去。

我们在离开孙先生住宅、赴一个书商晚宴的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孙大元帅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建立今后合作的基础。到了宴会的地点，已是宾客满堂。许德珩和刘清扬这两尊“钢炮”向宾客们自诩刚才“舌战”孙先生的经过。诗人康白情更以轻松的语调刻划出当时谈话的情景。这曾使在座不满国民党的各派人士为之眉飞色舞，洋洋得意；而同座

中国国民党的人士则默默无言，似乎有点沮丧。最后我们一致说这次会谈的结果极为圆满，认为孙先生究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坦诚的大政治家，那时国民党人士才笑逐颜开，其他不满国民党的客人则又顾左右而言他了。

在我们和中山先生谈话后约十天光景，孙先生又约我去单独晤谈。我应约前往。谈了一阵有关时局和学生运动的情况，有一位朱卓文先生来到了。他似乎是负责工人运动的，好像也是孙先生预约来的，经过孙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孙先生的谈锋因而转到另一个问题，他问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我给予肯定的答覆之后，他又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他指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的过去和我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说：“听说你在学生运动中很注意民众运动和工人运动，是吗？”我告诉他，五四运动时只是以“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来组织民众，到了上海之后，才注意调查研究工会的情况。他又阐述他注重工运的道理和事实，并且指着朱卓文说：“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运专家，我们大家可以谈谈。”

于是朱先生说了一些他多年从事工运的经验，并着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这样工人运

动才有方向。我当时也针对国民党注意不及之处指出两点：一是应按产业、职业、和工厂的类别，将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孙先生表示：这些都是要同时进行的要点。之后不久，我们的谈话就告结束了。我和孙先生这两次的晤谈，似乎使他对我颇有印象，在以后几年中，我和他又有过好几次的会晤，他不只一次提起这两次晤谈的往事。

当时我和上海各工会团体都有过一些接触，其中有一个叫作“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这会里的职员我大都认识，其驻会理事黄介民也爱谈社会主义，与我来往比较密切。该会的理事长曹亚伯是老同盟会会员，忙于政治活动，不太过问会务。他们在我和孙先生谈话之后几天，就邀我参加他们的工作。黄介民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全权整理会务，并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他并说明这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应允去试试。于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任命我为总干事。一九二〇年三月初，这工会在法租界法国教堂的广场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人，我就在那次的会上发表了就职的演说。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

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主张而已。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当年四月间，北京的同学们写来几封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形已渐松弛，如果我愿意北返，大致已没有被捕的危险。其实，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和反日运动仍在继续遭受北京政府的压迫。四月十四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一次短时间的总罢课，反抗北京政府的压迫行动。五月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封闭。民众运动和北京政府的对立日趋尖锐化。但另一方面，当年三月中旬，吴佩孚从衡阳提兵北上，直皖两系军阀的冲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许是因为直皖冲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这才无暇去对付闹事的学生。

我检讨我这次南行的经过，北京学生联合会给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做了。我和罗家伦虽然觉得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但我们已竭尽全力尽了责任。

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学们，多半已离开了学校。在上海的几位北大学生代表都已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已结束了他的代表任务，在那里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触，准备不久到美国去。五四运动中的另一个要角，风流诗人康白情虽无代表的任务，也同我们一道活动。他曾上海徐家汇一个花园里举办名震一时的踏青会，参加的青年男女二百多人。他为这种交际弄得有点神魂颠倒，

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许德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最老的一位代表，他虽早已解除代表职务，但仍和我们形影相随，一块热心工作。那时他忙着到各地参观考察，作赴法留学的准备。不久，我们送他搭了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船。此外，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路经上海，都曾和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照理自然应该即时北返。

这些同学们都对我说，我如回到北京，仍会受到黑名单的干扰无法安心念书；不如和他们一道出国留学。但我仍决定重回北大。我认为北京环境对我虽有困难，但求完成北大的学业总还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师友多数仍在北京，我和师友们所共建的学生运动和民众工作的基础，也使我有不忍放弃之感。五月初，我向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辞职，重返母校。

- ① 关于“天津学生联合会”及“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间被地方当局摧残的情形，邓颖超所写《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专辑》第一六二——一七三页）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不过她说那年双十节天津所举行的市民大会仍以要求罢免曹、陆、章等为目的之一，则恐系记忆失实。因曹、陆、章已于是年六月十日经北京政府明令罢免。
-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惨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对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发生冲突，杀死学生多人。日政府因此派军舰到福州，登陆巡行示威。
- ③ 军政府的七总裁是：孙中山、唐绍仪、伍庭芳、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和林葆懌。
- ④ 梁启超曾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对于加富尔推崇备至，并说：“吾不必为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俨然以加富尔自许。

第十章

在北大图书馆中

五四运动后，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开始剧变，这是由于他们身受种种压迫，目睹政府的腐败颓废，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所致。他们开始向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和李大钊先生的接触，似乎也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当时一班有志青年一样，一心企望中国的富强。我的思想向来比较急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向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快步前进。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急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的资料 and 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一九二〇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学们在北大

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无政府主义者是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五一专号”。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

向人高谈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

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〇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

言约在一九二〇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〇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

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②。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我赞成他的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

来共策进行。

当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势更加紧张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都忙于谈论时局的发展，准备应变，北大师友们多数乘着假期纷纷离校。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钊先生向我郑重其事地表示：“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因为他认为在战乱期间，段祺瑞的亲日派将加紧迫害反对他的学生们，我有被捕的危险。我也向他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他留在北京并无关系，因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办法多些。后来他也准备暂时离开北京，要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到海边去避暑并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他暂时回乡，但我不愿同行。我愿到上海避难并和陈先生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我说：“事态发展到现在，为了革命、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今后个人的努力方向，都须从长计议一下，定下一个长期计划。”当时我还年轻，没有自动组织共产党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带头，我一定热诚追随。

李大钊先生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我们分手时，他还向我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

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 ① 李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九一七年三月又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于《甲寅月刊》。接着他分别在《每周评论》、《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是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中研究社会主义较早的一个人。
- ②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基是一位新闻记者。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藏着他的真实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

第 二 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 一 章

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战争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车赴天津，旅客异常拥挤，车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黄昏时才抵达中途的廊坊站。火车进站后即停止前进，站外隐约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旅客们惊惶不安，但都不敢离开车厢。凭窗远眺，只见高与人齐的高粱丛里有少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蠕蠕移动。旅客中的一位军官向我们高声解释，说看来这还只是双方前哨部队的接触，假若前面的铁路没有截断，我们今晚还有到达天津的希望。果然，不久火车继续开行，但沿途时驶时停，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称是国军总司令，以由日本装备起来的边防军为

骨干，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进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得到关外的张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声援，以保定为指挥中枢，向皖系军队展开攻势。战争进行约五日，即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历史上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军阀之后，第一次爆发的内部大规模火拼，也就是北洋军阀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显明标志。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暑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怆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睬甚么戒严禁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达先生谈话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酢频繁。这使陈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事实的笑谈。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

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而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②。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

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惨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

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却是要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陈独秀先生曾这样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产党。我们虽否定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先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

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对于甚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共产党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大体是主张宁缺毋滥。我们认为参加共产党的人不仅要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我们都赞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来；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也必是纯洁的人物。

陈先生最注重如何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虽是边做边学，但不愿见中国共产党竟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第一项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则翻译介绍。其次，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原有的工会不是组织落后，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会；因此我们须从头做起，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再者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急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更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们

觉得可由已觉悟的知识妇女带头发动，广大妇女群众也很快可以组织起来。我们没有谈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产主义实在距离得太远。

陈先生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国民党籍的关系，参加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其余诸人参加上海小组似已无问题。他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

在陈先生看来，上海小组应立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产党月刊》^③，由一位德国留学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为主编。学者型的李季或不会参加中共组织，但会竭力替这一重要刊物工作；又准备出版一个通俗的工人刊物，并物色一些青年到工人中去活动；再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这个团的上海小组预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他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会员只要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为了加深研究和学习，他和上海的发起者们还预备派些青年学生到莫斯科去学习，并与在德、

法、日等国的留学生通信，请他们分头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

在各地发动中共小组的事，陈先生也在加紧筹划和策动。他曾表示：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 展，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大地主沈定一，现正自动大减佃户应缴的租额，加上主办急进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他们三人将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带的组织。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组织发展也应注意。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李汉俊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担任联络武汉的急进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书的老国民党员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说著称的后起青年恽代英等为发起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先生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④，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他说施存统快要到东京去，和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及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事，可由他负责。

我住在陈家的这一段时间内，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而

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即与我同住的李达，那时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社会学学者，每天都忙于写作，没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

我对戴季陶却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时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前楼，和陈先生是近邻，室内陈设简陋，除书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闽南去参观一下，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也许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许认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势力范围。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之游只好俟诸将来，婉谢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与陈先生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却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我们谈话有时大发议论，扯得很远，但大体头绪井然；彼此意见接近，没有隔阂，使我们都有痛快淋漓之感。所以没有形成文件，一方面是自觉这还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设想，说不上精确和周到，另一方

面也觉得没有事先与更多的人详谈，就拟定一些党纲、政纲、章程、要点、工作计划之类，总有点不够民主。

我真诚地支持陈先生的见解和设计，并答应立即回北京发动一切，这是陈先生最高兴的事。我也曾向陈先生强调，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并向陈先生提出，我们虽不采取党魁制，也没有类似党魁的名义，但眼前少不了一个居中策划的人，望他暂时负起此责。他也当仁不让地欣然答允了。

正当我们的谈话大致可告一结束的时候，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几次接触还只是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问题。威金斯基自然会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早日成立，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积极展开活动。他和我谈话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积极筹备的时候，等到他认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致都可以发动组织中共小

组的时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党，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支持。这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陈先生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⑤。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过，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组由一九二〇年五六月间开始集会商谈，经过筹备，直到当年八月下旬正式组成的大体情形。

正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来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访，坦率地告诉他，我住在陈先生家里，准备追随陈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并

请教他的意见。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一九二七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十八年苦力的人，当时也决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

为甚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请读者耐性地读下去，便会有一个分晓。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

- ①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简短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革命的随感录，如《二十世纪俄罗斯新革命》（见《独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版）、《克伦斯基与列宁》（见前书，卷二第三十六页）及《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见前书卷二第六十六页）。当年五月他所主编的《新青年》还发刊了马克思专号（六卷五号）。
- ② 据郭湛波说：“陈生于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初留学于日本，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但他首先反对兴汉灭清的狭隘民族主义，未参加。中途归国，在沪与章秋桐居寿昌里，与张溥泉、谢晓石创办国民日报，主张实行彻底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反对专制。后参柏文蔚之幕，适辛亥革命，随柏氏任安徽教育司长。民国二年，因反袁失败，亡命日本……。”见郭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〇〇页——北平人文书店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据我记忆所及，他初时确是柏文蔚的主任秘书，后来是否兼任或改任安徽省的教育司长，则未可知。
- ③ 《共产党月刊》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创刊，一共出了六期。
- ④ 蔡和森与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间才开始。可能陈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生有所联系，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那时都在法国。我手边现在所有的材料，只有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自法国所发给陈先生的信，以及陈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复信（见《独秀文存》卷下第二九〇页——第三〇一页）。
- ⑤ 后来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的话就正式加入了。

第二章

北京小组的组成

一九二〇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①。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我听了李先生这种肯定的反应后十分高兴，就说：“那末，请根据你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罢！”

第二天李大钊先生表示赞成的信写好了，情词恳切而确定，我们共同签上了名字后寄出，这就是我们组党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献。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

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

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黄凌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学生，也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办了定期刊物《民声周刊》，和发行了一些小册子。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似乎还不大知道俄国共产党压迫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形，故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发表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当李大钊先生邀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点，虽抱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赞成的，因而他们也愿意参加进来。在李大钊先生和我看来，中国革命运动离无产阶级专政还远得很，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不计较这一分歧，共同在一个组织里面携手并进的。

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

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已经出版，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王有德、高崇焕、吴汝明、周达文、刘维汉等。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同学为最多，其中并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次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

期工作主要还是学生会方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会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也是北方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以上。由李大钊先生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会议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形地停顿了。

十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

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

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因而略具雏型。

-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廷“交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会主义明星报》。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党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消声匿迹，再无作为。

第三章

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工作首先在长辛店京汉铁路的工厂里开始，我是这工作的最先发动人。

长辛店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我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的时候，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有些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使我能和他们混得比较亲热，这是一年前的旧事。

一九二〇年九月间，中共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后的两三天，我又来到了长辛店。首先找着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铁路工厂做过工。厂里的职工们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厂里去传教，

因此他的熟人极多。他陪着我到工厂里去找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与我有一面之缘的工人们在休息时围拢来同我交谈，他们以为我又是来宣传爱国的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这次是专程来看看你们，并且问问你们有甚么要我帮忙做的事。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甚么？”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就众口一词的表示：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我说：“如果能找着房子，办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当时那儿的房子很难找，但由于他们的热心，没有几天，武君便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告诉我有一所适当的房子，原为两家工人的住宅，他们愿意让出来，作为办学的用途。

工人们这样热心和他们对于我的信赖，使我大为高兴。我决心去克服经费方面的困难，要将这所学校创办起来，便马上去找朋友李实商量。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为人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个“生活互助团”，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

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音周刊》的发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了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音》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他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教训”，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滚出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有话到那里去说罢！”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

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又不肯随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①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

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

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

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

为什么要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工会”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惧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有一千多工人参加，通过章程，选举职员。一位老工匠王俊当选为俱乐部的主任，他率领着这些参加者在厂内外游行庆祝，情绪非常热烈。这一举动曾使铁路官员们大起恐慌。后来工会正式成立，从此那些穷苦散漫的工人们开创了团结奋斗的途径，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第一个阵地。

① 梁善济，山西人，清末时任资政院民选议员。民国五年旧国会重新集会，梁善济与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时代对政局不无影响。

第四章

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主要仍是导源于中国内部状况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过它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更为深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但他们抱有“到东方去”的坚强意向，在一九二〇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邃，英语说得相当流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况、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以说此行已有良好的开

始。他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革命人物谈得投机。他也和其他俄国革命人物一样，好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也爱与人喋喋不休地辩论，不过态度总是相当谦虚的。

他曾和我们详谈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苏俄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所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政策能趋于一致，就中国这个例子看来，那就首先需要中国有一个革命政府。否则各就其立场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没有甚么矛盾的地方。

他又详谈苏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明共产国际的起源和成立的经过，指出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

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各国后进党的发展。而且他认为他的了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两个问题确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十分关心。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甚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也曾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由现在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乃至八小时；增加工资，争取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契约的权利等等。他不满足于我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我却以为中国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

一般说来，威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小组成立以后就曾在和我们的通信中数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威氏的主张自然赞同；但对于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尚未具体拟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时也没有提出关于大会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意见，这也许是关于中共的党纲和政纲问题，他要向莫斯科请示，不肯自作主张的原故。因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还是在威金斯基离华之后才实际展开的。

第五章

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

自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海小组，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〇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

梅坤等二十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

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①；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②。毛泽东之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③。

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是南北战争的要冲，人民久经战祸，一般青年不仅思想左倾，对于现实政治也较为敏感。在近代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湖南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历史关系养成了湖南人一种倔强奋斗的性格，“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早已为人所共知。那时（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不满北京政府的各派势力的人，都团聚在湖南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旗帜之下，以求避免战乱。毛泽东等这一群左倾青年也支持联省自治，并与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广泛的接触。

在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共产小组以前不久，长沙另一派左倾青年以黄爱、庞人铨为首已经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他们笼统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了解得也不算透彻，但富有实干精神。五四运

动时，各地的活跃青年竞起组织左倾小团体，但各小团体之间不免有门户之见，这在湖南更为显著。黄爱、庞人铨等因受省外同道者号召团结的影响，终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并未完全化除，而且仍在暗中滋长。黄爱、庞人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因发动罢工，被赵恒惕枪杀后，湖南劳工会派与共产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恽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一九二〇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〇年回到成都高等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

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〇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

防在福建南部。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作打回广东的策划。

一九二〇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当时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陈先生合作得很好。陈先生在广州的多次演说和发表的文章都富于吸引力，为广州知识界输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劳动声》周刊，利用教育机构在学生中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开始注意农村中的活动。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运动多半从乡村发动，因而广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的工作。

广东共产小组也和北京小组一样，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一个短时间，不久因意见不合，几个参加共产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去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国民党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人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因此常表不满。他们较之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联合和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外，还多了一项反国民党意识，因此，分裂终于无法避免。

其实，广东共产小组与孙中山派的关系也不算圆满。那时孙中山先生嫡系胡汉民等与陈炯明之间暗中已有意见不合的酝酿，而陈炯明的喉舌《群报》又是由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任编辑，其言论不待说是偏袒陈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份国民党人物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支持陈炯明而与孙中山捣乱。这件事后来也为中共内部一个重大的争论。

以上我所简述的共产主义者在各地的活动，确是中国共产党正式组成前这一阶段中的主要发展。总括的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

主义者，根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之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国民党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

入，却团聚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④，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掩旗息鼓。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

- ① 《湘江评论》周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由毛泽东主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出版到第四期时，即因登载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文字于当年八月中旬为长沙军警所查封，该刊第五期虽经印就，但已无法发行。
- ② 《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创办。由于施存统发表《非孝》一文，以致发生该校校长经子渊去职与学生的“留经”风潮，引起全国的注意。
- 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极大。见《毛泽东自传》第三章。爱德迦·史诺笔录。
-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联络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另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它的组成分子不久为北京共产小组所吸收，至于胡本人则因为他只是一个政客，没有准其加入。

第 六 章

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

(Ma Lin), 这个洋鬼子很骄傲, 很难说话, 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 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 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 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 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 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 与人谈话一言不合, 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 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 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蠢头, 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 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 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 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 但态度雍容, 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 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 现在可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 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 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 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 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 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 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 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 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 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 它

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僵持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天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

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求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

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代表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①，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

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七月一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主的民族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在中国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对的；但惜乎没有说明如何实现的具体步骤。我

当时觉得他的这种批评很有价值，曾请就他所提出的各点拟具一些具体的意见，供大会讨论参考。但他并未这样做，也许他那时也没有确定的主张。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当时还未到达我们手里，只有少数代表从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简略的内容。我们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

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指出，负责起草和审查的同志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订宣言。于是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

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

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

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这样，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是：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

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革命为主，并不能将共产党的社会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当时讨论这项议程，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认为中国应有两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会革命。对于国民党能否担负上述第一次革命的责任，大家颇有疑问，但也认为中国如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将可得到较多的自由。不过共产党人并不以民主共和国为满足，还应继续社会革命，以期实现苏维埃式的政权。至于国共合作从事国民革命，再由国民革命进展到社会革命等等的想法，那时是完全没有的。其他如土地国有、农民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军阀政治等等，都曾代表们提到过。一般代表多以为共产革命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即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现在也尚不能捉摸，因而无法作具体的规定。所以大会除否定李汉俊的改良派思想外，实际政纲就只是上述一些较抽象的要点。

在讨论由我所草拟的党章草案时，李汉俊又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他指出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这种修正意见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支持原有的草案，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

的想法。

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方得成为党员；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按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现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多数代表批评李汉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霾。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和，但他究是

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未列席过大会，但获知大会进行的情形。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兴趣，表示支持多数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请教。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请他出席演说。为便于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当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随之分途散去。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果然，十分钟以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李汉俊开的是甚么会议？开会的人那里去了？那两个外国人是甚么人？这些问题都被李汉俊镇静

地应付过去了。在场的陈公博反而受惊不小。警探们大肆搜查，没有发现甚么可入人罪的证据，始失意而去。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而且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择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参加时下手。

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说的“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这句话，就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这固然由于那时彼此关系不算密切，最主要还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出一些甚么事出来。这次大会并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事，马林也未提到这一点；因而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正式决定的。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吾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

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大约是七月十日清晨^②，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九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王会吾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我们登上了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我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大家都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妇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党员。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大会曾有几项决定：一是工人斗争的纲领，内容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保护女工童工等等；大会认为根据各地实况，由工人群众提出减时、增薪的具体要求，以期由斗争中逐渐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资标准的目的。二是工会组织原则问题；大会指出共产党人不应再因袭旧式行会和“招牌工会”的旧习，应注重新式的产业工会的组织；即每一个企业中的全体工人不分职业和籍贯等区别，均须组织在一个工会的单位里；同一产业中的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某一类产业的总工会。三是中共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各地同志都应到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

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会决定各地组织应在工人群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决定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就可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至于如何使这些工人党员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大会认为那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工人党员的教育工作。

当这一项议题讨论完毕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我们主张第四项议题的选举问题迅速进行。讨论结果，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

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大会要求这三位被选的委员立即就职，从速组成中央，并决定将大会所通过各案原则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也由中央全权处理。

全部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请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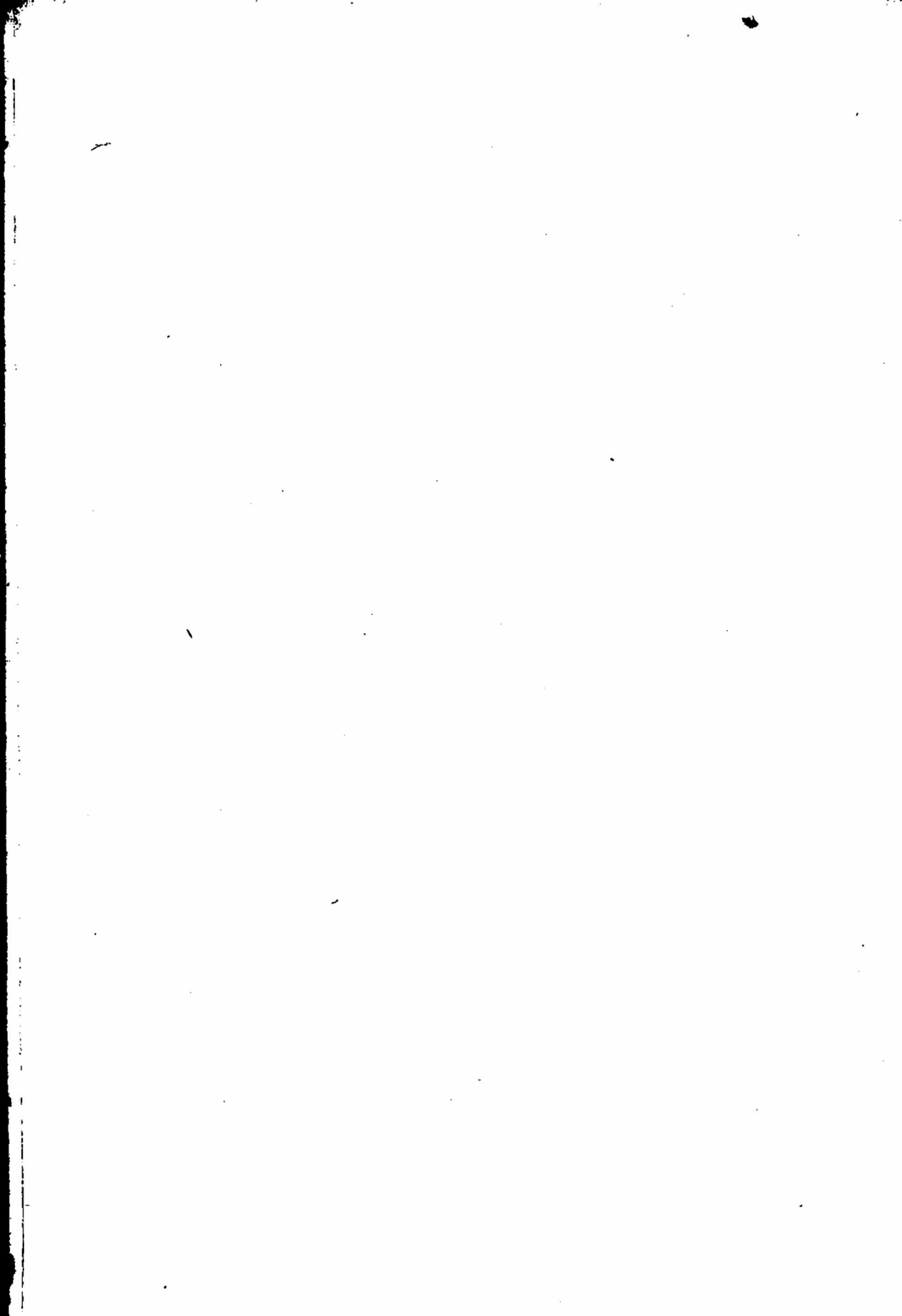
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共的组成，它在中国内部较之以往各政治组织发展得更为顺利和迅速，它一开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现得十分明朗。在国际关系上，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以后，它是亚洲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共产党组织，使共产国际对殖民地的政策得到一个主要的试验场所。这些不能不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一个共产主义的巨影开始在中国踟蹰着^③。反射出这个巨影的人物充满着勇往直前和专心致志的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现在的人看来，还觉得有点神秘。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〇年八月间和我商讨组党的事情时，曾说过下面这样一段话：“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

结中国的旧军阀、滥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陈先生这段话——自然不是专指日本而说的，不过举日本为例罢了——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这班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共同气概。

- ① 陈独秀的四条意见我已不能记忆清楚，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一——四七页）所载中共简明历史称系：“一曰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这四点大致是真实的。
- ② 我所能记忆的尺寸，可能有一天的出入。
- ③ 这是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



第 三 篇

万 事 起 头 难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虽决定了发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却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由于这些实际问题的不易解决，形成中共中央内部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直到陈独秀先生等七人被捕获释之后，我们才深悟团结奋斗的必要时，内部争执也就平息下来。

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已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先生筹集，因大会的开支已所余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的不易，使中央无法要求各地分担所需的费用。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我们分别住在分租来的小房间里，并没有一个可以集中办公的地点，一切也无规可循，都在摸索试探之中。

我们将大会情形及会后新中央所面临的问题函告陈独秀先生，并催促他从速来沪就职。我们不愿因陈独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顿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满后要回日本去继续学业，不可能专心致志于中共中央的工作；李达仍忙于写作，于是在这段期间，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心。

马林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当我和他在李汉俊家里匆匆分别之后，直到会后几天才再见面。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式报告。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所获得的结论，大体都能站稳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更是切实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次的具体贡献。

我们同意采用这个名称之后，又谈到经费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函告陈独秀先生，请他为新中央设法筹集经费，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开展所需经费愈多，以后将何以为继等等。这样，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汉俊间所曾引起的争执。他向我解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当坦然接受。对于这一点，我首次向他表示赞成。接着他又说到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必要，要

求我回去开一次中央会议商讨一下。

我向新中央报告与马林谈话的经过，并以赞成的口吻略加解释。

李达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对那位桀傲不驯的马林仍表不满，对于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与预算这一点，他主张须从长考虑，最好等陈独秀先生来了以后再作决定。周佛海却支持我的意见，表示为了迅速展开工作起见，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据大会的意向，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和预算也是应有的举措。李达也并未坚持他的反对意见。于是决定由我起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提经下次会议讨论决定后，送一份给马林，征求他的同意。

不几天，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和工作计划预算等都由我草拟好了。规定在上海设立总部，除指导全国工运外，并兼办上海区的工运工作，创办一个机关刊物，定名为劳动周刊。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从事工运的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应参加这一项工作，总共预计约三十人须按月领用生活津贴，每人约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这个机构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等每月约需一千零数十元。

这个计划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能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但讨论结果，这个计划还是被采纳了，认为可以据此开始工作，不过暂不作最后决定，将它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并可把这个草案的副

本送交马林。

当我和马林谈到这个计划时，我向他说明，我们开会讨论的经过，并指出书记部的名称算是决定了，计划中的若干细节还有些疑问，准备等陈独秀先生回来之后共同商定，至于经费数额，共产国际不妨决定补助若干，不足的数字仍由我们自己筹措。似乎他以前误会李汉俊所说由共产国际拨一笔经费交中共自由支配，当是一笔庞大的数字，现在看来竟是这样少，支配的方法又是这样节省，使他大感意外，笑了起来，表示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助，我们自己所筹得的钱可作别项用途。

接着，我们三个委员曾与马林举行一次会议，商讨中央全部工作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马林询问李达宣传计划如何展开，大会所决定的要办一个党报的事如何实现。李达扳起了面孔答覆：“没有计划，等陈独秀先生回来再说。”马林听了这句话，马上显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但他也不再问下去，转谈其他问题。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的阴霾因此仍未消除。

七月下旬的一天早下，仍未返回北京的刘仁静带着一个陌生的人来到我的住房，他介绍说：“这是上海总商会的杨主任秘书……”那位杨先生没有等到刘仁静说完，很生气的抢着说：“我要控告周佛海，他犯了骗诱良家女子的大罪。”他手指着一份昨天的上海时事新报，向我说：“请看这篇文章！”我接过一看，这篇文章说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

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等语。杨先生等我看完之后，又提到他初看这篇文章时，还以为与他无关，后来经过查考，才知道那篇文章所指的就是周佛海和他的女儿杨淑慧。因此他觉得他的名誉受了损害，非控告周佛海不可。

与周佛海同住的刘仁静这时才得到机会补充说：“这位杨先生今天一早就到我们那里来了。恰巧周佛海不在家，杨先生找着我谈论这件事，所以领他来，看你有甚么意见？”我看见杨先生盛怒的神情，先安慰他一番，又指出：如果周佛海真已结婚，又瞒着与另一个女子恋爱，那是不对的。不过现在有些青年，家里已有了由父母作主而本人极不满意的旧式妻子，在礼教束缚之下无法离婚，于是在外面谈恋爱，甚至再度结婚的也不少。遇着这种事，做父母的很难处理，我看最好还是约集他们坦白的谈一下，不必采取法律的步骤。杨先生听了我的话就说：“那好，我就去找杨淑慧和周佛海，另约几位亲友，在我家里吃午饭。请张先生和刘先生你们两位一定要到。”

在杨家吃午饭的时候，杨先生还是盛怒未息，可是他的太太似乎并不以杨先生的举动为然，她大概是为女儿的处境着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客人们都不好说甚么。周佛海和那位杨小姐更低着头一声不响。杨太太终于忍不住的向她丈夫说：“你不要再闹了，让我和淑慧单独去谈谈。”说完，就领着她的女儿到另一个房间里密谈去了。不久，她又出来邀周佛海进去参加。他们谈完之后一同出来。杨淑慧毅然向她的父亲和我们宣布：“我是很爱周佛海的，他已

有老婆，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没有告诉过父母。他也是很爱我的，正在进行离婚手续，将来我们是是可以结婚的。”她说完这段话之后，并恳求她的父母予以原谅。我们这些客人听了杨小姐的话，众口一词的表示：既然这样，这件事就很容易解决由你们一家人商谈，用不着我们在场了。

周佛海这段故事，虽只是当时一些青年男女们恋爱纠纷的一个例子，不过对于这位代理中国共产党书记的青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的同志们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我们站在党的立场上，总觉得这种结合影响周佛海的思想 and 行为。就是党外的朋友们也将这件事当作笑谈的资料，这使周佛海不无尴尬之感。

在这种情形之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儿及其家庭的来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急于要同杨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学，并忙于准备结婚的事。他对于党的工作不再积极。在我们以后几次会议中，再也看不见他那种活泼积极的神情，听不见他那种充满热情的论调。他觉得同志们对他的恋爱所采取的态度过于严峻，更加影响了他的心理，由对中共热情的消失，而脱离组织，进而成为抗战时期南京汪政权的要角。这段恋爱看似属于个人生活的小事，回想起来，却也许是他一生事业转变的一个大关键！

当年八月中旬，陈独秀先生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书记。他的到来使我们大为兴

奋。他一见面就向我表示对大会的成就甚感满意，准备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积极地工作起来。可是第二天，当我见着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冷淡了。他说要花点时间料理私事，不愿立即举行中央的会议，也不愿与马林见面。

陈独秀先生改采这种观望考虑的态度是受了李达和周佛海的影响。李达自然向他谈到过马林的作风，或者也提到过不满我对马林的迁就态度，这些事使陈先生大感不快。周佛海原是支持我的，似也因我对他的恋爱采取批评态度而有所改变，至少在陈先生面前并未继续给我以必要的支持。

在陈先生到达上海以前约十天光景，李汉俊离沪到武汉教书去了。在大会以后，他觉得被我们冷淡了，似感不快。李达原希望他留在上海担任某项编辑工作，他也未确切应允，我们曾要求他至少等到陈独秀先生抵沪之后大家会了面再走，他没有接纳我们的提议，就悄悄的动身了。这件事引起同志们的猜测，有的认为他过去与陈先生有过意见的不同，因而故意提前走了；有的认为我在大会中曾批评他的意见，会后又遇事不与他商量，因而生气走了。李达虽然批评过李汉俊的主张，但也觉得我对汉俊不够客气。这些事也许使陈先生觉得我不善于团结同志，在短期内就发生了这许多波折。

另一件引起争执的更重要的事是张太雷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就遵照马林的指派到日本去了。原来莫斯科本拟召开一次远东革命团体的会议^①，后来定名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九二一年八月，美国宣布召开华盛顿会议，邀

请有关各国参加，马林即接到莫斯科召集另一对台会议的紧急指示。他忙着在远东各国找代表去参加。立即派张太雷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选派代表出席。张太雷遵守马林严守秘密的指示，并未向中共中央征求同意，只找代理书记周佛海写了一封介绍信，以便他会见日本方面的同志。周佛海应允了他这个要求，并和李达联名写了介绍文件给施存统，张太雷就拿着这封信动身走了。

这件事使陈独秀先生大为愤怒。他认为马林真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跟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我向陈先生提起，马林曾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名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次克举行，由共产国际日本老社会党片山潜等东方要人具名邀请远东各国的革命团体派代表参加。中国方面，除由他以共产国际名义正式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参加，并希中共中央予以协助外，其余各革命团体概由中共中央代为密邀等等。对此我们也表示赞成，并同意派代表参加。至于张太雷去日本的事，他并未向我说到。我向陈先生建议先问明情况后，再行决定态度。

我立即为张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马林提出质问，马林认为应当派人到日本去联络，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

赞成这个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这样做并没有错。这种答覆自然不能使陈独秀先生满意，他仍认为这是抹煞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证，因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再度陷于僵局。

陈独秀先生几次拒绝了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他指责张太雷擅自服从马林的差遣为不当，他也没有召集中央的会议来从长讨论。他表示让他作一番准备之后，再行开会切实研究。我看见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形，除尽力做些工人运动以外，也不愿多表示意见。

这样拖延了两个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先来看我，说：“李达和周佛海写介绍信要我去东京找施存统，可是他们又暗中写封信邮寄给他，叫他不要理睬我。”他认为如果那位素未谋面的施存统果真不理他，那他在东京的任务就无法达成；而且自身也将因此陷于险境。他接着向我叙述，幸好经他向施存统详细解释后，施反将李、周两人寄的信给他看，并且领他去访问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人，面交了共产国际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们已经答应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我听了他的话，颇为生气，冲口道：“岂有此理，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请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去质问李达和周佛海去！”

恰巧李达和周佛海都在陈独秀先生家里，我辗转找到陈先生处，向李、周二人说：“你们为何写信要施存统不理

会张太雷？你们知道这样做可能发生的后果吗？”陈先生抢着回答说：“是我请他们写的，怎么样？”我又毫不客气的答覆：“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接着说明：马林和张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动的错误，然而我们不应当因此就使张太雷在东京陷入险境，万一因为我们的阻拦使日本没有代表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张太雷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你更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冷笑着回答：“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先生更生气了，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者？”

为了回答陈先生的问题，我索性说了一大篇道理。我说我们的见解总有些矛盾，我们拥护共产国际，也愿接纳它的帮助，却又不愿向它提出工作计划。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我们的顾问，却又不愿他有任何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发展的，所需经费是会随着增加的；如果没有必需的经费，一切将成为空想。党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须无顾虑，才能专心致力于工作。怎见得一个党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他们三人听了，都陷于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说到

在大会中和大会后许多事情都是我经办的，我承认有时性急顾虑不周，但仔细检讨自己，我对李汉俊所采取的态度并未失之过激。即与李达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事论事，并无意气之争。我也不喜欢马林的自大态度，但他是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事业会有帮助。如果我们不过于重视他的态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们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产国际表示他不适宜担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这些问题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从未痛快的发泄过，经过我这次坦率说了出来；陈先生有些感动，他以模棱的口吻说：“这样说来，那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我表示这些大问题不妨慢慢谈，只是张太雷还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见马林，应当如何向他解释一下。陈先生向李、周问起：“你们写给施存统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词的？”李、周二人经此一问觉得很难答覆，都站起来准备告辞了。我只好说：“还是由我先去严嘱太雷，不要向马林提起这封信的事。最好陈先生再约太雷来谈谈。”他们三人对于这个处理办法一致表示接纳。

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吵。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张太雷只知道我们曾经争吵，但不知道其结果反使我们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没有将这封信的事转告马林，也许在他们的谈话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些争执的消息。翌日，马林果然当面向我问到这次争执的内容，我自然不好否认，但也不予确切的答覆：这使他疑窦丛生，颇为不耐。

他一本正经的向我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来？”他又说我在大会中曾得到多数的拥护，工人运动又都是我干起来的，自然具备了领导的条件，已往列宁就曾反对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等。我听了这些话，很为讶异，笑他不懂中国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陈先生间的亲密关系，听一点风声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坦率的告诉他：“绝对不可以。”并解释陈先生具有许多特长，是中共的唯一领导人物；现在我们之间虽有争执，但很快就会获得谅解。我相信陈先生不久将与他晤谈，而且会和他合作得很好。我并表示不愿意他再提起这类的话，如果让旁的同志知道了，又将会节外生枝的。于是马林只好耸耸肩说：“等着瞧罢！”

① 华盛顿会议没有邀请苏俄参加，所以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召集，显是苏俄第一次与列强在太平洋和远东区域所采取的对抗活动。

第二章

被捕、谅解和团结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活象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陈先生住处。已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甚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大汉问：“你找她有甚么事？”我说：“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甚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甚么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查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再经过一番探听，才知道陈先生夫妇和到他家里去的几个客人，都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陈独秀先生夫妇、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从法捕房获释出来。不少客人到陈先生家里去慰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其他的客人陆续走了，只

剩下我们几个同志的时候，陈先生就对我们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甚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并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将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正当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张太雷也来了，转达马林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先生很和气的回答：“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似乎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的对我说：“陈先生真伟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大家只有热情的交流，并无误会存在。他劝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争执的事，一心一意积极做下去好了。我们边走边谈，并在我的住所共进午餐，一直谈得非常起劲。

根据包惠僧所说的情形，那天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四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陈家的前后门，声势汹汹，将陈家所有的人监视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交谈；同时四处搜查，检去了一大包书籍和信件；凡是到陈家的人来一个就逮捕一个，因此他们七个人都先后被捕了。陈先生曾向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抓我的，为甚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的抓去呢？”警探们不由分说，在六时左右就把他们一齐押解到捕房里去，除陈太太被关在女

看守所外，他们六个人都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看守所里。陈先生在监房里向他们说，从搜去的信件内可以证明他是在搅共产党，因此预料他将要被监禁一个时期，他嘱咐他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这样，他虽一时不能出狱，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积极工作，在陈先生坚持他这种主张之下，他们商定如何应付警探的讯问，大家通宵都没有睡。

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似的指出：“看来，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说得到做得到，这是很难得的。这次他的主张大致都是对的；他与我之间毫无芥蒂，只因相处甚密，说话不拘形迹，现在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并要求他们出去之后，应和我和谐地分工合作，共策进行。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当时他们听了陈先生这段话，极为感动，纷纷表示他们一向很敬爱我，愿意推我领头，要陈先生放心，并表示将比以前干得

还要起劲。

幸好这次法捕房还算是马虎，而章程名单之类的东西又没有搜着，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足以构成罪证，而且又都是与法租界无关的；所以捕房认为证据不足，不加深究，经一度讯问后，就把他们开释了。这是法租界捕房继续搜查李汉俊家之后，对我们的第二次威胁。

包惠僧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包是自出席大会以来羁留在上海的湖北代表，向我说，董必武、陈潭秋于大会闭幕后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也应当赶紧回去一同进行工作，并将这里的好消息告诉湖北的同志们。我也曾鼓励他一番。

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周佛海受了这次被捕的刺激，也许杨小姐对他也不无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从此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了。陈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却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其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正式通过后，因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执也告解决，而且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惟一修正之点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低到以二

十五元为最高额。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做了一篇大文章。我们认为原则上共产党人应无报酬的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为最高额，显系当时低级生活水准的需要；但我们仍主张减低到二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

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给全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告。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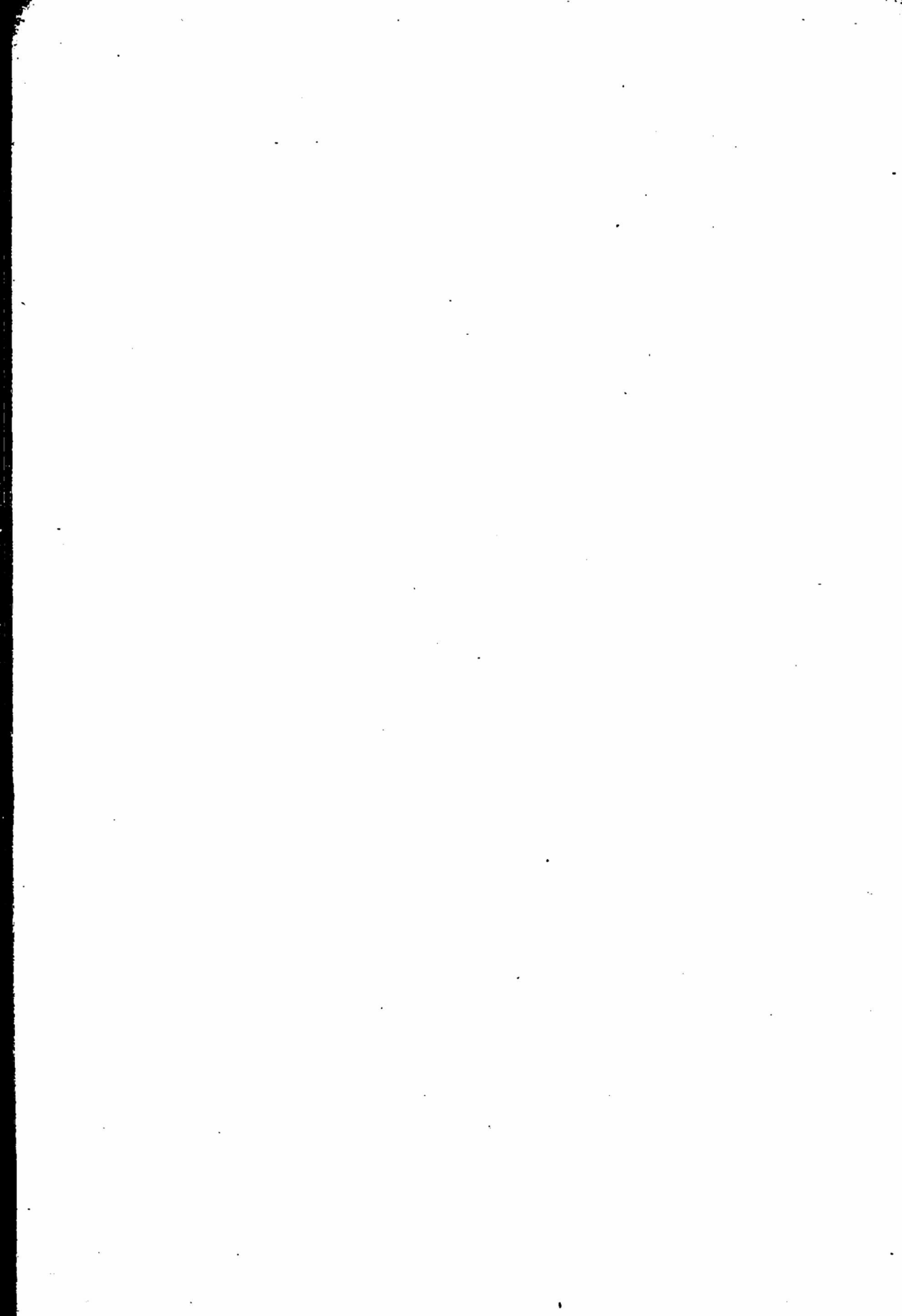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〇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 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第 四 篇

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第一章

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挡一切，准备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共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我们对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因而没有甚么建议。陈独秀先生将旅费付给我，要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

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这一弄堂内住了很多家白俄，他夫妇便杂住在白俄群中，所居是一幢楼上楼下的两层小房子，室内陈设简单，与一般白俄住宅并无分别。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这位

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

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到关外旅行，只觉得愈走愈冷，各房屋的双层玻璃窗，都牢牢关着。我随时留心着各处陌生的情况，发现在南满一带满布着日本的势力，如在奉天旅馆里，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向我这个商人打扮而神情不似商人的过境客攀谈盘问。可是到了哈尔滨以后便不同了。这里原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很多建筑都是俄国型，火车也是俄国式的；铁路上的员工更是俄国人占大多数，无处不留下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这里的大好河山，比之西伯利亚的荒寒，究竟大不相同；这对于我国北方邻人，不管他们怀着一种甚么理想，总是具有诱惑力的。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的中国境内，是一个俄国式的小市镇。商店旅馆等多由俄国人经营。我住定一间俄国旅馆以后，就按照尼科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先找着某某理发店去理发，用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衫，将那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衫袋内，理完发以后，故意将这包东西遗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道上逛了一遍之后，再回到那间理发店去取回这包东西。理发店的老板立即引我到后面的一间房间内，将衬衫交还我，却将名片取去了。我说出所住的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他约我在下午八点钟以后在旅馆中等候。

当晚近九点钟的时候，这位老板来了。他一声不响的替我提着行李，送我到旅馆门前的一辆橇车上。这辆橇车由两匹马拖拉，车上坐着我和老板与一个驾车的，一共三

人。他用很厚的毛毡盖住我的下半身，车子便向中俄边界疾驰而去。经过的地方一片荒凉，没有人家，也没有遇见过边疆的哨兵或任何应有的障碍物。据说，这一带是白俄游击队和走私者活动的地方；那两个俄国人都暗藏着手枪，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袭击。橇车在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雪地上狂奔，颠簸得很厉害。大约午夜左右，走到了离满洲里十八公里的一个车站，这里已经是俄国的辖境了。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两个俄国人的嘴里冒出了浓雾一样的热气，说：“冷吗？现在到了！”在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之后，他们便提着我的行李领我到一节停在车站上的车厢里。

车厢里，已经有十几位中国各团体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和几位日本、朝鲜的代表，先我到达。他们多数都盖着很厚的被毡在睡觉；只有少数几个人尚围着烛光在谈天。他们见了我，都站起来表示欢迎。我举目张望一下，这是一节破旧的三等卧车厢；车窗的玻璃大多没有了，只钉上一层木板，在木板的空隙间结着一串串的冰凌。车内的空气很闷，但还是那么冷。车站上有一两个卫兵在走来走去。车厢内只有一个车侍，他披着破旧的皮外衣，戴着皮帽皮手套，并用旧布层层地裹着脚，满脸长着胡须。他提来一壶开水送给我，似乎想和我谈话，可是言语不通，只好彼此点头一笑。不久，在冷硬的木板卧铺上，他们帮我将被盖打开铺好，互道晚安。我就摆脱了连日旅途的辛劳和怔忡而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我们这些代表们陆续起床之后，不约而同

的在车站上做着各式各样的运动来抵御寒冷。这个车站的建筑很简陋，除了一间站长办公室外，只有一间电报室。车站里驻了一些军队，都像我们一样的住在三等车厢上。我们的活动区域只有这个车站，四望一片雪白，没有树林，也没有一幢房子，更没有卖东西的人。我们吃的饭都是由那些驻军所供给。那些兵士们戴着缀了一个红星的尖帽，穿着黄色的呢大衣，背着长枪，看起来倒很齐整。他们的军队比车站上的员工要吃得好些，有足够的面包，此外还有一些菜汤。我们在此，只有一个不通言语的俄国人照料我们的生活，没有其他的人和我们接谈过。我们的名字，不待说已电告伊尔库次克，并得到了继续前行的许可。

当时，从赤塔方面开到了一个火车头，将我们这一节破旧车厢挂上，便时停时行的向西北前进。偶尔停在一两个车站上，我们也不免从结着冰的玻璃窗向外张望一下；除了三二个旅客上下外，一切都是冷清清的，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这条铁路修建得实在不高明，车行时颠簸如坐小艇；那些用木材架设的临时桥梁，当火车慢慢从上面经过时，发出轧轧的怪响。据车上苏俄人解释，这条路新近草草修通，还不常行车，所以通过时相当危险。

第二天午饭时，好不容易到了赤塔。我们下车后，被送到一幢相当大的房子里面暂住。从外表看去，房子原系一幢很讲究的大厦，但到各层楼的房间一看，发现多数都没有了地板，房间内的设备当然更是一无所有。在少数尚有地板的房中，摆了若干小铁床，供给我们住宿。据一个俄国人说，革命时物资非常缺乏，没有燃料，住客们就将

家具来生火取暖，家具烧完了又将地板撬起来烧。在赤塔的许多房子，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其实内部大都被毁坏了；我们住的这一幢大厦，还是其中比较幸运的。至于少数更幸运的，都已为各机关占住作办公之用。为了招待外宾，他们拨出这幢大厦请我们住，已经是尽了最大力量了。

赤塔那时是远东共和国的首都。从外表看来，内战的破坏似还不算很厉害。通衢上耸立着一些金圆顶的教堂，听不见钟声，也不见有人进出。其余高大一点的房子，都是办公的地点。各条崎岖不平的街道上排列着密密的木屋，这是俄国老百姓住的。商店都关了门，更看不见工厂。街上除了寥寥的行人而外，只有少数的橇车在招揽生意，偶尔也有一二个卖黑市面包的小贩走过。当时在其他各地通行的天文数字的苏俄纸币，在这里却看不见；这里通用的还是帝俄时代的卢布与阿别克。担任招待的俄国人常关照我们，这里情形复杂，且藏有不少中国与日本的侦探；要我们不要在外边多跑，也不要与任何人接触。因此，我们只看到一些表面的情况，无法更深刻的去了解这城市的内容。

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是在一九二〇年四月间成立的。苏俄为了应付鞭长莫及的远东，尤其是日本军队虽经过各国干涉，但尚未退出这一带地区的复杂情势，才建立了这缓冲国。一九二〇年八月间，苏俄派到中国去的优林（Yurin）代表团，就是由这个远东共和国所派出（以接洽商务为名，实际却是促进中俄外交关系的建立）。按照它当时的宣布，它实施一种与苏俄政府有所分别的民主主

义的内政和外交；实际上，正如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访问记所说，它不过是苏俄的一个特别区域而已^①。果然，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日本军最后撤离海参威后，远东共和国因再无存在的必要，便于十一月正式取消了。

过了几天，等到另外一批代表又从满洲里到达之后，我们便搭上了到伊尔库次克的火车。在这条铁路上，车行比较平稳。我们一共四五十个代表，分乘两节车厢。虽然车厢还是像从前一样破旧，可是有了一节餐车，可以到餐车上去走动走动，并享受招待外宾的特别餐。同车的俄国旅客不能进入餐车，他们都是自备面包，车上对他们没有任何供应。我们见那些旅客身上带着不少旅行证件，以备随时检查。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有公务的，普通旅客很少，也有几位女学生，是到西伯利亚西部去学医的。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的自由似乎多了一点。停车时可以随便在车站上走动，行车中也可以在餐车上向车外眺望。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苏俄内战时的破坏情形。沿途，特别是车站附近，可以见到许多破烂的车厢和损坏了的火车头倒在铁道两旁。那些东西有的盖着很厚的雪，有些没有被雪盖住，尚可以看见战时的弹痕及破坏的情形。车站上的货仓不仅空无所有，而且破烂不堪。车站的办公房屋多数都遭损毁，车站旁固然没有在一般车站上常见的大煤堆，即加水的水塔等也大多还没有修复。我们所坐的火车，多数的时候是用湿的木材作为燃料，因此走得很慢，在车站停留的时间也很久。特别是水塔没有修复的车站，要用人力来向车头加水，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火车经过桥梁的

时候，桥的两头照例有兵把守，旅客们不准向外张望。代表中有不懂得这种规定的，有时探头外望，那些守兵便向他们作射击姿势，以示禁止。

这些情景使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不免惊奇。我们这几十个代表中，没有一个能说俄语。俄国人也几乎没有能说中国、日本或朝鲜语的。只有招待我们的那个俄国人，用生疏浅陋的英语，很费力的向我们解释。据他说：这里一带是红军白军数进数出的地方。任何一方撤退时都将火车头、车厢与车站的一切设备尽力的破坏。

列车停留在比较大的车站时，常有俄国人到月台上和我们谈话。代表中经常欢喜问他们：“你是不是共产党？”那也是许多代表所唯一能说的俄国语。他们往往苦笑着答复：“是的。”再说下去，就彼此都茫然了。对我们这种行动，那位负责招待的俄国人再三提出警告：“不要和那些老百姓谈话。”有时，他甚至很生气，将围在我们四周的俄国老百姓逐走。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要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的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明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从前寄居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另一问题；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

野蛮的一句话了。

“要不要盐”，成为我们这些代表的话题。大家认为这是帝俄欺侮中国人的一个象征。帝俄要侵略中国，奖励俄国作家写了很多小说故事，将中国人形容得不像个样子。这种风气流行到俄国一般人民中间，“要不要盐”就成为极普通的一句话了。我们从哈尔滨经满洲里到这些地方，处处都可以看见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满洲里到赤塔一带，原来都是中国的领土，在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后，这一带便变成了俄国的地方。不但如此，它的势力更得寸进尺的向中国东北侵入，大肆蹂躏，这次在哈尔滨还可以看见这种情形。我们所行经的这条铁路，就是当年帝俄为了侵略中国、经营远东而建设的。它事实上既然如此积极进行侵略，当然在精神上也要竭力培养他们老百姓轻视中国人的心理。此时当权的共产政府，是否能够完全去掉这种传统的心理？它们又有甚么方法，来使这些喝醉了酒便拿鞭子打女人的老毛子根本改变对中国人的轻蔑心理？这一点，我们这些景仰苏俄革命的代表们都想考查一番。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褴褛、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讥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当时我们接触的俄国人并不算多，但从招待我们的人员以及餐车侍者等口中常听到“西卡士”（意为即刻到）这一句话。他们口中说的

是“即刻到”，事实上往往要等几个钟头。于是我们也就奉赠他们一个别号：“西卡士”。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我们在火车上过了大约三天，才到达上乌金斯克。火车在这里停了一天，进行很严密的检查。自旅客以至车上职工，都一个个的检查文件和行李；车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搜查过。俄国旅客被检查时，首先要出示旅行证明文件，其次要出示最近几年来的工作证明。如被发现有一点疑问，便加详细盘问。倘若检查人员认为不满意，轻则在证明文件上批以考语，重则随时押领下车。招待我们的俄国人解释，火车即将进入苏俄境内，不得不有严密检查，这些代表也并不例外；除了没有证明文件可供检查外，其余和俄国人一样，每个人的行李都要经过彻底翻查，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要搜查。他们对我们虽然比较有礼貌，可是一些人已经感觉很不舒服，不免对那些检查人员多说上几句“西卡士”。

过了上乌金斯克，不久便到达色林河边。车上又经过一番检查，这才继续西行。越往西走，我们感觉到粮食短缺的情形越加严重。大概在远东共和国尚可以从中国东北输入一些粮食，多少可以弥补；到了苏俄境内，国外的粮食不能进来，而内部又正闹着灾荒，饥饿的人民便受到双重的威胁。火车沿着贝加尔湖蜿蜒前进，经过了许多森林地带和一些很长的隧道，眺望着那一片冰浪银澜、浩无边

际的贝加尔湖，使我们想起了苏武牧羊、大节不屈的悲壮故事，不免触发思古的幽情。照战前的行车速度，由赤塔到伊尔库次克还不要两天的时间，这一次却经过了一个星期之久。

① 该访问记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第二章

在 伊 尔 库 次 克

伊尔库次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远东局，又称伊尔库次克局；这个局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在调查远东的各种情状，联络远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并扩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当时伊尔库次克以东，还是由远东共和国统治着的不安定的地方；这里才是苏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以择定在这里举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〇五年以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

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仑将军所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一个替我们在壁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枝香烟或一块面包，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

领。爪哇代表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 (Semaun)，是印尼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来。菲律宾、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广东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目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

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惟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要兼任一家剧院的跳舞演员，每晚得到大把的纸币，偷偷的去黑市买点面包带回家来。这样，第二天的两餐，才可以勉强吃饱。

我看见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少。

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接着他又解释，好在他们政府的配给制度做得不错，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饱。共产党员领的粮食特别少，这是以身作则的意思。从列宁本人起，都是每天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因此大家没有话说。如果处理得不好，真是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他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园小洋房，内外保卫森严，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精美，有很讲究的丝罗窗帘，和上海大资本家的家庭差不多。这顿晚餐不仅有质地很好的黑面包，而且有点白面包。虽然是一汤一菜，可是内容丰富，味道很好。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这是我踏入苏俄境内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饌。

饭后，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发现我神情中有些惊异，就向我解释：施玛斯基为了郑重招待外宾，所以特别的准备了这顿丰美的晚餐，虽然没有和客人长谈，可是他是很热情的。我说：“你说得太客气了，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算是甚么外宾。”他恐怕我心里还有不满意，接着又表示：革命不能讲平等主义。十

月革命初期，平等主义的观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对于负责的同志住好一点的房子，吃得好一点，都表示反对：甚至将火车的头二等车厢打毁，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车厢打毁一辆便少了一辆，这不是平等主义反损害了革命吗？身负重责的施玛斯基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是应该生活过得好一点才对。我也不客气的对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说：“你说列宁也只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威金斯基听了这段话，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既接触了这许多新的事情，内心当然滋生了无限感慨，而在言谈的表现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对于苏俄的一切情况，却是怀着十分的善意，而从好的方面去了解。伊尔库次克市在西伯利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它那么冷清清静悄悄，满街铺满了厚雪，行人足迹稀少，像乡村一样荒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闭户，自然更没有甚么人交易。屋顶突出的烟囱不见冒烟，似乎屋内空无人居。除了车站和工厂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动外，其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简直不闻人声。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才有一群群穿着油腻褴褛大衣的工作人员，匆忙来去，过了这两度热闹之后，全城又恢复沉寂。

那时，伊尔库次克周围还是很不安静，充满了革命和内战时代的色彩。我所到过的公务人员住宅里，看见房里

都挂着长短枪支和子弹袋。他们经常将这些枪支擦得雪亮，到了夜晚还装上子弹，放在床头或枕下，和衣而睡，真的过着“枕戈待旦”的生活。军事演习更是经常举行，所有持有枪支或被派有职务的人员，无论昼夜，一闻警报，就得飞奔到邻近的街头集合，分别受当地驻军的指挥，举行各种演习。据他们说这里南方就是外蒙古的边境，城市四周都潜伏有残匪。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作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一块花布而已。最精彩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

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跤，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

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

当时的物质条件，确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夹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挽紧，一不小心跌下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我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钟头，居然走了四五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磨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

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要把这些木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

我们住久了，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我说：“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指导着的。

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

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作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呢？”所得

到的答覆大致是：“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第三章

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尔库次克远东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电报，指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们得到这项消息，能离开这个住腻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观光，当然非常高兴。一九二二年初，一辆专车载送我们西行，虽然仍是普通的旧车厢，可是后面挂了一节施玛斯基专用的花车，使这一列车增光不少。而车中又初次出现了蒙古代表团，他们中有穿着大红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着花花绿绿蒙族传统服装的女子。这些人从游牧地带走入新时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国人指导，与我们这些人言语不通，格格不入。这一列驰骋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专车，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个东方民族的陈列馆。

沿途所见到一切现象，使我们感觉到与伊尔库次克以东的情形渐渐不同。沿途各地在内战中的破坏痕迹仍然到处可见，但已稍作整修，车站和工厂的烟囱多数仍依旧没有冒烟，但在克拉斯罗亚尔斯克（Krasnoyarsk）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据说这里的煤矿已开始修复了。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愈往西走愈明显。各车站上的小贩逐渐加多，只是面包、牛奶等食品的价格都是天文数字，而且，他们

显然对纸币不感兴趣，所欢迎的乃是物物交易。过了乌拉山以西到达欧俄境内后，这是当时饥荒较严重的区域，车站上到处麇集着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饥民，纷纷向火车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给予一些面包皮屑，便使他们如获至宝。小贩们最希望能从旅客中换到一些盐或一盒火柴，如愿以偿后便喜形於色，叹为奇遇。我们的专车，就在这种饥荒紊乱的现象中，在俄国人的惊奇羡慕眼光中，在沿途各站仪仗队的军乐与敬礼的口令声中，大约走了九天的时间，到达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莫斯科。

在巍峨雄伟的莫斯科车站，我们受到盛大的欢迎。从国际歌的激昂声调中，我们被拥进了迎宾的大卡车。欢迎的行列是些甚么团体，当时根本来不及注意，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甚么；只能从他们的各种表现上领会主人的一番盛意。只有那位在东方极负盛誉的日本老社会党党魁片山潜所致的欢迎词，予人较深的印象，且因早闻其名，这次见到后就更觉亲切。在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应都比伊尔库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并有香烟、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给。代表们享受着这种特别优待，几乎不相信当时的莫斯科正在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的艰苦状态中。

其实，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从找到适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

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患着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滨”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作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

我们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聋半哑的学生，由那些招待人员带领到各处去参观。其实，与其说是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倒不如说是让各处的俄国人参观我们。我们似乎已成为最新鲜而富有鼓励性的活动宣传模型，因为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现在莫斯科的公众之前，可以象征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已经有了成绩，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历代帝王的陈迹，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种博物馆，和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纪念处所。至于工厂则多数没有复工，学校的秩序也没安定，当时还不足以成为参观的对象。此外，我们有时坐在大剧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厢中欣赏大场面的歌剧，有时出席各种欢迎会并登台讲演，无不受到群众热烈的欢呼。还有一件事令我

感觉到异常亲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是当时东方大学的八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一齐计算在内，约有一百六十余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Zinoviev）宣布开会以后，大会旋即推举列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洛维夫及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Safarov），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为主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大会议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维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二、各国代表报告；三、由沙发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四、宣言。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各国共产党代表莅会发表演说，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等，点缀得全场空气颇为热烈。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办公大厦的门口。

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前见过列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

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再也不易发现了。

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

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觉得列宁的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我们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

但张秋白指出，我向列宁表示“国共两党在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的话是易于引起误会的。他认为国共合作绝无困难；如果说有困难或可能发生困难，这无异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径向列宁表示，会引起他对国民党发生反感。我虽向他解释并无对国民党不信任的意思，我只认为两个不同的政党，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须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发生的困难而已。但他的疑虑仍未破除，后来他将这一点报告孙先生，作为我曾向列宁批评国民党的明证。其实，我的疑虑不特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当时把我这种根据常理就可以推断的话认为是恶意批评，也未免是节外生枝。

在这次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一般发言的旨趣都在确立这原则；不过由于准备尚未充分，还未能进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体计划。在中国方面，国民党和孙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实力的；它所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视为有成功希望。因此，张秋白所代表的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的重视；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季洛维夫和沙发洛夫在发言中都对国民党提出一些批评和希望。张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态，针对他们的批评为国民党作了一

些辩护。这些针锋相对的发言，可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

大会的闭幕式在列宁格勒举行。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正兼任列宁格勒区俄共党部书记，因此有意使远东各国代表与列宁格勒的民众发生一些接触。我们从莫斯科坐着用木材作燃料的专车，花了一日一夜的时间，于二月二日才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即赴列宁格勒的大剧院举行大会闭幕式。会场中挤满了约二千群众，首由季洛维夫发表闭幕演说，接着就是列宁格勒的各机关代表纷致祝词；我们这些远东代表也相继发言，表示对大会成功的贺意，和对首先发动革命的列宁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后宣读了大会宣言。至此，大会就在如雷的掌声中宣告闭幕。

我们在列宁格勒只耽搁了几天，就原车回到莫斯科。我们也曾利用空余的时间，在列宁格勒作了一些走马看花的访问。看来，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们参观了俄皇的冬宫，就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访问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斯摩罗大厦，这是十月革命时俄共指挥暴动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则是列宁格勒苏维埃和俄共的总办事处。

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开始计划秘密回国。大会的文件不仅没有能译成中文，而且根本不能携带，只好让它留在莫斯科的档案室里了。我们是分批起程回国的，几乎每天要送一些同伴上车归去，我自己则在莫斯科卢克斯旅社住了一个短时间，为的是等候回国的适当时机。

这一段时间，我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要人们有过一些接触，知道了一些他们工作的情况。当时俄共的工作人员似乎特别缺乏，许多工作都堆集在一些要人们身上，因此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每次开会往往因等候一二要人的到场而耽误一两个钟头。有一次共产国际的主席团在卢克斯旅社会议厅开会，我被邀去列席。到了原定开会的时间，德国资格最老的女党员蔡特金和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台尔曼、号称“匈牙利列宁”的柏拉昆、日本的片山潜等都陆续到了，会议厅里坐满了人；而担任主席的季洛维夫迄未到来，因而不能开会，大家等得不耐烦，议论纷纷，连那些老头子都说要对迟到的人加以必要的处罚。等了两个多钟头，季洛维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俄国要人才挟着公事包匆匆赶来。大家也不再提起处罚迟到者的话，赶紧言归正传的开会。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议使人在会前就已经感觉疲劳，等到正式开会，自不免匆匆议事，草草了结。

托洛斯基的照片是与列宁的照片到处平排挂着的，一般人说话时也将这两位领袖并称。但我所遇到的俄国要人都对列宁特别推崇，对托洛斯基则只就他的特长加以称许，如说托洛斯基有演说天才、赫赫功勋和英雄气概等。我虽几次遇见托洛斯基，但没有机会与他详谈。有一天我见他在马路上停下车来与正在步行的片山潜拉手为礼，两人就杂在包围的人群中畅谈，表现了他那种无所顾忌的平民化的精神。他没有参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会议，我却不只一次听过他的演说，并曾在一次群众会议主席上与他握手互道敬意。他的演说确是娓娓动听的。当时俄国的风气，

在要人们演说之后，听众还可以即席提出疑问。有一次在托洛斯基演说之后，一个青年登台发言，说他现在还只十七岁，参加过三年红军，在战争中受过五次枪伤，现在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无人照顾；因而他质问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托洛斯基，对他这一种人的问题，有何办法解决。托洛斯基立即对这位青年恳切安慰，但对于这种战后的严重问题，似乎也说不出通盘解决的办法。

斯大林当时担任苏俄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很少人提起他的名字。他虽是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名誉主席，但没有在会场上露过面，我也与他无一面之缘。在开会间，他曾与日本代表有过接触，据说还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发议论。据一位共产国际的要人说，斯大林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神秘人物，素不参加国际活动，这次与日本代表畅谈，表示他心目中的远东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在日本。

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演说。这些长篇演说，除表现苏俄要人们那股宣传鼓动的劲头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获。

和我接触较多的沙发洛夫则是个学者型的人物。据威金斯基说，他是俄共党内出色的东方问题专家，曾担任中亚细亚区党政全权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亚的施玛斯基。但他没有施玛斯基那种官僚气味，很像一个性情古板的教师。他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但与我们这些懂

马克思主义不多的东方代表交谈起来，总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有时还要出言讥讽。

那些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的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他们不仅生活没有规律，对各项工作也缺乏起码的修养。但他们多数为革命胜利而骄傲，充满了一种自信，以为革命既然胜利了，就不难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难。也许这个新兴的政权就是靠这种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着，能够不顾一切的与饥荒及其他数不清的困难进行奋斗。

二月下旬，我为避免人们的注意，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购买了一张三等票，搭上直开赤塔的火车。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在莫斯科领得了九磅质料很坏的黑面包和一些白糖与茶叶，作为我九天旅程的食粮。这份食粮使我每天都在饥饿中，使我因此患了肠胃病。同时老在耽心万一火车不能在九天之内到达赤塔，将不免有“在陈绝粮”之厄了。幸好，这时铁路交通状况已有改进，火车竟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驻着一小队红军的屋子里，等候乘车赴满洲里的适当机会。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这些红军士兵们共同生活。这时在赤塔分配粮食的办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每个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面包（而不是两磅），不过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汤，每十天还可以一尝肉味，这种生活已经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几天后，我便乘车去满洲里，毫无阻碍的通过了中俄边境，转车回到上海，结束了我这四个月的访俄旅行。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会议，它有失败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说过，中国代表目击俄国革命后的各种混乱状况，曾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满。代表们原都是向往于俄国革命的，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证。

俄国的新贵们虽对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颇大的希望，却又把张秋白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俄国的“老布”们看来，是一切罪恶

的代名词。代表中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俄国“老布”们看来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言外颇有不信任的意思。即以我来说，虽是中共的一个创始人，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老布”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虽然也不少，但自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而“无产阶级”这个名称和一般所谓“阶级”观念是相当神秘的。由这种神秘观念的演化便产生了俄国共产党人的自傲，也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许多隔阂。

我们这些中国代表基本上多是赞成武装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组织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措施，但总觉得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倚赖暴力，与中国的革命传统有些不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于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为标榜。中国革命者的观念多在于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推翻了这一批人，又反对那一批人。一场斗争和内战未了，那一斗争和内战又继续起来。这使我们很有反感，认为破坏范围既广且深，无穷无尽，总不能算是好事。

这些问题盘踞在我的心中，一时无法解答。我虽保持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态度，也曾充当过俄国革命的卫道者，但自觉说不出为它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回国以后，我从未发表过有关这方面的讲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

时其他代表回到国内以后，多对俄国情况不说好话，甚至公然发表反对的言论。后来中国职工运动和革命势力发生若干分化，与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对俄国实况发生不良印象这一点大有关系。

虽然如此，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也有它的重大收获。经过这次大会，远东各国的代表与共产国际首脑们的广泛接触，使亚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体的内容。在一般苏俄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看来，共产国际在远东已展开了实际活动，这无异是一帖兴奋剂，尤其战后欧洲各国共产运动叠遭挫折，一时不易有所作为，苏俄本国也陷于岌岌可危的孤立状态中；如果能发动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起来反殖民主义，予各资本主义国家以打击，乃成为扭转共产革命不利形势的一个新希望。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远东各国的革命究竟发生了甚么影响，我不能一一予以确切的说明。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存在。即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

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避免对外。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我觉得在这个新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清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由此出发，多数代表都觉得应该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

“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有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联盟，但没有觉察到它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任务上建立起一个长期性的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中国各政治团体的共同要求，而且须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冀其有成。这个看法的确立，无异奠定了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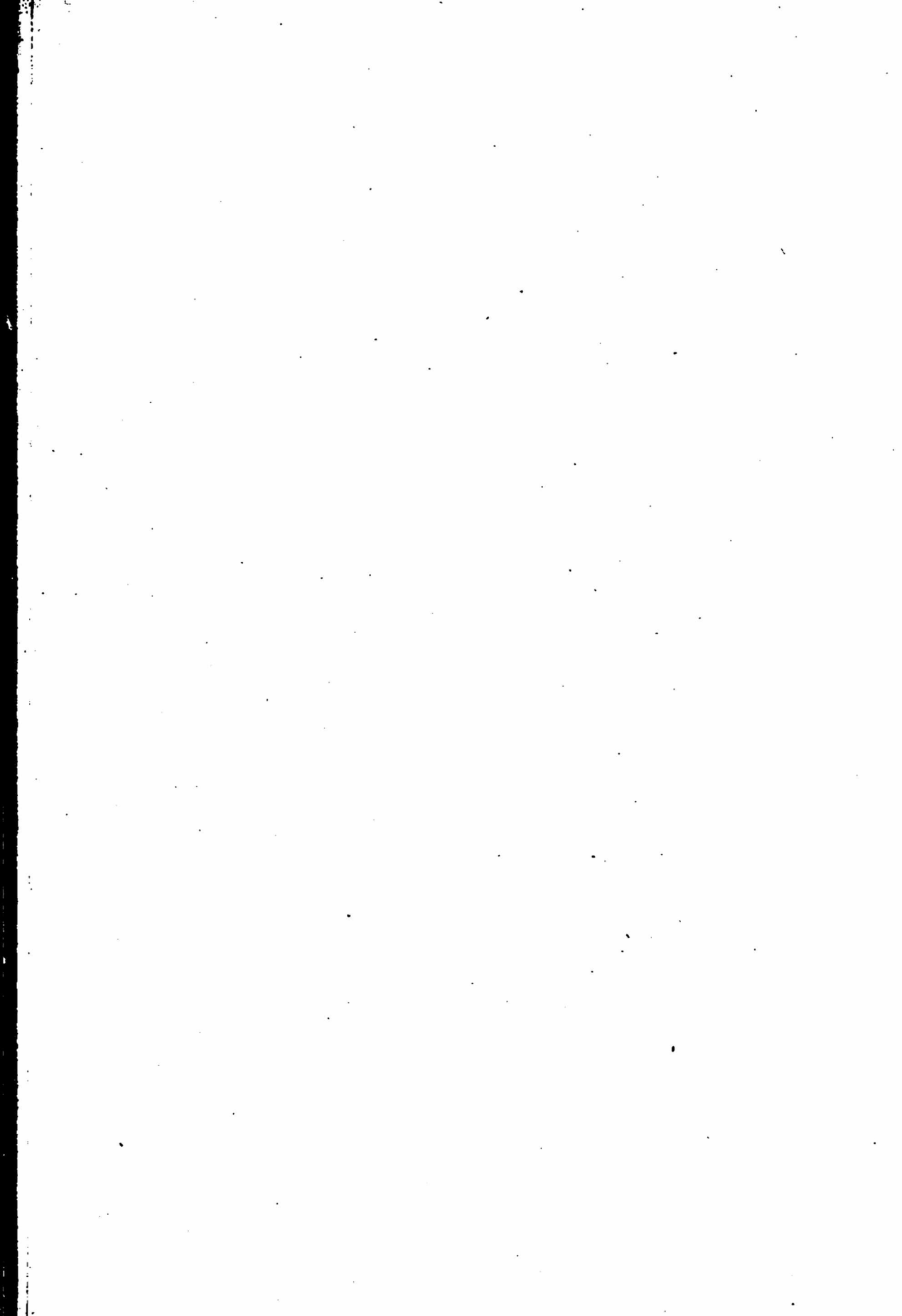
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说的这些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一形成具体的决议，有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各代表也并非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并非是全权性的，如张秋白即曾表示他不能代表孙中山先生接受约束。虽然如此，这些成就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到了中国。

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果所拟具。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国共合作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回国以后，对苏俄情况不满表示，使国民党人觉得苏联新政权与当时国民党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相较，也不过是鲁卫之政；但他对国共合作反帝国主义一点，也作了适当的介绍，使孙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更加注意国共合作的问题。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第五篇

国共合作的开端

第一章

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须向中共中央的同志们报告此行经过，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

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表同意。不过他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他的老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①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后马林颇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

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着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与国民党人士交往多年的陈独秀先生却觉得马林的看法过于乐观，讥讽他对东方与中国所知不多。

那时中共中央和它的党员们都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时没有听说过这种议论，马林离上海前也没有向陈先生提出过这种主张。当时我们所着重讨论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和各派社会主义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我们准备推举德高望重的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居于这一联合战线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够有效而持久。我们估计马林在莫斯科所商谈的也无非如此，不会有甚么重大的变动，因此决定不必等马林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

我们首先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们认为此时举行这个会正合时宜，而且意义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国各工会对香港海员罢工曾一致声援，因而使南北各地工人间关系密切，彼此休戚相关之谊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曾号召各地工会支援这一罢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先行在工会运动中合作，以为初步尝试，似乎较易办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建立各革命党派的民主联合战线，中共必须首先获得代表工人发言的资格。

其次，我们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应同时在广州举行。青年团是中共的另一支柱，团员人数也多于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领导机构。

我们觉得确立青年团的纲领，形成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以统一团员的意志与活动，此事刻不容缓，须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完成。

复次，我们预定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上述两个大会举行之后，即继续举行，以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至于会议地点，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磨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

上述中共中央这些计划，是它准备大踏步前进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上展开活动。这在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共说来，确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中共这个幼龄的小团体试图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脚步就那末快，急奔跃进，任务繁重，斗争艰巨，那有不错误百出，阻碍与挫败俱来之理？

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当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区全体党员会议报告莫斯科之行和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等问

题时，虽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惊奇和疑难都表露出来了。当我遵照中央意旨在同一的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报告时，曾说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主要议程在确定政纲，此后同志们须加深了解政纲内容，一致遵行，并将进行思想训练和严紧纪律等等。那位自命不凡的学者陈望道就因此愤而退席（后来还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个中共党员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想训练。沈雁冰和施存统也对陈望道的意见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次会议也就无结果而散。

我们中没有人设想共产主义会很快在中国实现，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几年准备时间，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壮大自己，它所从事的革命就易于获致水到渠成的圆满结果。他们往往要说：那种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或者说上几句欲速则不达、揠苗助长等类的老话。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有点急不及待，总想在反帝天秤上加上一些中国革命的法码。甚至有人讥讽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不过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职。李达因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终于退出中共，就与上述这些观点大有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中的少数活动人物又参预了一些政治活动，有是有非，急待调整。如在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军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还，不但维持友谊，甚至参预某一种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活动，如好人政府运动等。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如谭平

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政治上与陈炯明甚为接近，而林伯渠则支持孙中山先生反对陈炯明的派系倾向。在湖南的毛泽东，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等等。要划一这些政治步骤也很费力。

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更是纠纷之源，闹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这幕剧开始时，就栽了个大筋斗。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中共的正统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事的确是我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关键。此后我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内部的团结一致，服从多数而尽力执行国共合作这一政策；但我总是难以压抑自己反对这一政策的主张。有时觉得矛盾，有时觉得苦恼，我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现在我追述这些往事，心情还是异常激动，不易平息。但我总是自我约制，认为不激动才能多理解，不必向人申诉，不应自我夸耀，也用不着叹惜和后悔，更不可颠倒是非。我只想根据事实，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人们去研究这一段的历史。

① 据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事年表（载《革命文献》第八辑，一八六页，台北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民国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应社版）记载，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第二章

在广州的会议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这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并负责召集的。负书记部总部主任责任的我，因而为这件事忙碌起来。一九二二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并要求中共各地区委员会协助各工会选派代表出席。同时，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直接与各地工会通讯，征求它们的同意。

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一些主要工会的响应后，乃于四月十二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正式通知。原文如下：

“一、开会宗旨：甲，纪念五一节。乙，联络全国工界感情。丙，讨论改良生活问题。丁，各代表提议事项。

二、每工团派代表一人。

三、时间：自五月一日起，开会五天。

四、地址：广州。

五、川资由各工团自备。在广州之膳宿费，由书记部供给。上海招待处设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号（按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所在地）。”

当时，书记部并未对这次大会的举行作煽动性的宣传，即开会通知亦出之以平淡的措词；主要原因是在避免引起北京政府对各地工会的阻挠。

这次大会的召开，显然是以职工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其背景的。一九二二年是中国职工运动高涨的一年。一般工人在意识上是日渐左倾了，各地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罢工事件也随着显著增加。在这次大会以前，曾发生著名的香港海员罢工，在这次大会以后，罢工的浪潮更为汹涌。直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因遭受武力压迫而告失败。中国职工运动的第一次罢工浪潮才暂告低落。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罢工是那时职工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

中国近代工会运动由海员领先，不是偶然的。一般海员往来于世界各港口，首先受到各国职工运动的影响。再则有一部分海员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更是海员工会能够较早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先生讨袁失败后逃往日本，即在横滨领导一部分中国海员组织了一个“侨海联义社”。一九一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海员公益社”。后来，总社移设于香港，改名为“海员慈善社”。当时孙中山先生重视海员组织，其目的是侧重于海员能为革命运动做运输军火和传递消息的工作。

一九二〇年，香港海员因反对包工制和失业的威胁，发生了组织海员工会的需要。原来海员都是按帮口或同乡

关系，分别寄居在香港各行船馆里；这次就以这些行船馆为单位，联合组织了一个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按法定手续，呈请广州政府和香港政府注册；在获得准许后，乃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一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个名称是由孙中山先生代拟的，招牌也是孙中山先生亲题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开始罢工，就是由这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所领导，罢工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罢工的目的是反抗压迫和要求加薪。由一些在英国轮船上的海员开始，逐渐扩大，后来所有在香港的轮船，不分国籍，都卷入了这次罢工的漩涡。到二月中旬，参加罢工的轮船达一百六十六艘。罢工人数，除海员外，还有码头运输工人的同情罢工，合计约有三万余人。

香港政府于二月一日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向印度、菲律宾、上海等地招募新工来代替罢工工人，但并未能阻止工潮。

罢工后，不少海员陆续返回广州，表示不愿屈服的意向；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援。国民党所领导的广东总工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等组织，热烈地招待他们，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广东省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援他们。各民众团体和舆论机关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大为高涨，同时也使那位过境客马林为之兴奋万状。

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员罢工的，它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更为支持罢工做了许多实际的工

作。原来中国的海员中主要有广东、宁波两帮，这次罢工多系广东籍的海员。在上海的书记部总部就在宁波帮海员中展开活动，要他们与广东帮的海员采一致行动。结果，使香港各轮船公司在上海征募新海员去代替罢工者的计划归于失败。我们还在全国各地工人中募集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在火车上大张“支援香港海员罢工”的旗帜，极具宣传效果；各地工会纷纷函电汇款慰问罢工海员，声势显得相当浩大。这些情形不但使罢工的海员感到兴奋，并且促成了全国工人团结的倾向。

三月四日，当大批罢工工人由香港列队步行回广州到达沙田时，为英军所阻击，因而发生沙田惨案^①，这一惨案无异火上加油，罢工者的愤怒固毋待言；且激起了中国人反英的民族情绪。香港当局鉴于事态严重，乃表示让步。三月六日，宣布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启封，释放被捕的工人，应允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并优恤沙田死难工人。于是，罢工乃于三月八日宣告结束。这种由于工人本身奋斗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职工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一帖有力的兴奋剂。

国民党人士是较早从事职工运动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带的工会主要都由他们领导。不过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多保有行会色彩，有些甚至劳资不分地混合组织在一起，而且会与会之间也极少联系。为了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广州各工会也左倾起来了，觉得有组织广东总工会的必要，并热诚与其他各地的工会实行合作。

湖南总工会是别树一帜的。它的领导人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以工人独立从事经济斗争为标榜。在实际斗争中，曾一度与中共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盛顿会议举行时，它发动过一次劳动群众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及其走狗”等口号。这种举动显然与中共的活动相配合，也与该会派王光辉为代表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事互相关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长沙华实纱厂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罢工，也是由它所领导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用武力将湖南总工会解散，并捕杀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这件事曾引起全国劳工界巨大抗议，多少改变了湖南总工会那种独行其是的旧有观念。

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自从我在长辛店开始工作以后，到一九二二年五一前，已有二十六个主要车站建立了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分工会等初步组织；除东三省外，工人组织遍及各路。京汉路、京绥路、陇海路和粤汉路的武长段等都曾发生多次局部性的罢工。这些铁路工会的组织及其斗争方式都是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这个重要工业城市竭力扩大它的职工运动的阵地。它一反过去的那些“招牌工会”之所为，直接深入到各工厂里面去展开活动；而且在一些纱厂、机器厂、印刷厂、烟草厂等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的组织。它领导过较大规模的纱厂罢工，和长江流域的轮船工人罢工等。它在武汉等城市和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展开在工人中的活动，开始形成各业工会的组织。即在广州和香港工人中，由于

它的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它的声望也在急剧的增加。

在这种全国职工运动趋于团结的形势中，国民党的势力不仅偏处广州一隅；而且它也未适时采取积极的领导步骤。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那种不注重组织，孤立的领导工人从事经济斗争的做法，在这一运动浪潮高涨的时候，特别显得不合时宜。中共和它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却能把握住这一客观形势，实际组织这一次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由此，中共确立了它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这对于中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举行，主要是为建立一个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这不仅要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才能办到，同时工会组织的本身也有甚多实际问题急待解决。陈独秀先生和我乃于四月底赶到了广州，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广州支部的会议。陈独秀先生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劳动和青年两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原系老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一年为陈独秀先生所邀请而参加中共的林伯渠^②，发言支持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其他同志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多数人的发言则对孙中山先生颇有批评，他们大致支持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的排挤。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曾以省政府名义竭力支持香港海员罢工等等。

由于上述这些同志对国民党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次会

议在国共合作一点上并未达到确切的结论。以前陈独秀先生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时，与陈炯明相处无间，此次自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他在做结论的时候，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这次会议就接纳了他的这种提议，因而对国共两党合作这一点，并未与国民党方面恳切商谈。

当时孙、陈冲突已经过长期酝酿，到达了紧张的阶段。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孙先生由上海回到广州，翌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并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成立另一中华民国政府。六月间平定了广西，形成西南对抗北京政府的局面。当时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军事领袖虽宣布不服从北京政府，却标榜联省自治，并不与孙先生的北伐主张相一致。在这个时候，孙、陈间的意见分歧也就显露出来了。孙先生主张以广东作革命根据地，实行北伐。陈炯明则企图盘踞广州以自保。后来，陈炯明并进而主张联省自治、分省建设，显然更与孙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工人群众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以后，按期于是日下午揭幕。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几个工会。这工会的会员总数约计二十万人。代表以来自广东、香港两地的占多数；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廷，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史文彬等。从党派关系来说，以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二人参加。那天，我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报告召集大会的经过以后，即提议推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等五人为主席团^③，由于广东与外省言语的隔阂，能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谭平山始终执行着主席的职务。谭的成名，便是从这次的表现开始的。

全国劳动大会假广东机器总会举行。

那时广东机器总会对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虽表示赞助，但未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于是劳动大会的领导权便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谭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开主持大会的进行，更是大出风头。我则为避免刺激国民党工运人物的情绪，退居幕后，但大会的种种决议多半是由我拟定的。

一般说来，劳动大会的进行相当顺利，成绩也很显著。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所提议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作为工人参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针。对于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要求劳动立法以保障劳工利益”等案。此外，又通过了“工会组织方案”，反对“行会”“帮会”原有陋习对工人组织的影响；主张工人应按照工厂和企业，全体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形成全国产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工会。同时，

每一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各种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再由全国性质的各业总工会和各地的总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总工会。

这次大会认为全国工会组织还不算普遍，组织全国总工会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没有组成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讯处；并负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这一决议标志着中共在全国工运中开始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劳动大会以外，各地工会代表的活动也非常积极。当时广州市国民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对于劳动大会的举行极表欢迎，纷纷举行联欢大会。

劳动大会曾邀请孙中山先生莅会讲演，但他婉词谢绝了。在大会将告结束之际，我曾率领外省工会代表，到观音山总统府去谒见他。他听了我们关于大会进行情形的报告后，除表示欣慰外，只说大会的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决议等。我从他的神情上观察，似有重要的事情急待处理；果然，第二天（五月六日）他就到韶关去处理军事问题了。

香港海员工会经过上次罢工的锻炼，虽同系国民党所领导，与广东机器总会比较起来却大不相同。它显得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急进的年青工会。它的代表也与各地工会的代表相处得很融洽。香港其他的工会代表也很少像广州工会代表那种老爷的派头。他们以海员工会为首，联合邀请外省各工会代表，到香港去与各工会举行联欢。

大会闭幕后，我和各省的代表约三十余人到了香港。

首先我们参加了海员工会所举行的盛大的欢迎筵会，香港各工团代表出席者在五百人以上，会场内外扎着鲜花缤纷的彩牌，在一片爆竹声后，各工会代表相继向我们致欢迎词。我们也相继发表答谢的演说。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的苏兆征那时担任海员工会的总务主任，表现得十分活跃，招待我们尤其周到。此后，各工团联合举行的欢宴大会，情况也同样热烈。

在这些联欢会中，“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入云，事实上也大大增加了香港工人与国内工人的联系。前此，各工会多半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中共在香港工人中那时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就由这次我们访问香港开始，中共的影响初步到达了香港和海外。后来，海员工会也逐渐转到了共产党手中；所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始终能由共产党人主持。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按预定计划结束了。另一个中共所领导的会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开始（大约是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辰那天开幕的）。这年四月廿六日上演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到五月三日，奉军在西路战败，退往关外，直系获得了胜利。为了应付北京政局的变化，我和各工会代表在香港只盘桓了三天，即分别迳行返港。陈独秀先生则仍留在广州，指导青年团大会的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也是中共的预备队。中共的方针是不愿青年团成为与它分庭抗礼的第二党，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的

领导来进行工作。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采取过一些步骤，调整青年团的工作，淘汰一些不稳定的分子；形成了各地区的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定名为干事会。各主要地区的青年团干事会（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于一九二二年初还创办了青年刊物。一九二二年三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为了对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四月四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世界大会这件事，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后来，这个同盟又扩大成为反宗教大同盟，分支组织遍于全国各地。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各地基督教学校曾发生一些开除学生的事件，这就给予青年团学生鼓动的机会，更使这一运动趋于激昂。

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已有了十七个单位。即北京、天津、济南、太原、西安、开封、上海、杭州、南京、芜湖、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广州、福州等地区的组织。这些地区组织的团员人数，多的有二百余人，少的仅十余人；合计起来，总数约两千人。这次有十五个单位派代表出席大会，其中主要的人物为：施存统、高尚德、恽代英、刘昌群等。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团纲和团章两个议案。团纲的要点是：一、政治主张方面：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武力专政，力争工农的普选权，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等等。二、经济斗争方面：维护青年工人利益，改善童工女工生活，十八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

作不得超过六小时，工资平等，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争取每周连续休假三十六小时，废除学徒制，禁止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担任繁重而有危险性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应给假二月，工资照给，改良工厂卫生设备等等。三、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在各地设立青年工人俱乐部，举办讲演会，出版通俗的青年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在青年农民和一般失学青年中进行补习教育和政治教育等等。

团章的要点是：（一）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接受团纲团章，并愿为团服务者，得按规定手续加入青年团为团员；（二）基层组织为小组，设书记一人负责，各地区组织设地区委员会，全国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书记处、经济部、宣传部等；（四）确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五）规定团员须遵守纪律，无故不出席小组会或三月不缴纳团费者，即受除名处分等等。

这次大会并选举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被选为中央书记。后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回到上海，便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构。同时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决定。青年团正式承认受中共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代表一人参加青年团中央的会议，随时予以政策上的指导。青年团中央亦经常派代表一人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陈述青年团方面的意见。青年团各地区委员会亦以同样方式接受中共同级地区委员会的指导。

当时一般同志多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仍应是一个较广泛的青年组织，所以应当仍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原有名

称。到了一九二五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因共产主义教育已有相当成绩，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经过这次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有了确定的政治主张，并规划了注重青年工作的特定工作范围。此后，它在青年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今日注重学习的作风，也就是由那时青年团开其端。但青年团与中共的工作往往纠缠在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也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因而青年团总不免有些与中共发生互相竞争的第二党的倾向。这样，保持青年团独立性和反对第二党倾向两个对立的意见，就成为以后青年团会议的讨论焦点。

陈独秀先生经常参加了这次青年团的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我在离开广州以前，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他在青年团大会结束后，曾应陈炯明之邀，偕同陈公博等前往惠州与之晤谈。陈先生此举的用意似乎是企图从旁劝说孙、陈之间避免火并。但这种活动为时已晚了。他觉得事不可为，很快的率同其他青年团的代表返回上海。

- ① 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报》载，三月四日罢工工人两千余人准备步行回广州，行至九龙附近沙田时，遭英军开枪阻击，死工人三人，伤八人。
- ② 一九一六年我在上海与国民党人士交往时，即与林伯渠相识。他是湖

南的一位国民党要人，为孙中山先生的嫡系。他的胞兄林修梅曾任谭延闿部师长，他本人则和谭延闿竞争湖南地盘的程潜相友善。这次我们会面，他虽已加入中共，但支持孙先生的热诚，往往超过一般纯正的国民党员。

- ③ 关于主席团人选问题，据邓中夏说：“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见邓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六九——七〇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中共原拟定的主席团人选，其中黄、林、谢三人系国民党籍，邓、谭则系中共党员，谢英伯遭受反对后，这一争论就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搁置下来了，实际上就由谭平山一人执行主席的任务。

第三章

从联合战线到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先生和我于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面临着北方政局的变化。奉系势力被驱逐到山海关外，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

这个时期，中国的形势的确有些使人乐观的征象。华盛顿会议主要虽是解决英、美、日等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及限制军备；但其决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协议改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欺凌的途径。奉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实际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是反日爱国的军人吴佩孚等。他们觉得循此发展，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灭亡中国的趋势。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学者如胡适等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励精图治。他们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措施。

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

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主张以废督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友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

当中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华盛顿会议决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道路；外力始终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日本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强共同宰治中国的局面；废督裁兵是不能的，军阀战争和军阀统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

上海的一般同志对好人政府一致讥讽，这也许是上海的环境使人易于看出北京的黑暗面。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上海全体同志会议讨论时，到会者多采取激进的态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成之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

陈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它指出了国民党过去因妥协倾向而失败的种种经过，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并批评一切改良妥

协的倾向；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文件是富于中国情调的。

这个被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谅

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体党员的会议上，我报告中央慎重发布这一对时局主张的意义，到会者都表示拥护。一般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别左倾，他们对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认为中共中央的态度还是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革命的，中共应自为主体，放手大干。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较自由的空气，要求劳动立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具体办法。后来，北方同志们的这些活动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

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時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①，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天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

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慧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

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俟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

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的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一次我们与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

不待说，马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贯彻他的主张。所谓党内小组织问题，恰恰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的主张得以实现。

原来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大会闭幕以后，这个小组仍照常举行会议，以讨论劳工问题为主，但因政治是到会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自也不免涉及。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这一问题；因事来看我的张太雷这次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在商谈一些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之后，刘少奇、袁达时等提到党内讨论政治问题太少，党员不免涣散隔膜，要求仍照大会开会时的情形，每次都讨论一些政治问题。接着就有些同志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使张太雷听了颇为不快。而那些从俄、法回国的同志们，也有点不满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意向，似不免特别加重反对的语气，含有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

张太雷旋即将我们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了陈独秀先生，并向陈先生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中，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即在小组会上讨论，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小组织的倾向。陈独秀先生听了张太雷的报告，一时颇为生气。

但当我为这件事去见陈先生的时候，陈独秀先生没有等我说明，就表示这并无不合之处，值不得再提。他还笑着说，他自己就曾向参加我们的小组的某几个同志，谈论过加入国民党要打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中共党员如果加入国民党，也要履行这种手续，如何能与联合战线的策略，混为一谈。因此，他认为并不是我泄漏机密，动员同志们反对马林，也许是他们听了他这种议论，知道了这事，因关心而自动谈论起来。他说当张太雷向他提到这个问题时，一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表示将再向张太雷解释，以免发生是非。

马林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借题发挥。他约我单独晤谈，并慎重其事的表示，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曾竭力劝他尊重陈独秀先生，现在证明是完全对的，因而他很感激。但我现在的作为却有意无意地有些反陈独秀的倾向，所以他也同样的劝告我。我否认他这种看法。他说到党内因确定政治立场，针对陈公博这类人在作斗争；此外，中共党员中在工作上也有积极与否之分，无形中我被视为积极工作分子的代表，而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却不是的。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意见纷歧的感觉，陈先生虽然收回了他原来对张太

雷所说的话，但当张太雷一提起党内小组织问题时，他就动了感情，这点可为意见分歧的明证。他表示他并非因参加小组的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而有所疑虑；但希望我不再反对举行另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因为他认为这对党的对外政策的决定和消除内部意见，都是有必要的。

李大钊先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认为他和马林都没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共中央便决定在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

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

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決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贊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

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

接着，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宣告党内现在并无小组织之存在，但有过这种倾向，这虽出自爱党的善意，也是不应有的，将来更不应有。这份决议文的突然提出，使会场的气氛突然为之严重。大家沉默了一会，陈独秀先生表现出惊异与尴尬的神情，显然他在事前并未看到这个文件，也没有想到马林竟撇开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无此决议的必要。他指出党内合法的小组会议讨论党内当前的政治问题，即使对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对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小组织的倾向，如果这样认定的话将是压抑党内民主讨论的自由。和我们同持反对意见的高尚德，此时更愤而指斥马林是施展压抑反对意见的手腕。

这就使马林沉不住气，转而向我施其压力。他声色俱厉的表示：从蔡、高两同志的发言看来，证明党内一些年轻初参加中央工作的同志，确有一种左倾反对派的倾向；这是要我负责的，至少我没有帮着纠正这种倾向。他希望我让这个决议顺利通过，但以后可不再提起这件事。我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起而声明，我反对党内有任何小组织的倾向，认为并无这种倾向存在，因而不赞成有这个决议。我开始指斥马林的发言是无礼而且荒谬的。

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

个决议存在，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任的心理等等。陈独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组织的倾向，但认为这个抽象的决议既已提出来了，就让它摆在那里好了。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不愿争执的气氛，和中国人爱尊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借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

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一致的支持，并指导各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內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

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

后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

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四十九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十三日到达上海，这正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

北京、武汉、长沙这三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湖会议的谅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地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

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一个时间，亲自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

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不啻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 ① 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据他自己在自传中（第三十三页，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说，是因为忘记了开会地址，致未出席。至于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

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这一事实，使这两党人士意识到革命运动的一个新动向。联俄使中国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更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问题。但孙中山先生似并不以为国民党改组和少数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会很快的带来甚么奇迹；他主要是在图谋恢复他在广东的地盘，设想到将来如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的动辄遭受挫折。可以说，国共合作解决了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矛盾。孙中山先生经过越飞与苏俄建立关系，又大大促进了国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三个新动向同时并进的酝酿发展时期。

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任为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我在西湖会议后，衔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两天到达。在马林回国以后，驻北京的苏俄代表团留有一个代办，常与李大钊先生保持接触。当时，苏俄的外交代表似不愿与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事；因此，这个代办与李钊先生的来往表面上属于社交性质。这个代办曾与我有一面之识，他急于办交代，因李大钊先生已赴沪，故为我

安排好与越飞会面的时间。

在越飞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约到苏俄代表团办公处与他会晤，由那位代办翻译。初来的越飞对中国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据一张向未读熟的中国要人名单，接二连三的问我，是否认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和部长等要人。我的回答不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往来”。后来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向他说：“对不起，我这个青年，不认识这些大人先生。”

越飞当然很重视他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因此，他的问题都侧重于这方面，他似不愿谈到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事，也不将我当作一个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视作一般名流，这就显得有点外交家的做作，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点青年人的傲慢态度，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视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我心目中总以为苏俄支持中国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个任翻译的代办，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便用俄语向越飞解释，似乎是为我重新介绍，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见解等等。

于是越飞转而问我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他刚才所提出这一连串的人名，实在值得重视，我深以没有与这些腐败而落伍的军阀政客来往而自傲。至于平凡而正常的中国人，我倒认识不少。那些军阀政客们不久将为人民所唾弃而趋于灭亡，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广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着问我，谁能领导中国的革命。我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势力。他又问到孙中山正被迫离开

广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我肯定的向他指出，不久的将来，孙先生一定要重回广东的。而且说孙中山先生是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走向正轨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虽不能确说北洋军阀一定很快就会垮台，但越飞对于我这个远景的看法，似甚感兴趣，因而很高兴的问：“你以为我这个苏俄政府派驻北京的外交使节，会有机会与孙中山先生接触吗？”我直截了当的答覆他：“你不仅可以有这个机，而且还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如错过这个机会，对于一个革命的苏俄使者，是大大的遗憾。”他很有礼貌的向我道谢。

我和越飞这段谈话中，接触到了苏俄政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且已触到问题的中心。苏俄的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一面与现存的政府办外交，另一面又支持要推翻现政府的革命势力。越飞身当其冲，便把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具体表演出来。以后事实所证明的，越飞在中国的具体收获，也就是在与孙中山先生建立关系这一点上。

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要人们都展开了有利于革命工作的活动；而这又是头绪多端的，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引起争执的一面。

马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撮合人。他不仅促成了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这一件事，更奔走于孙中山先生与越飞之间，后来孙、越的见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的。马林在政治上显得有些神秘，他与威金斯基的作风不同，从不将共产

国际的决议交给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们谈起他与孙、越接头的情形。我们只看见他时而北京，时而上海，跑个不停。我们还曾讥笑他，不免放弃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与中共联系的任务，专做上层政治活动。事实上，当时他对于中共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确也渐渐减少。

这时马林有点不可一世，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好像都操在他手里面。他与越飞是最谈得来的。有时他暗示越飞完全支持他的主张，甚至提到越飞比他还更重视国民党，认为它才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力量。孙中山与他相处得也不错，似可遇事商谈。他这个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不像越飞之有公开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动，不受各种外交惯例的约束。但马林究竟不是俄国的公民，也未担任苏俄政府的职务；因而影响苏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弱的。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为其着眼点。这样，他就无法满足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具体要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也不能完全贯彻他的主张；因为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方面，他常遇到反对的意见。后来马林因而弄得满身是非，不能不让位于鲍罗庭了。

陈独秀先生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五十三人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孙即席解释他的联俄容共的新政策，并获得一致的赞成。六月，他指定九个人组织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孙先生又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九人起草委员会所拟订

的改组方案，并推举胡汉民和汪精卫为改组宣言的起草委员。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了第一次的改组宣言。

陈独秀先生过去与国民党人士来往较多，也与他们有过不少争执。他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九委员之一，显系具有促进国共关系的重要意义。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愿对国民党内部问题多表示意见。后来，他又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因而并没有参加改组方案的最后制订工作。

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先生总是处于先知先觉的地位，他那时对联俄容共的政策，主张最为坚决，兴致十分浓厚。但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同他一样，表面上虽然是一片附和，骨子里却有不少的怀疑。国民党中的右倾与左倾思想同时存在，有的惧怕联俄容共，会招致列强的反对，不利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发展；有的认为苏俄既有意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就不应再与北京政府谈甚么外交；有的认为联俄是可以的，容共则颇具危险性。种种疑虑，不一而足。

张继是国民党内当时联俄容共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还带了孙中山先生致越飞的亲笔信，由上海到北京去与越飞晤谈。但他主要是希望苏俄能经由外蒙给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俾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等到他从越飞方面确知他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时，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热心就开始冷淡下来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飞因回国道经上海转赴日本之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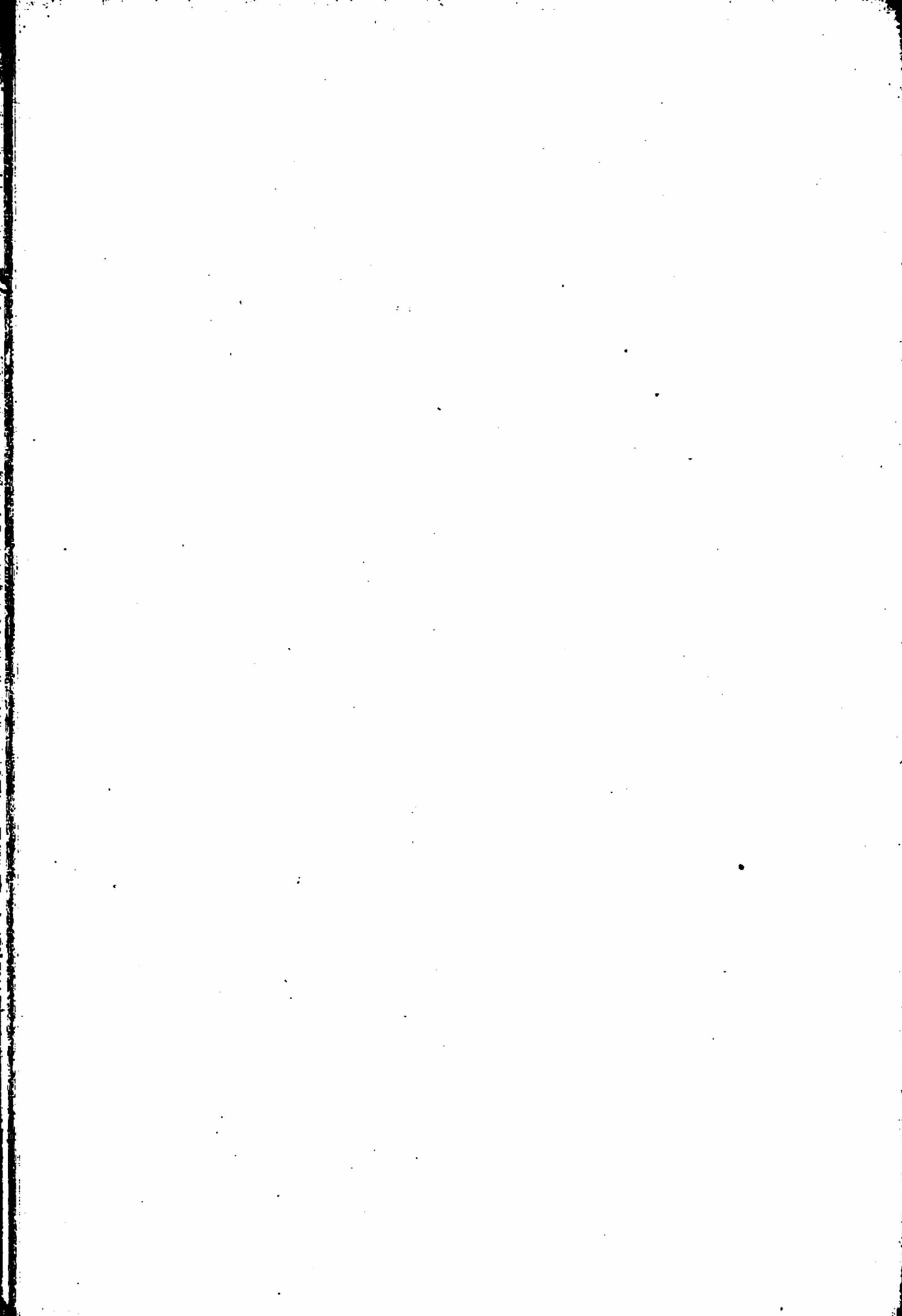
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数度晤谈，结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孙、越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主要确立了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的胜利。越飞同意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并表示完全支持孙先生的革命；这些都是孙先生所衷心欢迎的。广东政局恰在这时发生变动，一月十五日陈炯明退往惠州，通电下野，国民党人士正在兴高采烈地作重返广州的打算。孙、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壮其声势。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当时正忙于指导职工运动，不仅没有参预孙、越的谈判，而且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们在报上读到这篇宣言之后，觉得其中“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措词，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义；而且越飞和马林未得我们同意，径行作这种露骨的表现，也是不应当的。但我们本着关切国民党与苏俄能迅速建立友好关系的心情，对这个宣言只看作是一个具有外交词令的文件，中共本身并不因此受到约束，因而也毋庸表示反对。

这个宣言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平凡，它在中国政局中无异投下一枚炸弹，因为这宣言是由苏俄驻北京的大使与北京政府的反对派领袖所共同发表的，这对北京政府自然是一个威胁。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从此实施联俄政策，而且还坚定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和容共的决心，这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动向。

可是这个不平凡的宣言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分共反共的依据，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祸害。这也许是由于越飞承诺得太多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这也暴露了苏俄对外双重政策的本性——主要是苏俄外交部与共产国际间的不尽一致。苏、国、共的三角关系虽有一个兴奋而愉快的开始，结果却终于翻脸下场。



第 六 篇

国 共 合 作 的 发 展

第一章

二七罢工的失败

中共一直是在遭受压迫和反抗压迫中成长起来的。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旗帜的中共中央，却寄存在上海租界里，租界当局自然不会坐视这枝嫩芽成长起来。它经常给予中共以严重的打击，其压力也随着中共工作的发展而加强起来。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共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这年九月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上海秘密出版。它根据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上海公共租界的捕房严禁这刊物的印刷和发行，虽然这周刊仍不胫而走，销数日增；但中共中央为了这件事，也遭受着不少的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¹。

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又被封闭了，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书记部一直保持着普通工会的面目，表面不带共产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着，由于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员的罢工，后来又负责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通信机关，便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嫉视。我也早觉察到这一点，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譬如书记部的办公处并未存有秘密

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的文字，人员多分散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并聘有英籍律师为书记部的法律顾问。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任书记部秘书的李启汉突然为便衣侦探所诱捕。由英领事主持的会审公廨法庭，根据中国禁止罢工的法律，认定李启汉犯有煽动罢工之罪，处三个月的徒刑，并驱逐出租界；书记部及由书记部所主办的劳动周刊均予封闭。我们的英籍律师只要求减轻处罚，并未根据租界一向准许工会公开存在和允许工人罢工的成规，力为被告洗脱，似未善尽辩护之责。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

当时，吴佩孚却正在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吴氏于战胜奉系以后，即通电宣称保护劳工。由于他这种政策的影响，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带，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中共在北京、武汉和长沙一带的工作，也得着显著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愤恨上海租界当局压迫之余，除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迁之外，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又因陈独秀和刘仁静被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须按期^②赶往莫斯科，中

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些调整。中央当时决定：要我专负中央领导方面的工作，在陈独秀出国期间，代理中央书记的职务；至于我原担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则由邓中夏接替；并指定罗章龙做他的副手，主编《劳动》周刊。从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中共中央政治决策方面；对于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就不是经常直接参预的了。

邓中夏草拟了一个劳动法大纲^③，发动各地工人，轰轰烈烈的进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法和由国会制订劳动法规的运动。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们在北京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希望他草拟的大纲能得国会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后来一部分议员确向国会提出过所谓保护劳工法案；不过这法案终未成立，提案人也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吴佩孚保护劳工的主张，凑凑热闹而已。

但吴佩孚与中共之间在职工运动方面，确有过具体的合作。当时任交通总长的高恩洪是吴氏的亲信，对铁路交通业务却是个生手。他为了排除盘据铁路上的梁士诒交通系的势力，接管铁路财务，以期增加吴佩孚的财源，并要求李大钊给予协助。李大钊鉴于梁士诒交通系素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便欣然应允高的要求，介绍了六个共产党员给交通部，分任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由他们直接推进铁路工会的发展，并考察铁路上的积弊，淘汰旧交通系的职员，以便高恩洪能补进新的人员，来实施对铁路的控制。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

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诒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

中共方面并未警觉到这种演变，北方的中共党员们正为他们的成就而得意。当时，沿着铁路各大站暨各大城市的职工运动，确经历着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各地工会组织和参加工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起来。工会的内部组织也有极大的增强。罢工运动更是风起云涌；而且罢工的工人往往能获得相当的胜利。就在这兴高采烈的时候，开滦矿工的罢工，首先遭受着流血的镇压，就如秋风起后的第一片落叶。

开滦煤矿是中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煤矿，由中国资本创办，逐渐为英商所侵夺；到一九二二年时几乎已成为英商所独占的企业。矿工人数多达五万人（包括临时工）。这个矿区是有名的黑暗世界，工人的待遇的恶劣，包工头剥削的严重，以及鸦片和赌博等等的为害，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盛传着“人不如马”的一句俗话，其意说：死一匹马要损失六十元，一个矿工因公死亡，厂方却只抚恤二十元；而工人伤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这个矿区工会还没有组织完成和缺乏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了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煤矿的工人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二十五日当工人向矿局示威的时候，

遭受由英国兵舰调来的印度兵和直隶警察厅长由天津调来的警察保安队的镇压，中外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工人数人，伤约五十人。矿工工会以及唐山铁路、纱厂、洋灰等工会均遭封闭。工人被禁止集会，罢工领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学院因学生同情罢工也遭到停课的处分。罢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工会无力抵抗这些压迫，同时厂方也表示了轻微的让步^④，遂告结束。

这场罢工震动了新迁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们郑重检讨北方工运发展的前途。我和蔡和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政治内幕消息，认为这是英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着外力的播弄在那里作祟；可以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还不能判定吴佩孚会根本改变他那高唱的保护劳工的政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等则多认为开滦罢工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否则可能冲破压力取得胜利。结果我们决定：不管外力和军阀用甚么严厉的手段对付罢工，我们只有领导工人，再接再厉的来争取组织和罢工的自由。

当时，职工运动除在天津、唐山两地受到当局的干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进行。吴佩孚并无干涉工会活动的任何表示。我们仍按原定计划，积极推进铁路总工会和各地区的工团联合会的工作。各地工会之中以京汉铁路工会组织最为健全，这个工会的主持人得到书记部的支持，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线全路

工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中共中央是很重视这次会议的。我们计划着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其他各铁路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均须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一月间由莫斯科回到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

这次大会的举行，是筹备得较充分的；也有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会方面曾在京津沪汉等地各报刊登开会启事；并函知铁路当局和当地军警各机关。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曾令郑州驻军司令靳云鹗禁止开会。工会获得消息后，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阳，会晤吴佩孚。商谈结果，吴表示总工会虽可成立，但郑州是军事区域，不能任意开会。因此，代表们均相信举行一个总工会成立的仪式，大致是不会受到干涉的。我于二月一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那时京汉铁路十六个分工会，按人数比例所选出来约六十五个代表，和其他各铁路以及武汉和各地工会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总共二百余人均先后到达了。由于到会代表人数之多和代表单位广泛，使这次大会在性质上无异是北方各地工会共同举行的小型劳动大会。其议程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讨论京汉铁路工会的事项。

二月一日，大会假郑州一间大戏院——普乐园——开幕，各代表均按时前往参加。郑州站的铁路工人并列队游行，庆祝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当一部分代表进入会场的时候，郑州警察局长黄殿宸率领一队武装警察占据大会主

席台；同时会场外也有大批军警密布，禁止工人游行，并包围会场和总工会会址。黄殿宸当众宣布奉命严禁开会。我和一些工会领袖们即走上主席台与之理论。这位黄局长平日与一些工人领袖是有来往的，但那时他扳起一副充满杀气的面孔，严厉执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无商量余地。

工会代表又对黄局长说：吴佩孚曾面允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得举行全体大会，要求他让工人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并不正式举行全体大会，以求两全。他仍不许可，并用威胁的口吻宣称，限五分钟内解散，否则将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目击情势紧急，即向各工会领袖建议，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向当时围集在会场里的众多的代表大声解释暂时解散的主张，但会众们叫嚣不服，不肯解散。总工会秘书李震瀛是一个极富热情的共产党青年，愤慨之下，起而高声喊叫：“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黄殿宸跑上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会众大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了这个会场。

这一幕，实际上是工会方面让了步。但黄殿宸似乎深恐工会方面会宣告总工会业已成立，他将无法交差；因而指挥军警，进而解散工人的游行队伍，夺去工人们抬着的一面“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大招牌，捣毁了许多各方面送来的庆贺礼物；并派军警占领总工会会址，禁止出入，这就更激起了工人人们的愤怒。

我们离开大会场以后，愤怒的工会领袖们，分别举行会议，所有代表一致主张应立即罢工，力争工会的组织自由。各地代表以来自武汉的为最多，主张亦最激烈。他们一致议决，要求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总机构移往汉口，并立即罢工；并保证武汉各工会将罢工响应。武汉代表们的这种态度曾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当时，在中国中部，武汉的工会团体算是最有力量的。那里已经有二十八个工会，组织上多数是健全的。在这些单位之上，还有一个全省工团联合会，更是极著声望。国共两党人士对于武汉工运的领导都很积极，彼此合作得很融洽；因此，武汉的工会运动相当蓬勃，并博得一些学生团体、文化团体以及一些记者和律师们的支持。那时，任湖北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天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广东机器工会的老会员，他身材矮小，伶俐而能干；在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作多年，从事工会活动较早，颇为武汉工人们所信赖。他出席这次郑州的会议，主张比到会的共产党员还要激进些。

我当时也认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或可争回一些自由；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工会不能合法存在。我支持罢工的主张，我当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可以使罢工获得胜利。

因而我们决定：第一、京汉铁路于二月四日开始罢工，其他各铁路和各地工会则于京汉路罢工后，再行罢工响应，其罢工日期由京汉路工会看情况演变而决定。第二、京汉铁路总工会即迁移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此次罢工的总枢纽。第三、京汉铁路罢工的

条件是：甲、要求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并查办黄殿宸；乙、要求路局赔偿损失六千元；丙、撤退郑州分工会内的驻军，送回总工会匾额并道歉；丁、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戊、阴历年休假一星期，工资照发。

二月二日，我随同工会的代表坐着路局特挂的两节专车南下，路经信阳、广水等大站的时候，各分工会的负责人，一致表示赞成罢工。到汉口后，在一次中共党员和各工会负责人的集会中，大家认为罢工是可以获得胜利的。同时，北京中共方面和其他各路赞成罢工的消息，也先后传达到了汉口。

二月四日正午，京汉路全线都同时进入了罢工状态，我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办事处在汉口江岸车站秘密成立了。江岸车站是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厂的所在地；成千铁路工人都集居在这工厂附近，成为一个工人村。京汉路江岸分会就设在这个村庄的中间。会所前有一片洼地的大广场，广场中搭了一个大讲台，为工人们举行大会的地点。这里也就是指导这次罢工的场所。

罢工后，湖北督办萧耀南即派遣军队占据了江岸车站，实行破坏罢工。他的参谋长张厚生曾派军警捉去四名火车司机；强迫他们开车。工会的代表向他们交涉，告以开车须有总工会的决定，请其通知北京交通当局或湖北萧督办会同铁路当局派出代表，与总工会谈判，才是正当的解决途径。由于工人方面这种反抗，他就释放了被捉去的四名司机，也停止了由军警强迫开车的举动，并声言将向上级

请示，再行处理。

六日，湖北工团联合会曾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行列并到江岸来慰问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一万多工人群众聚集在江岸分会的大广场上，大家高呼“力争工会组织自由”，湖北工团联合会的发言人当众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纳京汉路工人的要求，否则武汉工人将一致罢工。

工人们这种浩大的声势，使军人们觉得破坏罢工的办法是不易收效的。也许吴佩孚那顽固守旧的军人脑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工人和解这一点。他所想到的只是他命令的尊严，他那里能屈尊派出代表与工人平等谈判呢？现在工人们既然违抗他的命令，那就只有用枪杆子来对付。我们当时并未深切的明瞭这一点，还幻想着吴佩孚多少会顾及到他那保护劳工的主张。

六日傍晚，张厚生派了一个部属来到江岸分会，那人自称是省长公署的参议，向驻在会所里面的工人代表表示，政府方面决与工会代表谈判，来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为明日下午五时，地点即在江岸分会；希望工会方面现在提出代表名单，明日即齐集在这里；湖北省长公署将以调人的地位，偕同交通当局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举行谈判。驻在会所的工人代表即向他表示欢迎谈判。希望能因此早日结束罢工；至于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名单，须由总工会决定，明日开会时当可交出。那位参议的谈话，外表是正常而友好的，并未露出任何破绽。

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这个好消息，立即举行会议讨论。会场中有人作乐观的估计，认为这是由于这次罢工组织得

很健全，对方无法破坏，而且武汉市各业工人都骚动起来了，不日将形成总罢工。北方的消息虽然不知，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动；政府面临这种威胁，不得不让步，因而愿意举行谈判。但我感到一些怀疑。我指出，谈判地点为何竟在江岸分会，其中可能有诈。我提议先行选定谈判代表，但这些代表和其他工会负责人都应暗藏村里，等政府方面的代表果真到达工会，看情形确无其他诡计，我们才能提出名单，我们的代表才能前往出席。我的建议为会议所接纳了，并即按此布署一切。

七日下午五时，我们的谈判代表都齐集在秘密地点，其他的工会负责人则分别隐藏在工人住宅中，江岸分会的会所里，会场布署整齐，由江岸分会秘书项英率领一些工人在那里招待。但到了约五点半钟的时候，枪声稀稀疏疏的响起来了。

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户搜查。我立即下令疏散，显然，所谓谈判是吴佩孚、萧耀南的诱骗诡计，企图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下令：为避免牺牲，所有负责人迅即离村，主要负责人可即前往汉口法租界某茶楼集合。

在枪声愈渐紧密中，工会各负责人分途循小路离村，我在必要事务处理完毕之后，随着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杨德甫最后离开那个秘密会所。杨德甫对于这一带的道路是很熟识的，他在前面带路，我则手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

为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和他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跟着走。我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的地点，有几个武装士兵在那里把守着。杨德甫经过盘问便通过了。我走过去时，两个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

我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急步向汉口进发。我心中百感交集，一面愤恨吴佩孚的残暴，挂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志被枪杀了；一面又觉得幸好多数工人领袖未遭暗算，可能大平均已安全脱险。事后调查，这天共有三十七个工人被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会会长林祥谦。当时共有八十余名工人被捕，其中林祥谦等四人系工会负责人。张厚生勒令他们下复工的命令，为他们所拒绝，就当场被梟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

我和杨德甫步行约十里，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原约定在一间茶楼里会集的朋友们，都已先我们在茶楼门口徘徊着，我们交换消息的结果，知道萧耀南已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搜捕罢工领袖。我们认为只有避到熊秉坤家里较为安全，我们中多数人虽与熊君并无一面之识，但这位仗义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

原来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工程营的熊连长。他那时寄居于法租界一幢小房子里，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识的长清里一〇三号；因为那常是他们的避难所。熊先生是革命元勋，租界当局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这位豪侠的革命家，这时不特毫无畏惧牵连之色，并且还安慰鼓励我们。

我们就利用熊家这间小客厅，立即讨论今后应取的步骤。这客厅临着马路，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马路上警察巡逻的脚步声我们都能清晰听见。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竟是来往不息，老在熊家外面巡逻。

由于事关紧急，我们也管不了这些，只有一心一意的认真讨论，我们的讨论又发展成为一个极大的争论。我首先提出应该立即下令复工，我的主要理由是：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的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甚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我这提议遭到多数在场者的反对。项英热情奔放，反对我的主张。他坚持继续罢工，直到胜利为止。他心目中的革命与罢工是无所谓退却的，宁可遭受更大的压迫和屠杀，不可一遇挫折即行屈服。他指斥我领导不当，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项英心中的愤慨是无法抑制的，但也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我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消息隔绝，江岸既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其他各地是否也有同样情形？如不立即复工，吴佩孚的屠杀是否仍会继续下去？如果继续下去，各地工人是否担当得起？工人在遭到更重的牺牲之后，是否会陷于溃败的状态，乃至被逼上工？

我们这种争论继续了很久的时间，不能得出结论。主人熊先生也热心旁听，有时他从旁说些火上加油的话，认

为革命只有硬拚，无所谓暂时退却，宁可溃败，不可屈服。他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的发言，似更加强了项英等主张的力量。眼见已到夜深三时，我见不能用正常讨论的方法获得结果，只好拿出最后手段来了。

我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要求在场者一致遵行。我并说明下列各点：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要求在场者根据这个命令，不折不扣的去执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

我这样的宣布，少数表示赞成，项英等多数至此也只好表示服从。于是，我们的讨论才转到执行的方法方面去。我草拟了一个复工命令，其中主要的一段说：“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但这个命令的下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我

们与各工会、各工厂的联系已经隔绝了；我们只知道湖北工团联合会已被军警封闭，会所在监视之中，其他各工会的详情就不得而知。我们这些在场者只有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分别到各工会去查明情况，传达这一命令。我自告奋勇，担任一项艰难的任务，前往汉阳去查明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情况，并与那一带的工会觅取联络。杨德甫、项英等担任向京汉铁路工会下达复工命令，陈天等则负责将这项命令通知武汉各工会（当时武汉各工会原定八日或九日总罢工，而且有些工厂已在半罢工状态中，因此，陈天等须去取消原有罢工的命令，要求工人们一律照常上工）。工团联合会秘书林育南在我们的秘密办事处居中策应，并以迅速方法，将复工命令通知北方各地和各铁路工会。

我在晨光熹微中，急行至龙王渡，乘渡船，过汉水，约七点钟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厂的工会，同设在汉阳龟山下一所庙宇式的大房子里；那时，那里情形安静，毫无异状。工会里住了约十几位工会职员，有些还高卧未起。我忙叫醒他们，问他们是否知道江岸发生惨案的详情。他们说已经听说了一些，正准备遵照工团联合会的命令，一致罢工响应。前昨两日人们因参加示威游行，事实上已未上工。

我当即宣布：“军警可能立即来封闭工会，用屠杀江岸工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们。昨晚湖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举起见，命令你们今日照常上工。现在你们应做几件事：一、立即分途通知在汉阳的工会和各厂工人，照常上工；二、立即将工会文件分别收藏或焚毁，

特别是会员名单和职员名单，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三、所有职员立即离开会所；四、工会少数公开露面的负责人，暂时藏匿起来，到确知没有被捕危险的时候才可去工厂复工；五、另行设立秘密联络地点，由工团联合会派人前来联系……”我一面解释，一面催促他们赶快执行，他们也忙着照办。

等到这些事大致办妥，工会职员已大多离开会所，把风的工人跑来告诉我们，军队从武昌渡过了江，正向工会包围前进，快要围拢。我和工会的会长从工会的后门出去，转入一条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观望，只见一连的武装部队，由一个捧着戒严令牌的士兵前导，士兵们拿着绳索和大刀，正包围着会所，摘下工会的招牌，占领了工会，幸好此时工会只剩下一所空房子，让他们扑了一个空。站在我身边的工会会长催我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区域，他紧紧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对我赶来通知的谢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的一个秘密处所的时候，林育南正在草拟有关这次罢工的文件；其他负责传达复工命令的朋友们也先后回来报告消息。他们所到过的工会都遭受了军警的摧残，情况和汉阳工会所遭遇类似。由于我们的行动都比军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使我们觉得昨晚所作的决定是有必要的。项英也改变了他那执拗的态度向我说：幸好我们的复工命令下达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场和昨天一样的灾难。原来当时复工的消息很快的传到了江岸，到七时上工的时候，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

向厂里，遵令上工。其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用捉拿工人的办法，强迫复工，声言：“如有违抗或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后来经路局高级职员说明工会已下复工命令，并劝阻军队不必横加干涉，因而军队的野蛮行动，才告停止。由于路局职员的协助，复工命令也沿着京汉铁路向北挨站传达过去了。

工会方面虽作了这样急促的退却，但萧耀南的压迫仍是继续不已。他派军队占领了武汉所有的工会，封闭了素来同情工人罢工、国民党人士所主办的汉口真报，下令通缉其职员。他不理会工会正在协同恢复工厂秩序，照旧通缉和捉拿工人领袖以及和工会有关的人物。当时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师为最著名。施洋原系国民党员，在中共成立后，又加入中共为党员。他从未参予党的秘密工作，专以律师的身份为穷苦人民作辩护，乐此不倦。一九二二年间，他又任各工会的义务法律顾问。他活跃而能干，武汉法庭中常能听见他那义正词严的雄辩。他在社会上的声誉日隆，也更成为官厅的眼中钉。就在军队向江岸工人开刀的七日下午，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被捕，并于二月十五日未经审判，即遭枪决。他的死使我十分悲痛，使我忆起了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我们间许多次交往的旧事。

在萧耀南压迫的紧急状态中，武汉的中共组织开会也是十分危险的。我无法与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会晤，只能约集项英、林育南和汉阳铁厂工会秘书许白昊等中共党员商讨今后所应取的步骤。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罢工虽已停止，但反对吴佩孚的斗争却正在开始。目

前我们应广泛揭发吴佩孚等军阀的罪恶，以引起国人的共鸣。我们详细计划加强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厂中组织秘密的工会和工厂小组。我们估计多数工会领袖大致没有被捕的危险，但工会负责人被工厂开除，因而失业的将为数甚多，急须设法妥为救助。经过这样一些的安排，我决定赶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机会，与津浦路工会浦口分会会长王荷波等策划工会秘密存在的办法。浦口分会是当时铁路工会中没有受到摧残的唯一单位；这也许因为浦口不是吴佩孚的势力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线北上，于十二日到达北京。

是时，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区，也同样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下。长辛店铁路工会于六日深夜为军警所封闭，捕去职员十一名；七日晨又有大队军警向工人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居民数人，重伤三十余人。其余各地工会均遭查封，职员被拘捕。信阳分工会执行委员胡传道因拒绝军警强迫开车的命令，竟被断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以及工人俱乐部等亦遭封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办的《劳动》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发行。北京城内并有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

中共中央面临着这一严重打击，虽曾发动一个反吴佩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宣传运动，甚至有些国会议员也曾向国会提出查办这一压迫工会的案件。但这种反抗的力

量究竟太小了，并不能抑制吴佩孚等军阀的为所欲为。由此，我们中共的领袖们更认识到工人罢工并不能抵抗军阀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军阀的武力。对于国民党在广州扩大革命的地盘与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当时职工运动是中共的主要本钱。在我们研讨二七罢工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实况时，我们觉得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仅仅湖南方面因地处南北之冲，提倡联省自治的赵恒惕依违于南北之间，而且在他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后，因遭到物议而有所顾忌；他或许不愿也不敢对工会作过分的压迫。因此，湖南的工会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时也不能有大的作为。我们指示湖南的同志们应严加戒备，尽量使那里的工会不遭受到同样的摧残。除此以外，其他各地都只有从事于秘密工会的组织。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如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于遭受军阀们的暗算。我们决定中央机构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便加强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当中共中央根据我所作的二七罢工的报告，研讨领导方面的得失时，陈独秀先生于痛惜这次失败之余，在发言中曾表示这样的疑问：我们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的屠杀？马林却表示完全支持我在这次罢工中的领导，他认为这次争取自由的罢工是无法抑制，而且是应当积极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杀之后，实行迅速退却，也是应当采取的正

确步骤。就在马林这种称许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领导是适当的。

马林还进而提议，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时，应派我去莫斯科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他认为：中共已迅速长成起来了，它能将大量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能发动争取自由的罢工，又能作适当的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凡此都证明中共的领导日趋成熟，中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前途。这些实情，应让共产国际了解。马林这个提议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了。

在旧历年刚过不几天(约在二月二十日)，我冒着严冬的风雪，从满洲里的旧路，很顺利的再度越过了苏俄的边境。这正是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下，进行恢复经济秩序而获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列宁曾很兴奋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说明苏俄通货膨胀已成过去，现在政府已积有二百万卢布的储备金。我经过西伯利亚时所目击的情形，也证明比前大有改进，火车已能准时开行；物质虽仍感缺乏，但物价大体已告稳定；生产也正在恢复之中。

我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二七罢工的实况。但我的报告似并未如马林所预料的受到应有的重视。失败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本是人之情；这在共产国际也不能例外。不久以前，陈独秀先生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也未能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这与陈独秀先生讲话爱老实实在，不愿夸张一点似有关系。我的讲话也与陈先生有同样的格调，不愿就

此后发展的远景作过分乐观的描述。何况共产国际那时并无人预料到中国革命大规模的发展就会在最近的将来降临。一般人只不过想到中共是在那里切实工作，已在斗争中有所表现而已。

而且当时共产国际正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在忙碌着。我到莫斯科后的几天，共产国际即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西欧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和苏俄问题。由于西欧工人多数是在社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是很热烈的；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所谓苏俄问题，是因当时联共党内有三十三个高级负责人所组成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联名控告联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拉狄克代表联共中央答辩，向扩大会议声明：联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条的错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它已领导革命获得胜利，而且目前情况已日渐好转，这就证明反对派的控告是不应当的。拉狄克这个声明，多少反映出苏俄当时的实况。我也曾向扩大会议就中国问题发言；主要是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但未引起讨论，似仅是这次大会议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星期，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草拟了一个如何在中国各地组织秘密工会的办法，其内容却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们已采取过的步骤。它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答应为二七受难工人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募集一笔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

不久，情况还显得不很稳定，故未加讨论。我这次赴苏的任务，至此告一结束，又匆匆的回国了。

- ① 《向导》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刷中或在贩卖中），即处罚印刷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 ③ 劳动法大纲全文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 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

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诒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

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

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领导的错误”、“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

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①

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齐爆发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马林已赴广州，中共中央的人员也正在陆续前往。我于六月初赶到广州，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体均已就绪。

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

丽的房子里。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房子里的布置美仑美奂，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

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我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草定的。他向我解释这训令的主要内含，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训令中只是附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俾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解释，认为依照他的解释，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马林对于我的反对意见立即发生强烈反应。他隐瞒着在莫斯科的讨论经过，不提在莫斯科已有过的争论。他在中国工作已有两年，自以为已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高压手段。他认为反对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训令。这样，我与马林之间，就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在大会举行以前就在热烈的进行着；为了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曾使大会推延了一个多星期。争论的主要之点大致如下：

第一、我声言赞成国民革命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事实上，当职工运动遭受二七罢工的失败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正在激荡上涨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曾发生收回旅大日本租借地的反日运动。四月间，津浦路临城土匪劫车，一些外国旅客被掳，外人盛倡共管中国铁路的论调，曾激起反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运动。五月初，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残杀中国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货运动。凡此一切，都是明证。我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有其急切的需要，并能形成广大的革命势力。

我进而声称，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这即是说，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职工运动，现虽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仍有其本身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马林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认为国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务，就几乎包括一切，事实上也能包括一切，剩下的只

有中共的阶级教育。如果在国民革命之外，再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放松国民革命。

第二、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是脆弱的。他讥笑我：“你的职工运动那里去了？早被吴佩孚几条枪杆子打垮了！”他断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共的存在不特是没有意义，反会在国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调的破坏者。

马林这种论调使我大为愤怒。我指控他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历次的决议^②。我声言，中共的长成与发展是值得骄傲和满意的。它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的爬起来，它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它经过较长期的艰苦奋斗，终将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更彻底的胜利。

第三、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比印尼的回教联盟要高明得多。他盛赞孙中山先生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认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深通马克思主义的人。三民主义是完全可以接纳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工人阶级中的优秀者，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甚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

马林这种对国民党的过高的估计，曾遇到陈独秀先生

的反对，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点。我便指出马林只看见国民党的光明面，没有看见它的黑暗面。我依据一九二〇年我参加上海中华工业协会工作的经验，指出国民党分子流品复杂，缺乏组织和纪律，并说国民党如不认真改组，大量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也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第四、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实际问题，是我们争论得最激烈的部分。我指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甚么中共的独立呢？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些共产党人都涌进到国民党里去，要求分派一项实际工作，他们会说：“这些身家不清白的人是来干甚么的？是帮闲，是小偷，还是抢劫？”至少会被人认为是来挤掉那些老国民党的地位。这样，名为国共合作，事势的演变，将是国共交恶。

我认为，国共两个不同的政党为了同一的国民革命，应更加紧联合起来，须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实际工作；但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我这个看法又是马林所不能接受的。

第五、关于中共保留对国民党政治批评自由一点，马林表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

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那就要是富于建设性的才行。我则表示中共党员为了国共间良好的合作，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尤其要避免不必要的指责和攻击。但一个共产党员经常要保持他那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外固应如此，即在国民党内工作，也不可随声附和，丧失他共产党人的原来面目。至于中共中央及其各级领导机关，在政治批评方面不应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和有所顾虑。这一点双方意见出入虽然不大，但马林仍旧是不满意的。

第六、关于职工运动，我坚持它是中共所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但不能领导其成为国民党的职工运动。中共将在工人群众中大量吸收党员，发展中共的组织；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职工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职工运动。马林在这点上又坚决反对我的意见。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左翼。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我指斥他的主张是将“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硬要将中共已经领导起来的职工运动奉送给并不一定愿意接受的国民党。

从上述的这些争论之点看来，我与马林确是站在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的政治立场上。马林指斥我仍保留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这一基本政策。我则指斥他

犯了右倾取消主义的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使之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这不仅忽视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有害于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

在这次争论之中，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个是支持马林的。他们在代表中展开活动，宣传马林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宜违抗这训令。瞿秋白还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统治，因而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这也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主要内含。我不同意瞿秋白这种说法，也与他展开争论。我认为中国主要受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制度已在没落之中，阶级分化日渐显明，因而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含是反帝国主义，但对内而言，除反封建外，则有工人阶级反中外资产阶级的主要因素在内。

陈独秀先生对于这种纷争觉得苦恼而左右为难。他大体上采取了李大钊先生在西湖会议中的调和立场；但他保持着作最后裁定的家长姿态。他从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

职工运动经过二七罢工的失败，一时不易复振，这也证明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因而国民革命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左翼。他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相信马林会歪曲共产国际的训令；他也支持瞿秋白那种中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为主要内含的说法。但他也觉得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不同意马林对于国民党那种过高的估计。他还以多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工作后，将引起两党间许多纠纷为忧；因而他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只对马的解释作些轻微的修正。

经过互相协商互相让步的结果，我们间意见的距离虽然缩短了一些，但主要之点还是无法弥缝。陈独秀先生提议：西湖会议只决定，少数个别共产党员根据中央的决定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应进而决定，全体党员均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但一部分共产党员可不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负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应兼任国民党的职务，以免混淆中共的独立面目。同时，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起见，中共应帮助国民党增加工农党员，发展其在工农群众中的组织。马林对于陈先生的这种意见表示赞成。但我则表示只同意陈先生建议的前一部分，不同意他的后一部分。这样，这个案子就只有待第三次大会作最后的解决了。

这项争论成为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题。大会于六月中旬举行，共有十七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③，代表党员约四百余人。大会开幕后，首先由陈独秀先生作报告。

他的报告内容，是中共中央一年来工作的经过和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他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

在讨论陈独秀先生这个报告的时候，激烈的辩论便正式展开了。我在上面所述的具体的分歧点都一一被提出来了。支持陈独秀先生发言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不承认中国有显明的阶级分化，他认为反帝反封建都是全民性质的，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陈、瞿当时这种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论调，引起了不少代表们的不满。

我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反对陈、瞿这种论调的主要发言者。我的发言是概括性的。我说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不多，但精干而有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我强调中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中共在现阶段中虽以国民革命为其奋斗的主要目标，但不能因此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共——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蔡和森的发言是陈述中共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的重要性。他引证共产国际已有的决议；不能因加入国民党，就牺牲这些原则性的立场。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上述这些争论之点，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

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中共第一个著名的农民运动者彭湃，于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就在广东的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农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他的工作已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海陆丰那时正在陈炯明的统治之下，一切消息不易外传，他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视。陈独秀先生和中共广东区区委虽曾鼓励彭湃这种活动，但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未提到这项农民运动，而且还慨叹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

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东这种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旁门左道，此地暂不论及。但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这个辩论继续近一个星期，马林终于亲自出马参加辩论了。他向大会发言，表示支持陈独秀先生的报告，强调他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原有主张。他指责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他素来瞧不起农民，

对农民问题更是只字不提。他最后用威吓式的口吻说：陈先生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

当时陈先生和我都曾企图经过协商以获得谅解，但这些努力终告失败。最后在结束这一辩论时，即以我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交付表决。这个修正案是就未获得谅解的部分而提出的，其内容大致是：一、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须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并在工人中发展中共的组织；二、中共在职工运动中须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和工会中的国民党员，密切合作。但工人中的中共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三、工人运动既是中共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中共虽不能阻碍国民党在工人中的活动和工人加入国民党，但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这个修正案付表决的结果，是八票对八票，于是担任主席的陈独秀的一票，起了决定的作用，换句话说，我的修正案被一票的多数所否决而宣告失败了。这个修正案的被否决，等于通过陈独秀先生的提案：中共应在工农群众中（尤其是农民为最），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当时，我们这些反对者认为，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无关宏旨的，因为中共在农民中尚无实力存在，至于在工人中无限制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就等于放弃了中共的主要阵地，这也等于取消了中共的独立存在的基础。

马林的主张终于胜利了，但他也知道这主要还是得力

于陈独秀先生的支持,而且也觉得这种胜利是不够稳定的。他加强压力,大肆宣传我反对陈独秀先生的领导,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和破坏党内的团结,应当予以严重的惩戒。

同时按照共产国际的成规,持反对意见的人须向大会表明态度。我们这些反对者表示出来的态度,却不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支持我修正案的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继之而起的蔡和森则仅沉重的说了一句话:“服从多数的决定”。我则向大会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由于反对者所表示的态度程度不同,以及我强调保留原有意见,使一切攻击都集于我的一身。马林声言,我的保留意见意味着我仍将发表反对言论,将会引起党内纠纷,非予以制裁不可。

这时候,一位来自哈尔滨代表东三省中共组织的代表陈为人起而发言。他声称他投票赞成陈独秀的原提案,是表示对陈所领导的中央的信任,但并不赞成因加入国民党政策而牺牲中共独立的观点,也不相信陈先生会这样做。他诚恳的号召党的团结,要求陈尊重反对者的意见,他特别说到我不特不应当受处罚,而且此后仍应负责领导工作。这位一直没有卷入争辩漩涡的陈为人发言态度非常诚恳,当即转变了会场的空气,使陈独秀先生觉得须适可而止。这样,马林的高压政策便无法施展了。

中共内部第一次意见分歧的大风浪过去之后,大会旋即恢复了平静,继续讨论其他的问题。值得特别说到的是陈独秀先生还提出一个党团问题的提案,主张中共党员加

入国民党内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陈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文的原意，似是要表示一下他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安慰一下我们这些反对者。其实代表们受着这场争论的震动，心情都有些不安，因而大会气氛也有些无精打彩，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也就一致通过了。但后来它却成为国共纠纷的一个主题。

最后大会所通过的宣言，系表示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之领袖地位，并希望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来。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各项革命工作都是国民党工作的一部分”，这些马林所说过的很响亮的话，在宣言里并没有提到，这也是顾到党内的团结的结果。

中共中央改选的结果，我以落选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仍任书记，蔡仍任宣传，毛泽东则接替我任组织部长。

后来中共的记载多宣告我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开除了中央委员，这些记载多不免有些似是而非^④。我自信我上面所述是合乎当时真相的。现在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尚在人间者，除我以外，似只剩下毛泽东一人，如果他愿意保持历史的真相，他当不会否认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在中共历史的发展上，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西湖会议不过决定中共少数人加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才进而采取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全面合作的政

策。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历史家们往往着重描述这次大会的重要性，企图多方面证明共产国际领导的正确。

其实，这个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看，都不能说是恰当的。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

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共采取加入国民党，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

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的说他人错了，都是机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但后来似受着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是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性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国民党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兴趣的，只是

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点，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国民党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国民党工作，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国民党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民党时，多对国民党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国民党去，那里会做安分守己的“小媳妇”？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

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① 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一一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就曾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 ③ 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十七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十七人。
- ④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九页及第十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华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四十五页，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记载。

第三章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于是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的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

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的主张的正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恢复了已往的和谐。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边四十几位同志极大多数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中的主张，也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李大钊先生虽然在政见上与我略有不同，

但对我仍十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换意见，他告诉我，国共两党都希望他在北方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他已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策划进行的方针。我表示赞成他这样做；认为他是国共合作的一位适当主角。我自己则致力于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进行倒也顺手。

在北京按期举行的党员大会，每次仍为了国共合作问题而争辩不休。到会者有的表示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有的强调中共的独立，不愿做国民党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易的。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我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在北京的苏俄人员似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妇俩对我显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略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中国，道经北京前往广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约，与我一度晤谈。我当时并不知鲍罗庭为何许人，负有何种任务。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

几天，还未与中国朋友接触，对中国现况也不了解，愿即往广州看看南方的情况；希望我告诉他一些中国的情形。

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似乎特别高兴。当我谈到中国军阀是一群并无国家观念的自私之徒的时候，他表示不赞成。他虽未加证明，但说中国军阀之中，也有不少爱国者。他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苏俄一部分外交人员的意见。他给予我的印象，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谁知这位并未引起我特别注意的鲍罗庭，后来却在中国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们从这次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他是在八月间加拉罕来到北京以后，经孙中山先生的函请，由加拉罕派往广东工作的。他初去广州的时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义。只因他与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才成为苏俄共党和政府驻广州的代表，并兼任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来中国，道经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样约我在斯雷拍克家单独晤谈。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马林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已经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会中的发言内容；并声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的作法，要他来听取我的意见。

当他知道了我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政见分歧的情况下，仍极力维护团结的种种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他向我坦率的说，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内有些人有点怀疑我有反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他滔滔不绝的劝我不要反对这一政策。接着他又说明共产国

际并不赞成马林那种看轻中共的态度。共产国际所以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决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他并说到我主张中共负责人员不兼任国民党职务，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所称许的，认为马林打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我听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心中如释重负。但我仍向他询问，共产国际为何放弃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原定主张，改采国共在组织上混合为一的路线；在我看来，混合为一，不免引起党内分歧。他说加入国民党，正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方式。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分子。

最后，他认为由于马林的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释上是不恰当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央未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也避免了加深党内分歧的行动。他说他将即往上海，不动声色的纠正中共中央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对中央的表示，以期此后工作能够圆满进行。

就在这个基础上，我和威金斯基之间，获得了谅解。我告诉他，我此后的态度，也将决之于中央的动向；只要这种偏差能够获得纠正，党内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只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陈述，不能向中共任何个别党员提及。但因当时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声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别对我透露这些意见，使我知道他代表共产国际在力图补救，以免再起波澜。

共产国际的动向已在改变中这件事，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党员大会上，又爆发了一次国共关系的大争论。十一月间的北京党员大会上，李大钊先生报告：中国国民党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北京有六个代表出席，其中三人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他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前往出席。北京国民党党部也快要办选举了，他希望同志们对这件重要的事采取积极的态度。

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和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覆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有人还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这句不很客气的话，把素不生气的李大钊先生气坏了。他怒容满面的说：“这如何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他说完后，即气愤愤的走出会场。

我目击这种情形，只好挺身起来劝阻李先生，并登台发表演说。这是我在第三次大会后，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言。

我首先陈述西湖会议和第三次大会中我坚持过的主

张，指出我所最反对的是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我表示相信共产国际不会接受马林的意见，相信共产国际只是着重国民革命，希望中共成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能发生推进的作用。

其次我声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自然颇不妥当。这是我自始即表示怀疑，到现在同志们还是不赞成，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说加入了国民党，或者充当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中，依然可以坚持他本身的立场。国民党也不会要求中共党员放弃中共党籍。广州的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仍负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责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其次，我指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又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为了党的团结起见，我们不应持根本反对的态度。中共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将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此外，中共仍应保持它本身的独立，在工农中发展组织和工作，尤其不应牺牲它在职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最后，我说明李守常先生是我们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我们应赞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现出中共党员的气概。在国民党推选代表的运动中，同志们也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民党人协商，共同推出候选人。

我的这篇调解歧见、号召团结的讲话，似乎颇使听众

感动。他们都聚精会神的倾听，没有一人提出质问。李大钊先生继起发言。他对我的说话表示欣慰。他宣称照我现在所说，党内事实上没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他说中共首先主张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召集代表大会，实行改组；事到临头我们又不去参加，这是说不过去。他也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接纳我们修正意见是失策的，因而引起了同志们误解加入国民党政策的目的，他希望这一点很快的能获得纠正。最后，他还表示他并不怪同志们对他的责难；只希望党内歧见能够消除，步调能够一致。他愿勉为一个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即使劳怨再多些，他也不会离开同志们。

接着，何孟雄起立发言。他是中共北京区区委委员，一向反对李大钊先生的主张最力。他表示从我的报告中获得了前此所未尽知的资料，因而提议这个问题先交由区委会讨论，再行提出党员大会公决，大家没有异议，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不几天，举行另一次党员大会。北京区委会提出一个经缜密研究的、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议草案，交由大会讨论，经过一些辩论和解释，终于通过。其内容大体是根据我前次的讲话作成，此举不仅消除了北京地区同志间的歧见，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甚至其他各地的中共党员，也受到了这个决议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的观望态度。

这时候，中国国民党组织在北京的发展，表现着令人乐观的气象。这与当时时局的发展，也大有关系。直系曹

锬、吴佩孚等所支配的北京政局，愈来愈不像样。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他们撵走了总统黎元洪，十月五日曹锬购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十月十日曹就总统职并公布宪法。这幕丑剧不仅使直系的废督、裁兵、好人政府等悦耳的名词立时破产，而贿选一幕臭名四溢，使国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自这年三月一日在广州组设大本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锬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锬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

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色式的革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颇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前此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义。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国民党组织应选举三个代表出席，我被推为候选人。我

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守常先生极力主张我去出席。他认为这样对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们两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讨解决。其他的中共同志们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主张。

我初意想辞谢代表的任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铁路工人方面。这时各铁路工会的秘密小组正在发展之中，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举行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如果我到广州去，将耽误这一工作的进行。再则我不愿担任国民党方面的职务，我主张北京的中共组织应推选一位将来能担任国民党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但我的这些理由未为同志们所接受。一致表决了我为候选人。

十二月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国民党选举大会，到会者近两千人，全场挤得水泄不通，我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称许我这次能够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陈独秀先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我当场辞谢了这个指派，我说，我将不能等待国民党

代表大会的终结，就要先行赶回北京，并说我不适宜于代表中央，因为我仍不赞成多数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的这一作法。陈独秀先生未置可否，随便谈了些别的事情。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天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谈话处”^①。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我当即起而发问：“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孙先生听了我的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伦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本看法。可是

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

那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藹，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多数同志都附和鲍罗庭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先生也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进一步表示意见，那无异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而采取单独行动了。

接着，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鲍

罗庭所草拟的国民党党章草案，无异是各国共产党党章的“译本”，其中根据民主集中制所拟订的中央和各级机构的职权、党员应守的纪律等等，无一不与共产党的原则相同。我指出这些原则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国民党的党章应有较大限度的民主。国民党一向是松懈惯了的，忽然之间要受到这样严格的约束，会妨害国民党的广泛发展和引起麻烦。对于跨党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异自我束缚。因此，我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党员除应遵守国民革命的政纲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这样，跨党的共产党员才能立足。

鲍罗庭对于我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他不多表示意见，有时只耸耸肩不说甚么。他曾轻描淡写的说：“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

当时中共一些同志们对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十分兴奋，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我曾问谭平山：他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他的答覆充满了乐观。他说他已担任了这个职务两个多月，并未发生困难，他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使我只有在两个办法中间择一而行。一是不顾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张，那便可能遭受中共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二是为保全共产党员态度的一致，不如早点离开广州，去主持铁路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样虽不无闪

避之嫌，但我终究能保留一贯主张，以待机会。中同志们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无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条路，因而我在大会没有开幕以前，就开始准备北返了。

当时我虽然意态消沉，但仍照常参加各种宴会。开会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孙中山先生往往要发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他以迟缓而沉重的语调，讲解他对大会的希望。在我所能记忆的他所说的要点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轻视革命党的作用，力言当时“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种主张的非是，证明此后应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国民党，本革命的三民主义，完成革命与建国的任务。他这些话常使在座听众大为感动。

孙先生在演说中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作比较的时候，说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但其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却失败了。他说俄国现行的新经济政策，与太平天国所实行的天朝田亩制是相类似的。俄国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末，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是最恰当的了。当他论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他总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一个部分。但他否定阶级斗争之说，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并无阶级的显明分别。

他所以着重说到这些问题，用意很明显，是想将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但我从旁观察，他的说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有些在座的国民党人物，对于共产党员能够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一点，抱有怀疑。至

于在座的共产党代表们，对于他批评俄国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各种说法，则表示不安。当国民党人对孙先生这样的论点鼓掌欢迎的时候，我从未见有任何共产党人表示附和。

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一月十五日举行，因筹备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开幕。开幕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任主席并致开幕词，旋即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五人为主席团。

第二天继续开会，由胡汉民任主席，讨论大会进行的程序问题。在这次的大会中，两个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毛泽东与李立三发言最多。我却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据我的观察，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他们两人，似乎有“那里来的这两个年轻陌生人？意见何如此之多？”的疑问，少数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散会后，汪精卫曾走过来向我说：“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而且彼此意见常有出入。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的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毛泽东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次交锋。

当天晚上，在鲍罗庭家里的一次集会上，我们讨论如何使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言趋于一致的问题。讨论完结后，我即向在座的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鲍罗庭等人提出

我先行北返的意向，理由是看来大会一时不易结束，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我应赶往主持。我的提议为他们所接受了。由于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于是我托谭平山和李大钊分别向孙中山先生和大会主席团代为请假。

孙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离开广州，便约我晤谈。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时，在西濠酒店夜宴后，晤谈即在大厅中举行。我向他报告我发动铁路工人组织和参加二七罢工的经过，罢工失败后，经过许多艰苦，铁路工人的秘密组织才渐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日（即当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的。孙中山先生也不问我对大会有何意见，便欣然表示赞成；并说去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比出席这次大会还更重要而迫切，应当从速赶往，至于彼此见面交换意见，此后还有很多机会。于是我们握手道别，谁知这竟是我与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的面谈。

孙先生知道我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极力加以弥缝。就在这天的深夜，他派亲信送给我一封信并附了二千银元，托我捐给铁路总工会，祝贺这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功，并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二十三日我离开了广州。我这次来去匆匆，人们也许可以看出我的处境和情绪，也许可以看出中共内部的烦恼，而国共关系发展的大势，也许可以从这里反映了一些出来。

① “谈话处”即番摊馆和鸦片馆，为军人包烟、包赌筹饷的所在。

第四章

国共初期的纠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以一个新的政纲来团结革命势力，是令人鼓舞的；但也是甚难达成目的。国共两党离奇的结合关系，实是中国前途上的一个大暗礁，也是一切纠纷的焦点。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离开广州；路经上海时，曾将我在广州所发现的问题告知陈独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国共组织混合，一些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内的要职，在我看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要求国共两党在民主的基础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在广州无法贯彻我的主张，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陈先生对我的说法并没有否定；他似采取“等着瞧”的态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志们申述，但我不愿再引起争论，所以措词比较和缓。我着重说因国民党代表大会一时不能结束，又因列宁逝世须停会三天，所以我为了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必须提早北返。北京的同志们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意我向大会请假的举动。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按期于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到会代表约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铁路的秘密工会。我向大

会发表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工人应拥护国民革命，力争工会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张。大会接纳了我的报告，据此发表了宣言，并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表示对他们支援铁路工人的谢意。最后，大会选举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委员长，我当选为总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

铁路总工会的组成，表示铁路工人又从“二七”的创伤中站起来了。分布在各铁路站的工人秘密小组人数增加起来，工作也较为活跃。当时各地铁路工人中，虽还没有国民党的组织，但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表兴奋。不少的铁路工人说：“现在国共一家，合力革命，吴佩孚快完蛋了！”铁路总工会已经建立，为“二七”烈士报仇的声浪高涨起来。这就引起军阀们的注意，不久，铁路工会又遭受一连串的压迫。

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先生和其他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回到北京，带来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钊先生初回北京时非常乐观，极力称许这次大会的成就。他指出这次大会所发表的宣言、通过的党章和决议等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他称道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对这次改组的决心和诚意。他相信国共合作的发展，会很顺利。

他告诉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汉设中央执行部。执行部的职权很大，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该管区的党务。孙先生希望老

国民党员分担各执行部的领导名义，提拔一些新进的同志，来担任各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上海执行部预定由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以秘书的名义担任该部的实际工作。武汉执行部预定由居正、覃振主持；孙先生希望我能去那里担任实际工作。北京执行部派定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三人主持，至于实际工作人员，则由他们三人选任。

李先生根据这种情况，问我能不能去武汉。关于这一点，他还对我有详细的说明。他叙述孙先生强调提拔新进的主张时，曾以我为例来说明。他说曾有人向孙中山先生进言，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不应列名为中央委员，此次出席大会又中途退席，足见仍有不满的意见。可是，孙先生坚决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我既来出席，足证并无根本反对意见，至于因重要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详细知道的事。他认为即使我曾批评过国民党，现在不加计较，也足证他是大公无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孙先生对我的印象很深，几次称我为“五四运动的能干的学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项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诉我，居覃两位虽曾托他向我代达欢迎的诚意；但他却从旁听说这两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驾御为虑。他个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发展国共合作为当务之急，所以希望我能去武汉，并相信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过他也向我声明，这件事中央和他个人都愿听任我自己的考虑决定。

我说，我不愿去武汉担任国民党的工作。我说明我并不以为我不能与居覃两位合作；也不是为中央所顾虑的，

我这个在吴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汉会有不易避免的危险；而是我根本不赞成这样做。我还进而劝他，中共党员分据国民党机构的要津，并无重大作用，反而会引起一般老国民党员的嫉视。这样，这个拟议就被我婉词谢绝了。

当时李大钊先生也想邀几位同志去分担北京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应，也不如意。那时北京多数同志认为，领导或参加革命运动，自应争先恐后，但到国民党机关内去凑热闹，却可能会吃力而不讨好。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的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经常在那里办公的是丁维汾先生、老国民党员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党籍的李大钊、于树德两位中央委员。于方舟、韩麟符和我三个候补中央委员都经常去参加会议，有时也去办公。跨党的中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

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

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密函孙先生^①，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他曾当场发表了一个声明^②，指

出中共党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的，可以说是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共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所以不必发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觉得他的声明曾发生良好的影响，似也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一部分老国民党因而失势；而反对党内有党、反对中共党员跨党的声浪也就随着高唱入云了。冯自由等树起反共旗帜，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国民党员们这种反对和怀疑中共的情绪由广东播到上海等地，到处潜滋暗长。国共双方的要人则忙于解释弥缝。在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接触，似是最多的，更从事实上体会到难于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参加在五月中旬举行的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这个通知并特别注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当我到达上海会晤陈独秀先生时，我发觉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他对国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乐观。在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的口号。这口号的用意，不仅在减少国民党员的疑虑，并带有修正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这决定的意味。

由此他作出结论，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还是要注重自身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大部分党员应开展独立的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等，并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

陈独秀先生不愿重提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纷争，但他这些话的意思，都是接受我在第三次大会时的主张。他还向我说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所以特别邀请我来出席，是为了共同纠正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的偏差。

陈独秀先生邀我一同会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也表示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针，重点是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独立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他特别强调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工作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这样，才可以达到推进国民党革命化之目的。

威金斯基似是回到中国不久。他在去年十一月间与我在北京会晤之后，曾在上海耽了一个时期，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我在当年初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已不在上海，他所以来去匆匆，似是为了与莫斯科商讨对国民党的政策。

当时莫斯科对国民党的内情不尽了解。即加拉罕、鲍罗庭这些人也是一些新来的生手，对国民党的实况，也只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间，似负责勾通意见的任务。鲍罗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曾向国民党要人说到国民党内有左右派之分^③。这次威金斯基肯定的说中共在国民党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似是根据莫斯科的新决定而说的。

不两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举行了。参加会议的约有十人。中央委员出席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钊先生缺席。毛泽东那时奔走于上海与长沙之间，忙着在做国民党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会议。特约来参加会

议的，有沈定一和我两人。其余为沪、鄂、湘、粤等重要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的会议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之下举行的。首先由陈独秀先生报告国共合作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他强调中共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他指出国民党内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赞成改组和支持现行新政策；右派则反对。中共党员应支持国民党的左派，以期国民革命的顺利进展。他着重说到中共要积极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内工作者，要保持固有的优良作风，多数党员应积极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从事独立发展，这些工作都足以增强国民革命的实力。他批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因注重国共合作而放松了职工运动等工作的倾向；似是要洗刷同志们对于他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指责。

陈独秀先生在报告时态度很谦虚。他说中央的决策多取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扩大会议予以检讨。他提议由沈定一任扩大会议的主席。到会者有人提出中央书记应是当然主席；但他坚持主张，认为这次扩大会议与往常不同，应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个被检讨者。他报告完毕后，又提议会议推举三人审查他的报告，并主张我为其中之一，并强调说这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的情况确也有些变化。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了；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

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跨党地位，多有忧虑。我们大家鉴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既是共产国际所坚持而实行的，又感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争论而引起党内纠纷的教训，不愿尽情讨论，表现得和和气气。

主席沈定一是创立中共最初发起人之一，他原系老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偕同蒋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他经常颇能坚持自己主张，但在这次会议中，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露出来的，只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④。

我衷心欢迎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决议，无异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我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见，并为会议所接纳。我态度诚恳，从不提起第三次大会的争论，因而我能得着到会者多数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中也可说有了显著的纠正，后来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也说到：“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⑤。

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一点，虽

载明在决议之中，但似非特别强调的事，而且当时我们还觉得反对右派是国民党左派的事，中共党员不应表示突出的态度。这次会议决定的重点，是少数共产党员应当任国民党内的实际工作——不是机关工作，而是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中共大多数党员则应致力于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工作，并谋自身的发展。

可是国共之间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在这次扩大会议之后，便爆发出来了。扩大会议开了三天而告结束，开完会的次日上午，我往访陈独秀先生，向他辞行北返。陈独秀先生一见面就向我说，刚才汪精卫、张继曾来谈了一阵，所谈的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问题。

陈先生说，汪张两位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决议和团刊等交给他看，并向他表示，胡汉民、谢持两位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办法，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先生向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因为这声明中曾明白宣称：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只是跨党，而不是党内有党。现在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岂非党内有党吗？

陈先生承认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内确有党团的组织，但否认这个措施违反李大钊先生的声明；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他向他们解释，中共在国民党内党团组织，用意是指导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但他这种解释并未使汪张两位满意，因而他答应他们，中共中央将举

行会议商讨，再行答复。

陈先生对这件事极其为难，又异常激动。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陈先生还向我详细分析这件事。他认为胡汉民、谢持、汪精卫、张继四人几乎可以代表国民党全体，除谢持一向反共外，其余三人都不能说是右派，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的。现在他们共同提出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也告诉我一些国民党要人对于国共现行关系的观感，举吴稚晖为例。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重其事的问他，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候可以成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惊骇的说：“那末，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吴说他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共两党都无现实的利害冲突。他向吴稚晖解释，所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会寿终正寝。但吴对这种解释仍表不满。

就为这些事，我们平心静气的商谈了一整个下午，认为中共的党团组织是不能取消的，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应国

民党的要求，将自己的组织取消。现在只有两途可循：或者国民党默认中共的党团能在国民党内存在；抑或中共乘早退出国民党，另谋党外的合作。

我向陈先生表示，国共合作的现行方式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只希望不要吵架散场。

陈先生则以这件事关系重大，拟即往访威金斯基，要他请示莫斯科，再定方针。我也就在第二天一早搭车北返了。

以后的发展，因我在监狱里过了五个多月的铁窗生涯，不知其详。但不久张继、邓泽如、谢持三个国民党监察委员曾为中共党团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个弹劾案^⑥，足证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没有结果。

① 邓泽如等十一人致孙先生密函原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六十五至第六十七页，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 李大钊声明全文见前书第三十七页至第四十八页。

③ 胡汉民在其所作《中国国民党批详之批评》文（原载民国十三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改组纪念《民国日报》特刊——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四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说有位外国朋友曾对他说，国民党好像已有左右派的分别。他们所谓外国朋友，就是指鲍罗庭。

④ 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他为何脱离中共，我也不得其详。但到一九二五年间，他却去参加了反共的西山会议。

⑤ 见邓著第一一三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⑥ 张继等三监委的弹劾案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提出的；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七十二页至第八十页。

第七篇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

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而我们又是国民党公布出来的中央委员。再则五月十五日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

案^①，这虽与国共两党毫无关系，但颀硕的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的对俄政策，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也是国共两党所为。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钊先生虽催着我去准备一切，但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年的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新结婚的。她是一九二一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作了必要的准备，

但仍暂住在原处，因为他们用的是假名字，军警不容易发现。他们也预料实行捕人将是两三天以后的事；到那时再行躲藏不迟。他们主要是为我这个军警心目中的“要犯”担心，希望我明天能够抵挡一切，离开这个住所。

于是我和我太太忙着烧毁重要的名单和信件。可是，我们这两间房里堆的文件确实太多了，一时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极了，心理上还相信有明天可以继续清理，所以在烧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谁知这次警探们的行动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还没有亮，我的住所和铁路总工会的办公处同时被大批警探包围。公寓的掌柜来敲我的房门，我从梦中醒来，还以为预定今早回去的铁路工人有急事来找我。我打开房门，警探们一涌而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说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们在我的房间内翻箱倒篋，检去大批文件。他们的言语态度极其粗野。我太太气得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强盗”，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便乱捉人，乱拿东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更深恐牵连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鸿杰两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讲，以便早点离开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弁出身，能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

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祥，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然爆炸了，但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

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反正是该死的。现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

党人都是不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踩杠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

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到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结案。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所以他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像这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

刑的折磨，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他们平日向他所说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不仅我从他们嘴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题目可以叫作：“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第二章

受军法审判

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警察们又将我带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我心里正在想：“这是我旧游之地，”果然有一个看守走过来向我说：“你又来了！”我也回答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怎么这多年你还没有升官？”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难为情，没说甚么就走开了。到了十点钟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带到警察厅的大堂内，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没发一言，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直开出警察厅。

这时，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我想：“这不是验明正身，乘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我不由自主的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将我送到甚么地方去？”他回答说：“警备司令部，一会儿就到了。”

将信将疑之间，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衙门的旁门口了。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直系巨头之一、以嗜杀革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那时做警备总司令兼步军统领，所有侦缉处和警察厅承办捉拿革命党人的重大案件，

都由他指挥。我此时知道此行确不是即时秘密枪毙；但想到：四天来走遍了北京城内三个可怕的机关，不知他们将要如何摆布我？接着，我被押进了步兵统领衙门的老监狱中。

这是一座老监狱，还遵行着满清的遗规。在一盏高挂着的昏暗油灯之下，监狱的看守长和狱卒们特别认真的搜查我，我的裤带和衣服上的骨钮扣都被拿走了，手帕被分作四块才留给我用。他们这样做，虽然使我非常不方便，但也使我估计到他们是想长期拘禁我。这里看守的人，比侦缉处的侦探们态度上要善些。狱卒们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关在这里，算是优待我了，要我安心睡觉。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发觉我果然在受优待。我可以在四周围着高墙的院子里自由走动，其他的犯人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才有这种享受。我知道了这里是这座大监狱的一个小部分，名为“看守所”。这座建筑物的正屋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余有大牢，有隔离监，有女监等部分。在看守所部分，我住的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可以容二十人睡眠的大炕，占了这房间全面积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摆着一张桌子，两张长凳，和两张木板床，有四个狱卒和一个卫兵住在里面。他们都是旗人，多数是从满清时代便在这里当差的，其中有两人大约已经超过五十岁了，其余三人也在四十岁以上。在这所房间的左面，便是看守所的监房，约可容纳四十人，囚禁的都是一些罪名较轻的犯人。监房的对面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听说原先驻扎过一班卫兵，这时只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兵。看守所的中央是一

块院子空地，四十个犯人在里面散步和吃饭，可不觉得拥挤。看守所的四周，都是坚实的高墙，经常关锁着的小门，其宽度仅能容一个人出入，门外站着武装的士兵。在我的住房内，还有一个四方的小洞，通到监狱里面，这是看守所内狱卒与内面监狱办事人员联络用的。

我除了看见李斌被关在看守所的监房里外，从狱卒们透露的消息，又知道其余的同难者也都分途移送到这个衙门来了。我的太太被关在女监中，范体仁和彭永和似是被关在后面监狱的隔离监里。在上午七时以后下午九时以前，我都能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也可以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我很想利用这种自由与我的同难者取得联系。

我找着机会和那位刚直而朴实的工人领袖李斌交谈。我首先慰问他在侦缉处受刑的痛苦，抚摸他背上所遗留的伤痕。他告诉我，他一口咬定他只是被雇用的厨子，甚么都不知道，再受刑也不会改口的。在侦缉处时，他和彭永和对过质，彭永和是一个甚么也不知道的学生，并证实他确是一个厨子。我则告诉他，我除了有确实证据的以外，甚么都不承认，要他坚持原有的态度，可将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牢头看见我们说久了便起而干涉，李斌亲切的嘱我珍重，我则伸出大姆指，称他是条好汉，彼此就含笑分别了。

这个机关虽名为警备总司令部，实际还是九门提督衙门的底子，犹有深厚的满清遗风。衙门里的人们似多具有没落和消极的心情。那个高大个子的看守所长，看来活像一个王公大臣；他手里老拿着两个核桃珠子，不断的玩弄；

胸前配戴着一个漂亮的鼻烟壶，不时的给鼻子擦上一点。他踱着上朝的步法，倒也十分有气概。但在办事上，除了捞几文之外，甚么也懒得过问。那些狱卒们谈起吃喝穿戴就很起劲；可是穷得要命，每人所穿着的百衲军服，还是由棉军服将棉花抽出而改制的。他们满脑子想法不外“有了皇帝，天下才会太平”。甚么“民国”、“国民党”、“共产党”、“军阀”、“总统”、“曹锟”等类名词，他们一概不感兴趣。我和他们交谈起来，有点格格不入；我最初还以为他们因受过训练，守口如瓶，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甚么也不懂，实在无从谈起。

这个看守所内，经常关着三十名以上的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小偷，其次是吗啡客。这里，实行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制度；看守所内有三个带脚镣的重犯，他们就是犯人中一正两副的头目，负着管理犯人的责任。其中正头目比较自由些，有时他可藉口处理事务到院子来蹓跹一下并和我交谈。他是被处三年徒刑的，他觉得我比他大得多；因为我是一个“造反的钦犯”，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犯人；其实，他也并不知道甚么是“造反”。要向他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很是困难。不过我嘱他不要苛待李斌，倒确收了实效。

我在这“优待室”里住了五天后的晚上，才被提去审问。在一间摆着许多堆满案卷的公文架子的办公室里，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瘦长个子、三十多岁的军法处长，看来是一个无精打彩的“纨绔子弟”（后来我知道他是满清的贵族，也抽鸦片烟）。台子上放着一大堆有关我的案卷，他在那里一面翻阅，一面用笔圈注，再慢吞吞的向我发问，

态度倒也不很凶恶。我站在他的台子前面。两旁站着两个高大强壮的卫兵，但无纪录人员。

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表示：关于我的案卷他都看过了。但他没有再提到关于炸弹案的事，翻看一卷案卷指着说，根据报章记载和查获的文件乃至我在侦缉处的口供，都可以证明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问我现在是不是否认。我答以绝不否认，并引以为荣。他进而问我：国民党由那些人负责，做些甚么事等问题，我就概以“不知道”三字答覆他。他也不理睬我的答覆，声言政府对于这些事早已知道了，他不过照例问问而已。第二次的审问仍在夜晚举行，主要问的是有关中共的问题，他同样提到根据各种证据，证明我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一个负责人。我也同样不否认，并声言这是光荣，而不是犯罪。他对于共产主义似乎知道得特别少，老在说甚么“共产公妻”，几乎使我发笑。这次审问，也和上次一样，他们一无所得。

第三次的审问主要是有关铁路工会的问题，他透露出在汉口破获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捣乱机关”，捕获了杨德甫等重要“罪犯”。从那里查获的文件中和他们的口供中，证明他们的“上司”是“张特立”，现在从我的住所所查获的文件中，又证明“张特立”即“张国焘”。问我有何话说。我答以“张特立”是我的别号，我是做着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他即将这一点记录下来。

在这几次的审问中，牵涉的问题很是广泛。有一次他问我，为甚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闹得满城风雨？是不是因为

俄国人或者广州的孙中山，拿出了大批金钱的原故？我答以这点我毫无所知，我只知道民国以来，军阀闹得乌烟瘴气，有志之士，本爱国天良，不得不奋起救国。他听了我这番理论，面露得色；也许他是怀着“没有了满清皇帝，民国到底弄不好”的心情，因而对我的说法，从另一个观点去寄予同情。

最后一次的审问，距离第一次已经两个多星期。这次是颇具戏剧性的。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说，他有一件公文，其中的一段扼要的记着我的口供，现在念给我听，要我站得远远的，他捧着这公文对我念起来了。其内容大致是：“张国焘，别号张特立，年龄××，籍贯××，出身××，经历……系孙文乱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重要共产过激分子，非法铁路工人组织的总干事……历次聚众滋事……图谋不轨……以上各节该犯均供认不讳……。”等语。他念完要我在这个文件上打手模，我立即反抗，声言这个文件未经我看过，所念出来的部分，也完全不是我的话；我愿意自写口供，却不能打手模。

他见我坚决反抗，便向卫兵示意来强制执行；两个卫兵将我的两手擒住，我竭力挣扎反抗，表演了一个打斗的镜头；结果，我的两手被扭在身后，前胸则被推靠墙壁。那个处长走过来，在我右手的大拇指上涂上了一些墨，将那件公文在我的拇指上印了一印。当他们实施强制时，我曾高声抗辩：“强迫打手模，没有效。将来到了法庭上，我是要控告的。”

那个处长声言这不过是一个照例的手续，现在审讯终

结了；并声明这里就是军法的终级审判，不准上诉。我于是连声问他：“我究竟犯了甚么罪？”他怒声回答说：“你犯了内乱罪。”我又追问：“甚么叫内乱罪？”他一面向我高叫：“内乱罪就是内乱罪。”一面对那两个卫兵说：“把他带下去！”我被带出这间房门时，他又命令他的侍卫，将我的太太带来，与我见一面。不一会，两个女看守挟持着我的太太来了。她站得远远的，不准走近我，也不准交谈。只见我的太太泪痕满面，我则悲愤交集，一瞬间我们便分别被押回监房去了。

我回到看守所以后，满脑子都是一些“内乱罪”、“强迫打手模”和与我太太不平常的会晤。我推想这些都是置我于死地的象征。无疑的，内乱罪就可以判处死刑，如今又要我太太和我一晤，更似刑前的诀别。我推想我的脑袋有点靠不住了，但其他的同难者或可幸免。我决意设法挽救自己，首先设计和外面通消息。我几次以重价托看守传递消息出去，但一直得不着回音。

在审问我的期间，李斌也受了一次审问，他背上又增多了用军棍殴打出来的伤痕。我百般安慰他，想尽方法为他医治。我也知道了他还是一口说定他是厨子，并未因受刑而改口，审问官似也相信了这一点。因此，我判定他可以先我被释放出去。我和他计议着，如果他能早获释出，所应做的事，特别是如何救助我和其他同难者。果然，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李斌被释放了。这使我有说不出的愉快。

我在优待室中不觉已经住了两个多月。离审问的结束也有六个星期；可是我依然未获一点确实的消息，实在闷

得难受。我屡次向看守所长要求给我书看，也大吵大闹过，但总未如愿。我于是实行绝食，以示抗议。在绝食的第二天，看守所长来问明了我绝食的原因，就向军法处长请示去了。

这天十二点钟的时候，军法处长又提我去问话，他首先问我：“是不是看守所虐待了你？”我反问他：“不给我书看，难道不算虐待吗？”他接着故作和蔼的向我说：“你是一个内乱未遂罪的嫌疑犯，要想很快的被释放是办不到的，你耐心一点吧！要看书嘛，我吩咐他们给你一些佛经的书看，但不准用纸笔。”

我这次的要求总算有点结果。第一，我知道我已不是内乱罪犯，而是内乱罪的未遂犯。看来情节轻多了，而且那个处长曾明白暗示我只是一时不能被释放。第二，我可以得到一些书看。我在推测这大致是由于我的同志们为我在外面做了不少的手脚。当天下午看守长果然送来一部“聊斋志异”，我也就停止绝食。

我在监狱中的情况，显然是改善了。就在我停止绝食后约一个星期的时候，居然有一位同拘禁在这所监狱里的新闻记者刘某与我隔着墙利用那个小方洞交谈起来。他首先告诉我，墙两面的看守人员都已藉故走开了，无论甚么事都可以谈。他递给我一份旧报纸，要我看。这份报纸上记载着一百九十名国会议员为我们被捕一事向政府提出质问，并要求立即释放。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为之一振。

刘先生还很高兴的告诉我，我们的案子现在是没有事了，最初在侦缉处的四天，是最危险的阶段；被送到这里

以后，也可能依军法判处死刑；不过这种危险现在确定没有了。虽然当局仍有永远监禁我的意思，但事情究竟好办多了；说不定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便可以出去。他还告诉我，这些话是王法勤先生前几天要他转告我的，他今天才设法得着狱卒们的默许，利用这机会向我传达。

我除向他表示谢意外，并问他自己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是因发表反曹锟的文字而被捕入狱的，已在这里拘禁了八个月了，最初也是要杀头的，后来也由于王法勤先生等的奔走，缓和下来；还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释放。他也说到我和他彼此都是国民党的同志，都是由王法勤先生负责援救。王先生凭着人事关系，为我们奔走很是卖力。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以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所能为力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痲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

第三章

狱中的见闻与苦思

就由于这个料想不到的因素，我们整个案子都轻松了。我的太太因为有病，由女监移送到了医院。彭永和也被释放了。我和我太太之间可以由看守传递一些小说书籍，我们还可以用烧过的火柴杆子在书内写几句话，互通消息和互致问候，但我仍被严禁与外间通消息。我手头没有一个钱，我每天两顿所吃的除一大碗气味难闻的粗米饭和一根约小指般粗的咸菜而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東西了。衣着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瘐死狱中”的办法的实施罢！

但当时我的心情是安定下来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我也在设法克服。我与看守所的犯人们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他们每顿吃的是两个窝窝头，我常将我的大米饭和他们交换，他们很高兴。我这样时而吃饭，时而吃窝窝头，在口味上有了调剂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时也能借得一条短裤换一换。

其他的犯人则与我不同，他们可以由他们的亲友送进来一些衣物和钱财；除衣物由各人自理外，钱财则都存在看守所长手中，随时领取，作购买食物之用；这也是狱卒

们榨取油水的主要来源。犯人们向看守所长领取存款时，照例由看守所长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牢头拿剩下的钱去购买食物，他又必从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买好或做好之后，再分成三份，牢头们、犯人头目及出钱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实际只能得着价值约一角的食物。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狱卒们要按着这个规定调整一个秩序出来，以便他们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几天没有油水可措，狱卒们就用殴打犯人的手段来设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购买食物的犯人很多，总数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买来猪肉，成包的购买强盗牌香烟（经常是零枝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看守所大家高兴的喜事。这时狱卒们会认真料理这些食物，大家吃完之后，还要大加品评。

这个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关着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轮着两个犯人打扫院子，卫生条件很坏，疾病也很多。监狱里还迷信不能捕杀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当我吃饭掉下几颗饭粒在地上时，耗子大军就从各个洞口结队的向目的物搜索前进；我睡在炕上时，往往从破烂纸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个或两个互相打架的耗子来，有许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虫也特别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绩似不下于名记者邵飘萍^②。蚊虫每晚都在奏着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

他们在一道，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却因此怒目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你不喜欢我管这件事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将这些吗啡客提早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露了这个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

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啦！留着脖子多啃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人的心情。

我在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耳闻目睹的事，却已不胜枚举。这对我说来，无异是一个重要的课程，我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改革须要很大的工程和很长的时间，我进一步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扫除这一切的龌龊，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切与重要。

不仅如此，在监狱里，不免使人觉得度日如年。我还不算寂寞，而是孤单，即每天所接触的人，与我很少共同之点，我不能向他诉说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间，气温已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点难过，因为此后我没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

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体操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蜃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了。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

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 and 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

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方案。如是我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我悔恨自己为甚么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糊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

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统一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四月决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相忍为国，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磨折。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法，有一次还向赵

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也许不是退步了、右倾了，而是进步了、减少错误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战争的风声日渐紧迫，监狱的戒备也随着严密起来。关于苏浙战争，孙段张合作对直、直奉第二次大战已大规模爆发等一鳞半爪的消息，也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我热切盼望直系政权的垮台，那大概会增加我冲出这座监狱的机会。但我也不能露出声色，以免惹祸，因而还是和平常一样过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个狱卒暗中告诉我，冯玉祥的军队忽然开回北京，连总统府都包围起来了。接着，我的房门被锁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动。狱卒们都慌张起来，严禁犯人们接触交谈。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监狱外面来回巡逻。二十四日，一个狱卒告诉我，王怀庆倒了，冯玉祥派了刘××接任警备总司令。这些事使我判断我真有出狱的机会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我这个不明情况的人，心中还在作多种可能的推测。忽然一个狱卒将我的房门打开，引着我一直走到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堂。这个大堂中站满了大小官吏，原来是冯玉祥所新任的警备总司令刚举行过接任仪式。那位新总司令离开他的座位，站在台子旁边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体仁也被带到那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想着冯玉祥竟能这样好的对待我们，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极力约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

事发生。

那位新总司令提高声音问我：“你犯了甚么罪？”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犯罪，审判人硬说我犯了内乱未遂罪，我是不承认的。”接着他又问：“他们打你没有？虐待你没有？”我回答说：“我个人总算没有挨过打。”于是，他宣布：“无罪释放”，并说我是受了委屈，好好出去休养。接着他以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太太和范体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没有犯罪，但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体仁回答的是：他犯了爱国罪，他要控诉他因此所受过的虐待。那个军人对他们同样宣告无罪释放，并含笑安慰他们。

我们这些政治犯走出监狱以后，同志们和朋友们曾多方慰问我们，这不必细说。范体仁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罢！”

- 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弹伪装礼品送到顾维钧家。顾宅仆人启视，爆炸，伤顾仆三人。此事与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及中共均无关系。
- ② 北京京报名记者邵飘萍第一次入狱被释放时曾将在狱中所捉的一瓶臭虫，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监狱，曾轰动一时。

第 八 篇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

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

我出狱以后，全部的局势似乎都变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反国民党倾向的增涨，在反对孙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现出来。中共北京区委会认为孙的北上，无异与北方军阀妥协，因而产生了北京的国共两派分裂的危机。

这时，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是赵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逐渐实施委派下级党部负责人的办法；赵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来的。他很年轻，在五四时系北京高师附中学生会代表，当时我们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学毕业后，即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共。我入狱后，他才回国；即受任中共北京区的领导职务，自然是缺乏声望和经验的。但因他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能说能写，热诚负责，获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时，李大钊先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当权的后期（即我入狱后）度着地下的生活，不能公开活动；于是，赵世炎就一时成了北京中共党务的重心。

我出狱后，赵世炎热诚的招待我暂住在他家里，因此，我们有约两星期朝夕相聚的机会。他曾给予我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在法国留学四年，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我也

很快的发觉他在政治上的看法与我分歧颇大。

赵世炎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他也表示过，中共的政策并不是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而是反对国民党整个的现行政策。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可以代表北京多数同志的意见，而且有其发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书第六篇第四章说过——汪精卫、张继与陈独秀间曾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那次谈判不仅没有获得协调，且使相互间的关系多了一层阴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组织。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国民党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国民党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则认为国民党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爆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国民党党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告诉我的。据他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苏浙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曾在上海天后宫总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由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傖任主席，并由五四运动时曾任上海学生代

表的何世楨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国民党应联合比较进步的军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动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直系势力。他说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产党员郭寿华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他的发言要点是：“军阀中没有所谓进步的，国民党应打倒一切军阀……”郭寿华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中即有人申斥他是曹吴的奸细；接着就在一片喊打声中，将他打伤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赵世炎等同志当时即根据这些情况向我指出：国民党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国民党分得一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难道中共也要随着国民党，与段祺瑞、张作霖沆瀣一气吗？

冯玉祥倒戈，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他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原隶直系、与国民党有些关系的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冯玉祥确曾做了一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将满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位基督将军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谦等，与北京的国民党人以及苏俄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联络。但是东交民巷外交团不承认他所支持的黄郛内阁^①，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个较稳定的政府。而且张作霖的优势兵力到达天津后，着着向冯进迫，在天津和津浦线上，将他所收编的部队解除了武装，张作霖还伙同段祺瑞向冯多方作政治上的进迫。冯玉祥当时曾

表示他所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国民党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祥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上。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国民党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对，是因为我在狱中羁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中共扩大会

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改变初衷更是无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

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宣言的国民党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在既已表决，只有暂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

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言说：北京区委会在冯玉祥倒戈后，努力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已有相当成绩，令人钦佩。只是反对孙中山北上的一点是左倾的，但现在还来得及挽救。我特别说明这不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而是由来有自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对国共合作过于乐观，后来因为遭受国民党右派不择手段的打击，又转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同志们只要想想孙先生在广东平服商团事变，和对广州英领事的干涉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他这次所发表的北上宣言，就会觉得这个盟友不可轻易抛弃；因此反孙北上的态度是不很适合了。我也指出：这种左倾的倾向不仅在北京有，也同样存在于中共各地的组织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意味。现在孙先生即将到来，时机迫切，还是勇于迅速改正，表示欢迎为是。

由于我的劝说，大会通过了我的提案；并委托我去调

解民众团体中关于这件事的不同意见。根据这一决议，我去进行说服一些站在反对立场的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共党员和若干国民党左派），结果甚有成效。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厅里，我约集了两派的重要代表各三人进行协商。我首先痛陈同系国民党所领导的团体，现在分成欢迎与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两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随即提出三点：一、国共两党党员和他们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应一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拥护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实现，反对一切违背这个宣言的企图及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三、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应在上述两个原则下合而为一。

我的主张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会谈也由严肃转为轻松；并且决定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合并组织的具体步骤。

这场足以使国共关系恶化的大风浪，就这样暂告平息。不几天，中共中央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国民党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宴会，这显使冯感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党陷入苦难之中；幸赖高级人物——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极力维持团结；同时广东方面又获得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胜利，广州政府地位得以稳固；这样，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国民党发生根本的震荡。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以前，北京的临时政府就已经组织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这个北洋军阀的元老，原已无力左右北京政局，在这次反直战争中，他的嫡系卢永祥又因战败而失去浙江地盘；所以他这次的出山，其实是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首脑鉴于时局的需要而捧出来的。

段氏上台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交团的承认；同时主张召集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孙中山

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感冒，也许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喙的余地，所以索性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国民党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俟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癌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开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

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暉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暉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似也有一个规律：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于流产；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发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暉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吴稚暉步出会场的时候，

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个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向吴说到，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要我讨好他，万万做不到。

我向李先生说，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而欲乘孙先生病危，来找中共的麻烦。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无原则的崇拜实力。从前他曾根据段系的要求，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①，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的脸色，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表示好感，不会发生实效。

李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向我说，不必过分重视吴稚晖这类不能见信于人的疯话，但要慎防中吴的诡计，他将与吴继续周旋，要我也能不形于色。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因而吴稚晖没有得着机会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稚晖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汪精卫曾委婉解释，孙先生病重，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孙夫人宋庆龄尤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怕影响他的病况。吴听了这些话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漫谈”。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说当一个皇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嫔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进而诬指孙夫人宋庆龄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他闪烁其词，若隐若现，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暧昧关系。汪精卫听了这些话，面红耳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满座为之愕然，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就此散会。

这件事在会后推敲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大家平素相信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三人是要好的

朋友，汪夫人陈璧君和吴稚晖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里；现在居然在会议上说出这样露骨讽刺的话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这是吴稚晖和汪精卫间第一次的交恶；也许他们就是从此分道扬镳的。

吴稚晖的这些话，只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那些鬼话自然没人相信。多数人反而觉得汪精卫受了委屈，增加了对汪的同情与敬佩。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汪是随孙北上办外交的，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气度大于胡汉民。这些观感也许对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当时有人说，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原来是有人从中反对。有人推测，大概是吴稚晖有甚么话，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孤诣维持这个局面，认为他决不会有意隔绝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也有人埋怨，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才引起这次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但还能维系下去，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虽然经过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段却断然拒绝；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愤慨。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死，并企图气死他。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东的实力，他不但不罗致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而且不断的施以恫吓，不是说要逮捕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这些事

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鲍罗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显得重要了。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以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

当时几件有关政策的事，在这个政治会议中，都大致得到解决；这与以后国民党的发展也大有影响。

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斤斤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的代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庭征得孙先生同意，向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让步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而且所要求加入人民团体的代表，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制财政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解决一点，主要也仅是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受打击而已。当时不少的国民党左派为这个让步表示不安，尤以共产党员为甚。国

民党方面曾向他们在广东等地的组织函电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党员大会上说明国民会议预备会既不能实现，现在有条件的参加善后会议，与共产主义者参加西欧各国的议会是同其性质。这些努力使国共双方多数同志获得了谅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颞预的拒绝了孙的两次要求，他于一月二十九日致孙中山先生电中，仅允聘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总商会之会长，为善后会议备谘询的专门委员。段的答复，显然是藐视孙先生这最后的让步。我们的政治会议觉得如再迁就，就将丧失一切，因于一月三十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的决议。

就这样，孙段之间完全决裂了。这在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方面说来，是丧失了统一全国的最后机会；在国民党方面说来，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式；二日我们的政治会议以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仰体本党总理的意旨，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组织法》。这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对台戏来了。

二月间，北京有两个会议在举行。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善后会议——这个会议对北京政局其实不能有甚么实际的影响，段氏只将它看作是协助临时政府过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参

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在段祺瑞的压迫之下，也只有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反抗的表示。但因不少国民党要人不愿与段政府过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势沉重的孙先生的忧虑，因而这个国民会议的促成运动，声势并不浩大，事实上仅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而已。

其次是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要人受着段执政的轻侮，都觉得非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不可，因而联络国民军便是我们政治会议所策划的主题之一。汪精卫等曾与冯玉祥及其代表有过多次的接触，于右任负责联络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王法勤等则与孙岳的国民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二月间的一次政治会议席上，鲍罗庭提出了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报告，指出冯玉祥愿与国民党合作，但冯的处境不利。张作霖的大军在压迫他，徘徊于湖北境的吴佩孚及其残余势力在仇视他，段祺瑞又帮助张作霖来牵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态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对外发言，较为便利；他则在暗中予以支持。鲍罗庭认为冯的这种意见值得考虑。

可是于右任认为冯玉祥的话缺乏诚意，他不愿去做这个空头总司令；他并且说即使勉强去做，也将一事无成，个人反会因而受罪。在座的人虽多对于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张他不妨一试，如能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共同事业，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这件事与于右任商谈过。我指出依照于先生的声望以及与国民第二军的深厚关系，不见得绝对不可为，不妨先到张家口去与冯谈谈。于先生仍是坚决拒绝。他表示冯玉祥绝不会真将军队交人指挥，即国民第二军也情形复杂，并非他这个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果挂着总司令的空名，这个要求军饷军械，那个要求地盘，将穷于应付。如果有几分可为的话，他将不辞劳怨。他并说那时要邀我同去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件事就因为于右任的反对搁置下来了；国民党要人中也没有人去实际参加国民军的工作。但国民军将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密切起来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没有受到段政府的武力压迫，这与国民军的态度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是属于冯玉祥系统的，这些接触，成了后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伏线。

最后我们讨论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应该有些甚么安排。孙先生的病势到了二月下旬，几乎人人都觉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脑海中都在思索着，都在忧虑着国民党今后的去向；于是，孙先生的遗嘱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课题了。

我们的政治会议没有正式讨论到遗嘱的内容问题，到

会者多只是旁敲侧击的表示一些意见。有的人觉得孙先生应当有一个详细的遗嘱，将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有的人又觉得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要作细目的指示。有的人说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就再不会有总理了，无论党务、政治，都应采取委员制。有的人说到孙先生在广州政府的领导职务应由那些人继承，也要决之于孙先生最后之一言。但这些意见，在政治会议上都未进行充分讨论。

大家对遗嘱的问题表现了很大的焦虑，多数人都说应当尽早准备。但汪精卫每每解释说，一提起遗嘱问题，孙夫人便非常伤心，认为这会使孙先生感到难过，要求暂缓向孙先生提及。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会议虽曾设想过多方式，企图要求孙先生留下几句遗言，但都为了顾虑孙夫人的心情，没有实行。

三月初，在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会议的席上，到会者对于遗嘱问题更感觉迫不及待了。我们讨论结果，决定委托汪精卫办理这件事；要他相机将孙先生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者准备一个简单的稿子，经孙先生认可后，请他签个字。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当国民党人士从各地赶到北京来，与孙先生作弥留前的诀别时，我却于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离开北京。我是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险，遵从同志们的公意，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郑州铁路工会内获得了孙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大为悲痛，深以不能为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进执紼为憾。我立即在当地召

开了一个铁路工人大会，为孙先生志哀，在会上痛陈我对于这一种伟大人物的追思。同时我也在那里想着国民党失去了孙先生以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几天后，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李大钊先生的来函中，知道了孙先生著名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经孙先生同意签字。他致苏俄的函件则系由鲍罗庭与宋庆龄、汪精卫等商拟，同样经孙先生签名。至于孙先生的继承问题则未有任何的决定。

正当国民党领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时候，广州的军事胜利却发生了镇定剂的作用。盘据广东东江的陈炯明的军事势力，原是广州政府的最大威胁；陈炯明利用孙先生离开广州，在北京卧病的时机，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他的军队于一九二五年初，进占了广州附近的东莞、石龙等地。坐镇广州的胡汉民代帅动员了国民党所有的军事力量，实行反击。那时，蒋介石以黄埔学生为骨干所组织的党军，为数虽不过是两个团，但在这次战役中，初显身手，就表现了卓越的战斗能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许崇智统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指挥的党军所组成的右翼军，攻克东莞；十五日再克淡水。这使在北京卧病的孙先生和我们政治会议的同寅们都为之兴奋。战事胜利发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孙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区，黄埔党军又获得了这次战役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东征”；它标志着孙先生改组国民党政策的初步成功；它稳定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基础；也安抚了国民党负痛失领袖的徬徨心情。而黄埔力量的兴

起，也以此为其关键。

- ① 李剑农也说：“吴孜恒（即吴稚晖）受浙卢之托，求孙先生容纳陈炯明。”（见李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五八三页。——上海太平洋书店，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再版。）

99